

東西薈萃：

香港天主教會口述歷史

張小蘭、黃奕清 編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

目錄

編者序	3
一、教會與社會	
香港教區辦學的「活」史書 — 儲富有	10
在明愛主理職業先修中學的建校專家 — 李崇德	20
另類明愛社工 — 鍾炳霖	30
與勞動人民一起的農家小子	
— 華天祿神父 (Fr. Paul Vallat, MEP)	44
工人運動裡的酵母 — 黃學明	53
敏於回應時代的轉變與需要 — 鄭生來神父	62
信仰之路·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 — 范錦棠神父	73
二、教會與文化	
美麗環境孕育出的信仰宣講者 — 徐錦堯神父	82
將勤補拙學拉丁 — 陶成章神父	91
把美式教育帶給香港學生	
— 江天文神父 (Fr. John Albert Geitner, M.M.)	98
從梵二發現自己的中國魂	
— 恩保德神父 (Fr. Giovanni Giampietro, PIME)	104
受保護的動物 — 李海龍神父	112
中文聖樂的洋人創作者	
— 杜逸文神父 (Fr. Dino Doimo, PIME)	120
從越南起始的漂泊修道人	
— 林銘神父 (Fr. Pierre Lam Minh, MEP)	131
三、教會與堂區	
遊走於七層徙置區的老外	
— 狄和詩神父 (Fr. Pierre Devos, CICM)	142
以《公教報》強化教會與教友的溝通 — 駱鏗祥神父	152

於葵芳挨戶尋找及探訪教友的開荒者	
— 萬籟寂神父 (Fr. Mario Marazzi, PIME)	160
在文字中履行牧職 — 李國雄神父	171
胡樞機年代的堂區領袖 — 沈禮訓	179
守護聖堂、以聖言拓天國 — 溫以政神父	189
查字典認識香港的傳教士	
— 馬偉良神父 (Fr. Patrick Masschelein, CICM)	197
四、教會的女性	
天神之后堂的「本堂神母」	
— 王美笑修女 (Sr. Michelle Reynolds, MM)	208
尊重並敏於學生情感 — 甘秀玲修女	217
為聾童教育盡心盡力 — 詹秀璉修女	228
在鄉村教堂、學校及監獄播種	
— 梅樂真修女 (Sr. Luigia Mindassi, PIME Sisters)	241
既照顧病人也獲照顧 — 高慧儀修女	251
修道院山下的亞妹 — 黃亞妹	261
感謝教會接濟的家庭	
— 梁氏三姊妹 (Annie、Connie、Judy)	275
跋	284

編者序

《東西薈萃：二十世紀香港天主教會的歷程》研究計劃，得到「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的贊助，經歷了幾年時間的籌備、採訪、撰寫、編輯等工作，終於完成了最後一個項目——口述歷史書的出版。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出版《東西薈萃：香港天主教會口述歷史》這本書，是希望通過受訪者的憶述，介紹天主教會與香港社會於二十世紀同步成長的經歷，記敘教會在過去幾十年的本地化過程，由西方傳入，與中華文化產生衝擊，進而薈萃，並且培養出本地的神職及教友領袖，以至於這個宗教如何以各種服務在香港文化和社會上植根。

本書分為四大主題，分別是教會與社會、教會與文化、教會與堂區，以及教會的女性。

教會與社會：或許受了傳統儒家思想及本土信仰所影響，很多華人，即使是教內信眾，也認為教會只應管祈禱、崇拜禮儀這些心靈之事，不應插足於政治或社會運動。但事實上，教宗良十三世早於 1891 年已發出《新事》通諭，論及工人階級的處境。這份通諭被視為天主教的社會訓導之始。教會社會訓導，是指教會當局對社會狀況作出分析和反省，並提出指引。而香港教會在社會參與上也從不缺席，最明顯是受訪的法籍神父華天祿，他除了是「公教青年職工會」的神師，更曾到工廠打工，成為工人的真正同行者。黃學明則以平信徒工青領袖的身份，細述當年工人運動的參與，以及教會其他相類似的運動對自己的影響。教會對青少年的領袖訓練，也可見於范錦棠神父的故事。他小時在太古樓露德聖母堂的宗教氛圍中長大，後來成為國際運動「樂鋒會」的小領袖，以及「公教學生青年會」神師，積極帶領兒童及學生運動。至於教會在教育方面的投入，更不用多說。兩位資深教育家儲富有及李崇德分別親述了七十年代以後幾個重大教育政策轉折期，以及「香港明愛」為回應社會的需求，在多區開辦職業訓練學校，以免大量青少年淪為失學者。前明愛社工鍾炳霖則指出，香港明愛被喻為「第二個社會福利署」。這裡除了是指機構龐大，也顯示了其社會服務的強大功能。此外，當環保仍是冷門議題之時，先行者鄭生來神父就已開始培育大眾意識醒覺，推動環保十年如一日。

教會與文化：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後，全球天主教會因 1963-65 年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召開，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禮儀用語由拉丁文改為廣東方言。陶成章神父在梵二前接受司鐸培育，操流利拉丁文是當時能當上神父的其中一個資格。意大利籍宗座外方傳教會杜逸文神父因梵二對禮儀用語的改變，為本地人帶來許多的中文聖樂。來自同一修會的恩保德神父因梵二的改革而受到「頓悟」，由討厭來香港變成渴望成為中國魂。此外，「教會之外無救恩」的教理（即除非領洗入教，否則就算是沒作惡的大善人，死後也會下地獄）也有所轉變，肯定了天主的恩寵可以一種無形獨有的方式賦予非基督徒。本章有些受訪者都曾受早期教理的影響，像來自美國的江天文神父當初成為傳教士，就是抱有皈依華人的念頭。不過他和很多外籍神父修女一樣，並沒有擺出高高在上的姿態，而是利用自己的母語在華人社會作育英才。西方宗教傳入華洋雜處的香港，產生文化衝擊之餘，也見融合。徐錦堯神父自小所受的傳統教育和後期的西方司鐸培育，讓他建立起一套糅合了中國哲學的獨特傳教學。隸屬不同國際修會的越南華僑林銘神父及原籍上海的李海龍神父都是因政局動亂而落戶香港。林神父的三重身份，使他成為本地越南難民的慰藉。開創上街遊行傳教的李神父，讀者可能難以想像他是來自冷淡教友家庭，被引領回教會後，進而修道成為神父。

教會與堂區：除了梵二會議為香港天主教會帶來轉變，教會在不同年代也要面對不同的處境。諸如四十至六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社會重建和內地國共內戰導致大量難民湧入，人口快速增長；七、八十年代製造業發展、經濟起飛，新市鎮的興起，以至八十年代後期至九十年代面對香港回歸，市民對前途的信心問題，教會都與社會休戚與共，既是一個傳揚福音的發展機會，也是一個重大的牧民挑戰。在七十年代，比利時籍聖母聖心會士狄和詩神父在舊徙置區七層大廈遊走探訪教友；同會的馬偉良神父以當年仍有限的中文，到偏僻的調景嶺為來自大陸各地的難民教友服務，並見證舊堂區的消失和新堂區的誕生。而意大利籍萬籟寂神父則放下「公教進行社」的行政工作走進堂區，與華人神父一起在荃灣、葵青區的新市鎮建立彌撒中心。天主教會在新界區的最大轉變，莫過於二十世紀初所成立的小堂傳教點，因人口遷移而沒落，部分已杳無人煙。溫以政神父受胡振中主教的委託，肩負起一個特殊任務，就是修葺偏遠離島教堂成為朝聖景點。與此同時，在教會內部，洋人領

導的架構漸趨成熟，交由華人接棒，不少要職改為國籍神父出任。教區中文周報《公教報》，以往由主教把關的編輯之位，交了給駱鏗祥神父。另一邊廂，李國雄神父負責「公教真理學會」，出版各種的教會書籍。不過，在社會潮流改變之下，他亦同時看著宗教書籍印刷量的下降。隨著教會提升對教友牧職的重視，沈禮訓和許多教友一樣，開始充實自己，分擔堂區事務或不同委員會的工作，成了教友時代來臨的見證。

教會的女性：天主教會的架構，時至今天，仍以男性神職人員為主導，地方教會（教區）以主教為最高的領導人。在以聖堂作為行政單位的堂區，往往由神父擔任最高負責人，稱為本堂神父或主任司鐸，許多決策和行動可能都是由神父牽頭或決定。故此整體的訪問對象，難免有所傾斜。為此，我們專闢一個主題為「教會的女性」，借由幾位受訪者的訪談反映出許多女性在教內默默無聞的服務，她們的付出一點都不比男性神職人員少。在七十年代教會快速發展而神父不足以分配的情況下，美籍王美笑修女開創先河，成為堂區負責人，被教友笑稱為「堂區神母」；而意籍梅樂真修女在交通網絡還未成熟的新界原住民村落，早期還要每天奔波守護鄉村教堂。國籍的甘秀玲修女、詹秀璉修女和高慧儀修女，各屬於不同的國際女修會。甘修女用半世紀的時間，言教身教感染有情緒或家庭困難的學生奮發自強。同樣在教育界服務的詹修女，在教育制度未完善的年代，不斷為聽障學生爭取教育權。高修女則在修會的醫院服務。當時教會辦的私家醫院，其實照顧了不少窮人。高修女就是在照顧結核病人期間，自己也染病。有謂「婦女能頂半邊天」，女教友也是撐起教會半邊天的重要群體。七十年代之前，華南總修院（現今聖神修院）到香港仔需要使用水上交通。黃亞妹雖然目不識丁，但負責搖船的她，卻是神父和修士們出入的可靠幫手。因為這特別的工作，她的請求，神父們多半不會推辭。至於梁氏三姊妹領洗入教和成長，是受惠於教會的接濟及修會興辦的義學，而在長大後，自己或孩子以服務回饋教會。

閱讀這三十位的受訪者，如同快速重溫了二十世紀天主教在香港社會上、文化上、生活環境上、甚至思想上的變化，尤其是當中出現的中西文化碰撞和融合。在教會的環境本來就是互為相關，所以讀者可能會發現某個主題的受訪者也可以放在另一主題，就如修女的教育和醫療工

作，同樣是一種教會的社會參與。許多神父既是堂區發展的見證者，也親身經驗了東西文化薈萃的過程。

當然，單單這些訪問難說是教會的全部。由於時間、人手等因素，限制了我們目前可以發表的內容。事實上，我們訪問的人物，數量遠不止現在所見的三十位。然而，從組織訪談至編撰此書，都不無困難。例如在這段時間內，讓研究團隊最感到可惜的，是多位神長的離世。雖然我們有幸訪問了陶成章及江天文兩位神父，但他們未能看到此書付梓。部分年邁神長，生前貢獻良多，但不及接觸已回歸天家，或因健康狀況已無法接受訪談。「莊稼多，工人少」，致電約訪常常找不到人也為工作增添困難。讓我們感到更為可惜的，是一些神父可能基於謙虛或其他原因，婉拒接受訪問，未能為後人留下歷史印記，或讓教外讀者更多的認識教會在社會中的建樹。另外，能清晰地回憶教會在五十年代以前的狀況的人，可說寥寥無幾。所以這本書充其量是二十世紀下半葉的歷史，要靠《東西薈萃：二十世紀香港天主教會的歷程》整體計劃的其他項目來補充，例如同於本月出版、以地區劃分作介紹的《東西薈萃：香港天主教的傳教歷程》小冊子。

顧名思義，口述歷史應把受訪者一字一語都記錄在案，我們亦希望達到「原汁原味」的效果，一方面讓讀者瞭解到外籍傳教士努力學習廣東方言，在港服務多年後的聽說能力（有外籍受訪者甚至能書寫廣東俗語），另一方面也保留各人的說話風格。不過，廣東話在口頭語與書面語之間有相當大差異，考慮到希望這書有機會讓更大的華人讀者群能得到，故我們決定採用書面語，保留少部分的口頭語，以呈現受訪時的情緒和語氣。此外，受訪者提到的個別人物、宗教用語或歷史稱號，可能為年輕一代感到陌生。我們盡量加上簡短註腳作介紹，但著實難以評估讀者的認知，在處理上可能有不足之處。

誠然，這本書仍有可改善的地方，但每個訪問如同聽當事人說故事一樣，都有它引人入勝之處，饒有趣味。我們期待這本書可以作為一個起始，引發讀者對天主教會口述歷史的興趣，有更多有心人加入行列，使得教會的歷史能普及到社會，並且傳承下去。

張小蘭
2019年4月

教會與社會

香港教區辦學的「活」史書

—— 儲富有

- 1948 年 於澳門出生
- 1953 年 入讀慈母幼稚園，及後升讀慈母學校
- 1966 年 領洗於聖母諸寵中保堂
- 1971 年 任教於聖文德書院
- 1973 年 任教於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 1977 年 任聖芳濟各書院校長
- 2000 年 任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校長
- 2009 年 任天主教教育事務處主教代表助理
- 2018 年 退休



(圖：儲富有先生)

訪問：區麗芳、譚惠鵬

撰文：黃奕清

自十九世紀中期西方傳教士來到香港以來，教育一直是天主教會服務香港市民的方式之一，早期的教會學校都是由來自海外的修會興辦。到了二十世紀，首間由華人管理的學校——華仁書院，由教友徐仁壽先生於 1919 年成立，隨後首個華人修會耶穌寶血女修會於 1923 年創辦德貞學校，而香港教會升格為教區後，也開始辦「教區學校」——南華中學（1946）和高主教書院（1958）。¹

儲富有踏入教育界之時，正值教區中學大量出現的七十年代。他身處教育前線的三十年間，學童人口急速增長，輕工業蓬勃發展，新市鎮陸續形成，其教育生涯，正好讓我們看見教會在這時代裡，如何回應教育的需求及教育政策的發展。儲先生與天主教教育的故事，可以從他的童年說起。

就讀慈母學校的「百厭仔」²

隨著 1949 年中共建國，大量難民從大陸逃到香港；他們在市區的空地或山坡搭建木屋，形成「木屋區」，及後出現由政府興建的「徙置區」，以應付住屋的需求。教會看見這些社區裡貧窮、衛生和教育等問題，多個外方傳教會在木屋區附近，或走進徙置區中，為居民提供救濟品，並開設診所和學校等設施。

儲富有兒時家住長沙灣一帶的木屋區，鄰近聖母諸寵中保堂³，父母很自然地把他帶到聖堂開設的慈母幼稚園上學，然後升讀慈母學校。⁴

慈母學校已經結束了，那時候是在長沙灣天主教墳場的入口處，現址為天主教墳場辦事處。學校有一間聖堂，

¹ 參「天主教教育事務處」網頁〈辦學歷史〉部分。

² 廣東話中，對頑皮小孩的稱呼。

³ 聖母諸寵中保堂位於長沙灣福華村，建立於 1952 年，其後在 1960 年劃入聖老楞佐堂，並於 1970 年正式被取消。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歷史建築探索」網頁，〈聖母諸寵中保小堂〉：<http://tiny.cc/65c34y>。

⁴ 慈母學校是聖母諸寵中保堂的一部分，屬私立學校。因著社區的轉變和堂區的發展，慈母學校已成歷史，其在區內的教育工作，由宗座外方傳教會士馬迪理神父（Pietro Martinelli）於 1960 年成立的善導小學繼承。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歷史建築探索」網頁，〈聖老楞佐堂〉：<http://bit.ly/2UveVax>；「天主教善導小學」網頁，〈校友會簡介〉：<http://bit.ly/2X3GC7d>。

名叫聖母諸寵中保堂。在聖堂旁邊用趟門隔開，有四個課室；即中間是聖堂，聖堂兩翼各有兩間課室，在另外一處又有兩間課室，做幼稚園的。

學校外面有一片空地作為球場，有一小塊有蓋的地方，可以放兩張乒乓球桌，就是所謂的雨天操場。空地對著聖堂的位置，有一個聖母山。後面就是墳場了，我們星期六、日，放假時經常去墳場玩，我們不怕的。

聖堂另一邊的山上，有一間神父的宿舍。堂區有一些修女，是顯主會的修女，她們在那裡幫忙做傳教的工作。那時的本堂神父是海澤黎神父。⁵

堂區下面以前是木屋區，現在應該是南華中學和明愛醫院那一帶，當時都是木屋區。那裡的聖堂主要照顧附近的人，以及青山道、長沙灣和荔枝角一帶的教友。

幼稚園時有修女在任教，伍秀芳修女，她是我幼稚園的班主任，另外還有一位，許修女。至於小學，全部老師都不是神職人員。

學校老師很友善的，不過有一位老師很惡，是英文科老師，會打學生，那時是可以打學生的，我也被老師打過。我也很「百厭」的，記得曾經由一張乒乓球桌跳到另一張，被老師發覺，說這是危險動作，罰我跪在聖母岩前。雖然有位英文科老師很惡，老師們都是很用心教學的。

⁵ 海澤黎神父 (Domenico Maringelli · 1913-1989) 屬宗座外方傳教會，1954 年從內地到香港服務，1963-70 年任聖母諸寵中保堂主任司鐸，同期在 1963-65 年間任慈母學校校長。他於 1972 年離港回意大利，1989 年逝世。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海澤黎神父): <http://bit.ly/2D8NDvO>。

我小學六年級時，是最後一屆香港的小學會考，應該是 1961 年，有中、英、數和社會四科。如果小學會考合格，就可以獲派到官立或者政府資助的中學。如果不合格，你要讀中學的話，就要去私立學校了。

而且不是所有學生可以參加考試的，政府會根據學校之前的小學會考成績，來決定學校的應考人數。我記得我的學校一班四十多人中，只有四位同學可以去考這個會考，我很幸運是其中一個。

慈母學校後來隨聖老楞佐堂的建立而結束。儲富有曾在聖母諸寵中保堂參與主日學，從而領取救濟品；他在中學階段 1964-66 年在聖母諸寵中保堂學道理（慕道），才領洗入教。

因緣際會下踏進教育界

儲先生在中六時遭遇父親的離世，好不容易靠政府及中學校友會的借款完成大學課程。畢業時，他既要還債，又要肩負照顧家庭的重任，因此著急找工作，卻又找不到。正好慈雲山剛剛開校的聖文德書院⁶在招聘老師，儲先生去信應徵，並順利獲聘。他在該校經驗了兩年愉快的教學生活，讓他愛上了教育工作，自此沒有離開過教育界。

那時候聖文德中學未有自己的校舍，還在興建。政府當時的做法，因為要提供很多資助的中學學位，有些新開辦的學校，並未立即用盡全校校舍，可以讓另一間新的學校，共用同一校舍。聖文德當時是未有校舍的，借用德愛中學上課。

⁶ 根據聖文德書院網頁介紹，方濟會看到慈雲山一帶新徙置區內適齡學童的入學需要，於 1968 年從美國請來丁立人（Joachim Daleiden）和司徒克（Howard Stunek）兩位神父創辦該校。學校於 1970 年正式成立，兩位神父分別擔任首任校監和校長。

聖文德是由中一開始，老師的人數少，學生的人數少，所以老師與學生的關係非常好，老師差不多認識全級的學生。那時只有四班中一，六位老師，教不同的科目。我記得自己要教數學、綜合科學、英文和聖經科，因此每一班都有教，跟學生很熟絡。第二年便可以用新校舍上課。

由修會學校到教區學校

儲富有領洗後，活躍於長沙灣基督君王堂，時任主任司鐸黃德祥神父⁷建議他到教區學校工作。黃神父認為，教區學校的發展比修會學校大；他所指的發展，除了是個人升遷的機會，也是教區辦學的發展。因此。儲先生在 1973 年轉到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簡稱「長天」）。

因為我在堂區服務，神父熟識我的為人、處事方法及態度等等，所以，雖然只教了兩年書，轉到長天，他已經要我做副校長的職位了。長天當時也是剛剛成立的，一開始也是沒有校舍，借培聖中學上課。

政府 1971 年實施六年免費教育，同時希望有更多學童能在小學畢業後繼續升學，因此許多屬教區開辦的中學，都是建立於七十年代。

你會看到，這時期之後開辦的教區學校，很多都是以邨名和地方命名的，例如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順利天主教中學、荔景天主教中學、屯門天主教中學，還有元朗天主教中學。

⁷ 黃德祥神父（1930-1993）生於廣州，1960 年在香港晉鐸，1964-1968 年間赴羅馬進修，取得教會法典博士學位，回港後任教區副秘書長兼教區法庭秘書。黃神父先後服務於多個堂區，是長沙灣基督君王堂的首任主任司鐸，亦曾擔任多間中學校長。「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黃德祥神父〉：<http://bit.ly/2X62df4>。

那時香港亦開始工業發展，歐美國家批評香港有童工。當時童工的（國際）定義，是十五歲以下，從事勞動的兒童。時任港督麥理浩爵士⁸因為想告訴人香港沒有童工，所以他提倡九年免費教育。九年免費教育原本是1979年才開始的，他將之推前一年，由於學位不足，政府便要想很多辦法提供學位。

除了剛才提到「一舍兩校」的做法，當時政府有很多官立小學，是不受家長歡迎的，即是它們的質素比不上資助學校、教會或其他團體辦的學校，是沒有學生的。政府將部分官立小學，即那些不受歡迎的，交給辦學團體，轉做津貼中學。另外，有很多私立學校，政府認為校舍和設施都可以接受，便將之變成資助學校，或向其「買位」。

那時有「官立學校」；有廿二間「補助學校」，即戰後便開辦的，主要都是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學校；有一類叫「津貼學校」，即是政府給資助的；還有一類就是「買位學校」，即是私立受助學校；然後就是「私立學校」。那時的私立學校也有很多學生的，例如威靈頓、新法等等，當中有左派的學校，是不受政府資助的，例如培僑、香島和勞工子弟學校等等。所以，當時的中學有很多類型，真的是百花齊放。

1977年，麥理浩宣布九年免費教育，便需要更多津貼學校。在聖方濟各堂區內，有一間石硤尾官立小學，學生不多，政府便將該校交給天主教教區辦一間中學，就是

⁸ 麥理浩爵士 (Sir Murray MacLehose · 1917-2000) 在 1971-1982 年間擔任香港總督，亦是任期最長的一位港督。他在任內推行一系列改革，包括從小學一年級到中學三年級的九年免費教育及將中文納入為官方語言。

「聖芳濟各書院」。教區遂招聘中學校長。當時我有份雄心，一方面是升職，另一方面希望在不同崗位帶領學校做好教育的工作，於是申請校長一職。

在儲富有的記憶中，當年為了九年免費教育的提前推行，當局要把資助中學的數量由七十多間變成一百五十間，也就是說，全港需要多聘七十多名校長。儲先生乘此契機當上校長，參與創辦聖芳濟各書院。其時全港由官小轉為津中的學校大概有九間，當中屬教區辦學的只有一間，就是聖芳濟各書院。



(圖片由儲先生提供。圖左：接受特首頒發榮譽勳章(MH)後在禮賓府與太太及兒子合照。圖右：退休前與外孫及教育事務主教代表黃若嫻修女合照。)

由舊區遷入新市鎮

在聖芳濟各書院開校的首兩年，儲先生再次經驗「一舍兩校」，與官立小學共用校舍。走到九十年代，學校出現了重大變動，就是校舍的搬遷；這時要處理的，是「一校兩舍」的情況。這次變動，又是教會對社會發展所需的一大回應。

因為很多新市鎮的建立，首先是沙田，然後大埔、粉嶺和上水，西北區有屯門、元朗和天水圍，接著是將軍澳

那邊，計算到全港的學位是不夠的，因為承諾了九年免費教育，便要提供足夠學位。但如果在所有新區興建學校，全港又會有學位多出，尤其是某些老化的地區，都已經收生不足，例如石硤尾和深水埗。

有些私立、買位和由官小改建的學校，都是非標準的校舍。政府便建議，不如搬去新區，你有新的校舍，它有足夠的學位，又不怕有多餘學位，政府在這樣的規劃之下可以節省一點。

教區除了辦教育，也要找地方做傳教的工作，要有個根據地，有個中心點，才可以協助福傳的工作。在新市鎮，政府未必會批地給教會建聖堂，但那裡的確是有牧民的需要。於是教區便想到，把在市區一些非標準校舍的學校遷出去，聖芳濟各就是其中一間。遷去哪裡呢？考慮過幾個地方，最終選擇了粉嶺。

93年搬過去，那石硤尾的學生怎樣呢？當然可以全部入粉嶺，但對他們並不公道。教區就此有個很好的決定，讓中一已入讀的，在舊校讀至中五畢業；於是便有「一校兩舍」，要作特別的行政安排。

遷校之後面對的最大挑戰，是學生背景與需要的不同。當時中學施行一種不平衡的班制，就是高中的班數比初中的少。作為新校，聖芳濟各的中四級所接收的，主要是沙田、大埔，以至北區不能在他們原校升讀中四的學生，要大力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加上家庭背景比較複雜，品行有許多需要改善的地方，包括會在學校附近吸煙。

所以在午飯時間，我們會有巡邏隊，我自己也親自和老師們去不同的商場、不同的樓層「洗樓」。首要讓學生知道我們會出去看他們，他們會稍為檢點。如果真的抓到

學生回來，我們便可以做點輔導工作。另外，讓家長知道我們是關心學生的，雖然他們的品行是這樣，但我們仍然不怕吃力地去做。

學生成績弱不要緊，我們做多點 pastoral care（牧民照顧），也因此有些家長認為，自己的子女需要特別照顧，便選擇我們學校。所以，跟在石硤尾時比較，公開考試成績是不好的，但我們仍然提供全人教育，同樣有很多課外活動，讓學生有全面的發展。我們做好一點學生輔導，做多點個別的照顧，當然老師會辛苦很多。

母語教育政策

儲富有在 2000 年回到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當校長，除了基於曾在該校任教，以及所屬堂區與學校相連而培養的感情，原來也跟教區鼓勵母語教育有關。在八十年代初，政府開始提倡在中學實行母語教學，而胡振中樞機⁹ 1989 年在《邁向光輝的十年》牧函中，提出推行母語教學。

那時用母語教學是比較口號式的，政府也不太知道怎麼做，只是說母語教學，認為學生的學習會更好。教區也覺得這是應該要走的路向，我相信有個主觀願望，全港學校都這樣做，那便沒有所謂的「標籤效應」。

我記得當時在中學校長會，教區中學的校長一起商量過，我們支持母語。我們對母語教育的定義，是有超過一半的課程用母語教授；因為政府沒有界定一個標準，這是有點兒取巧，但亦不失母語教學。譬如中文、中史、倫理

⁹ 胡振中樞機（1925-2002）出生於廣東省五華縣，1952 年在香港晉鐸，翌年赴羅馬傳信大學攻讀聖教法律。胡樞機自 1957 年起服務於台灣新竹教區，直至 1975 年獲委任，成為香港教區第五任主教。

宗教、體育和音樂等都用母語，如果你認為數學是有需要的，也可以用母語，其他科目如英文、科學、經濟等等，保持英文教學。這給予家長的觀念是，我們是支持母語，但不完全是中文中學。

長天因為跟隨胡樞機的宗旨，用母語教學。很多教區的英文中學，包括長天，收生平均下跌了一點多個 Band（等級）。自此，入讀學生的能力比以前較弱，所需的教學模式和照顧不同了，也較難期望學生有很強的學習主動性，老師們難以適應轉變。教區說，反正我以前曾在這裡任教，建議我回去，協助轉回一間受家長歡迎的 EMI¹⁰ 學校，同時具備天主教辦學理想的學校。

儲先生走過香港教育發展的不同階段，在不同的學校與地區從事教學與管理的工作，帶領學校回應不同類型學生的需要。在這一路上不變的，是他對天主教辦學理念的堅持。

雖然學生的背景和環境不同，但天主教辦學的理念、使命和願景都是不變的，就是照顧每一個學生。我認為，應該把學生教好，未必將來都能升讀大學或成為很出色的人，但我希望每位學生可以做好自己。譬如，在家裡是好的兒女、好的兄弟姐妹；將來有家庭的話，是好爸爸或好媽媽；在每個行業裡，以天主教的價值觀來做好一個人。我也相信天主創造每個人都有各自的潛能，我在學校裡讓他們有機會去發展獨特之處。

這份辦學理念的根本，正是教會對人的看法，儲先生藉此成就眾多的莘莘學子，引領他們開創自己的人生。

¹⁰ EMI 全寫為 English as Medium of Instruction，即是以英語為教學語言的學校。

在明愛主理職業先修中學的建校專家

—— 李崇德

- | | |
|--------|---------------------------------|
| 1944 年 | 出生於香港 |
| 1955 年 | 領洗於聖方濟各堂 |
| 1956 年 | 入讀聖芳濟書院 |
| 1964 年 | 師範畢業，任教於荃灣聖芳濟中學 |
| 1967 年 | 加入明愛，管理聖高弗烈職業先修學校 |
| 1976 年 | 調任屯門馬登基金中學校長，參與創校 |
| 1978 年 | 調任明愛聖方濟各職業先修中學校長兼任明愛職業訓練及教育服務總監 |
| 2004 年 | 任明愛教育部部長 |
| 2009 年 | 退休 |



(圖：李崇德先生)

訪問：劉卓輝、黃天賜

撰文：黃奕清

工業教育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出現於香港，為失學青少年提供謀生技能的培訓。天主教會的首間工業學校是在 1935 年建成校舍，交由慈幼會管理的香港仔工業學校。後來香港明愛成立，也應地區居民的需要，在香港仔及堅道等服務中心開設職業訓練課程，成為日後發展職業先修教育的起點。

在 1967 年投身明愛的李崇德，當過三間明愛職業先修中學的校長，見證在輕工業蓬勃的年代，職業先修學校與整個教育制度的同步發展。期間，李崇德協助創建多間明愛職業先修中學，他笑稱自己因此變成了「建樓專家」。他原本是英文老師，當初為何選擇教育這一行，及後為何毅然投身明愛，都與他在中學階段的成長經驗有關。

回答天主教教育之恩

我的母校是由修會辦的中學——聖芳濟書院，校內的修士屬聖母昆仲會¹。我在十二歲領洗，整個中學階段都是在他們的培育裡，無論是成長或是信仰，他們對我的影響都很深。尤其是後來為何選擇了教書的工作，純粹是修士對教育的投入，以及他們對年青人成長的關心，給予我很大的動力，所以我選擇了教書這一行。

我剛出來教書的時候，很幸運地修士們請我回去他們辦的另一間學校任教，因此我覺得要學習他們的那份投入感，尤其是在學校這麼多年，我絕不是聰明的學生，坦白說我的成績是很差的，都不敢跟別人說。修士對我不離不棄的態度，使我完全不會有自卑感，在學校內也不會感覺自己是次等的。這不同於在一些名校裡，優等生有更好的待遇，較差的則沒人理會。我覺得這種對年青人的培育，是我應該學習的，所以當我選擇了教育這行業時，並

¹ 聖母昆仲會 (Marist Brothers of the Schools) 在 1817 年創立於法國，是一個致力於青少年教育的修士修會，於 1949 年來港，先後創辦聖芳濟書院和荃灣聖芳濟中學。

沒刻意去尋找怎樣的教席，當他們叫我幫手時，我便答應。

同時，我一直在聖堂成長。當時輔祭會的神師郭佐靈神父，是 PIME（宗座外方傳教會）的神父²。那時他很年青，跟我們輔祭玩得很熟。他被教區調往明愛，去了香港仔明愛第一間職業先修學校，叫「聖高弗烈」。他去了那裡不久便打電話給我，約我過去跟他見面；他說：「很糟糕，我不懂教書，我不懂學校。你反正在教書，你來幫我吧。」

在那時代，香港仔聖高弗烈不是正式的中學，是一些職業訓練班。那時郭神父想我去幫他，但我已經在教一間正規的中學。我的考慮就是：要不要放棄那間中學的教席，加入明愛工作，去做職業訓練班的教師呢？

當然神父有影響，他的獻身與投入令我感動，我亦認為自己年輕，剛出來教書，可以多作嘗試，不行再算。於是，我告訴原來學校的校長。校長修士又很好人，年中也讓我離開，所以我在二月，即上學期完結後，便轉職香港仔那邊。

明愛的首間職業先修學校

香港仔明愛服務中心在 1962 年啟用，是明愛首個地區服務中心，設有漁民子弟學校，提供柴油機維修課程及女童職業訓練等，中心亦為殘障人士開辦課程，提供工作技能培訓。

² 郭佐靈神父 (Domenico Cozzolino, 1935-1988) 乃於 1954 年加入宗座外方傳教會，1959 年晉鐸。郭神父 1961 年來港後，服務過聖猶達和聖方濟各等堂區，在 67 至 69 年間當香港仔明愛中心的主管，隨後返回意大利擔任拿坡里媒體宣傳辦公室主任。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郭佐靈神父〉：<https://bit.ly/2CL9ut>。

對漁民子弟來說，是很難適應常規教育的。因為爸爸的船除非不出海，一出海就是一、兩個月，正常的上學時間便會被打斷。他們一定要跟爸爸出海，因為在陸上沒有一個固定的住址。很多時他們讀到三、四年班便不能繼續，或者課程配合不到，惟有學門手藝，幫忙爸爸。在香港仔那些漁民子弟最喜歡學的，是修理柴油機；因為船是由柴油機推動，如果壞了，在海上便糟了，所以爸爸也很喜歡兒子學懂維修柴油機，便開這類課程。為女孩子的，開打字班等等，也是屬於職業訓練。

在那裡，原來我要幫神父從頭開始，原來學校連註冊都未做，卻已在開班教書，正式來說是犯規的，所以我以自己有限的知識去盡量幫他處理一切的行政事務。做下去我開始覺得有很大的滿足感，因為這些年青人之中，原來有一部分是聾啞同學。他們失學，因此年紀較大，有些二十多歲仍未小學畢業。當時在香港仔聖伯多祿堂旁有一間小屋，他們在那裡住宿，一班十多人，白天便來上學。相處久了，與他們打成一片，自己也感覺年輕了，而且看到他們學到一門手藝，畢業出去找到工作，可以自立。這樣做著我也感到開心，覺得很有意思。

初期的聖高弗烈是很簡陋的，幸好明愛一直都有些恩人，尤其在早期六、七十年代，德國埃森教區與香港教區結為姊妹教區³。該教區設有兒童發展基金，有一個籌款方式，就是在每年聖誕平安夜晚上，教區內的兒童合唱團去報佳音，向人收捐獻，說明是用來幫助世界其他地區內

³ 埃森教區成立於1958年，與香港教區在1961年締結為「姊妹教區」，支援香港及中國教會的發展，包括捐款協助香港教區興建三間聖堂——葛達二聖堂、善導之母堂和聖歐爾發堂，及資助明愛發展社會服務。

有需要的教區。當時香港教區獲得他們的幫助，因此每年都有些捐款是幫助明愛的。當時我們得到德國教會的幫助，學校的設施便慢慢有所改善。

職業先修教育的正規化

早期的聖高弗烈分男校部和女校部，男校部由李崇德負責，女校部由嘉諾撒修女負責。李崇德管理聖高弗烈的十年間，見證該校重大的轉變。

1967年發生暴動，事後政府有一個專責小組，嘗試找出暴動的成因及預防措施。結論之一，是由於當時的教育資源嚴重不足，導致只有半數小六畢業生能升讀中一。那時有個升中試，合格才能繼續升學。有半數學生，其實不一定是升中試不合格的，只是制度不容許，沒有學位讓他們升上去，被升中試淘汰。

小學畢業才十二歲，那時的就業年齡是十五歲，所以十二至十五歲中間有個空罅。這群小孩子在三年裡無所事事，不少成為街上的頑童。因此，當社會出現任何不穩定時，這群街童便與滋事份子一起生事，例如擲石頭、放「菠蘿」⁴等，原來當中有相當的人數，正是這群失學兒童。

政府為要對症下藥，請來外國專家與香港的一些有心人士，成立工作小組；他們建議政府模仿德國和北歐的制度，推行學徒訓練制度及職業教育。他們設計一個三年制的初中職業先修學校課程，由中一至中三，文科工科各半。學生進不到中一，便去這些職業先修學校，讀完三年

⁴ 香港俗語，稱自製的炸彈為「菠蘿」。

便十五歲。同時，政府開展學徒訓練計劃，讓十五歲的畢業生可以選擇參加。再者，政府配合開設工業學院，讓小朋友可以繼續讀書，白天去做學徒，晚上去讀書，與僱主簽三至四年的學徒合約，畢業後成為合格技工。

這構思是非常好的，六、七十年代香港是全靠製造工業令整體經濟能夠起飛，但人手從何來？職業訓練學校便能滿足這方面的需要。政府接納了這個報告，於1969年落實，先邀請三個教會辦學團體開始籌辦這些學校，這三個團體分別是天主教的明愛、基督教的中華基督教會及聖公會。

明愛接納政府的建議後，把在香港仔中心內的職業訓練課程，改組為三年制的初中職業先修學校，並將男校部和女校部合併，香港仔明愛聖高弗烈職業先修學校正式誕生。

改組後的首四年（1969-73）為試驗期，當局檢討認為相當成功，遂把計劃定為中學學制的一種，叫「職業先修學校」。因此，聖高弗烈在1973年轉為政府津貼中學，後來順應政策的發展，在78年由三年制改為五年的完整中學學制，改名「職業先修中學」，至1982年增辦預科班，以配合中學七年制。

與此同時，工商界團體也紛紛回應新政策，開辦同類型學校，以應付其屬下機構的人力需求。今天的廠商會中學和棉紡會中學等等，正是這個時代的產物。

明愛辦學的使命

明愛雖然不是僱主團體，但也著意開辦這類學校，是因為作為宗教團體，明愛看到自己在香港社會中的角色——照顧弱勢社群。入讀這些學校的孩子，都是家境清貧的；剛才也說過，兩個小朋友中只有一個能升讀中學，升不上的當然是成績不好的，但他們是否也需要有讀書的機

會呢？職業先修學校既然能提供此機會，明愛當然義不容辭，努力在這方面為他們提供選擇。

對教會來說，明愛就是替教會扮演一個奉行福音精神的機構，為弱小的服務，即是耶穌所說的「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瑪 25:40）。

因此，明愛得到很多善長仁翁的支持，所以一連開辦了三間馬登基金中學⁵，分別在柴灣、沙田及屯門。另外，我們還有兩間陳震夏中學，也是熱心人士鼓勵明愛，贊助辦學。那時明愛以這種方式，在 1973 至 88 年這十五年間，先後開辦了八間職業先修學校。

李崇德在 1977 年被明愛調派入屯門，開辦首間由馬登基金贊助的中學。過了一年半，新校舍建成之際，他便被調任堅道明愛聖方濟各職業先修學校校長。李先生解釋明愛把他調回總部附近，是由於當時有其他新校正在發展，需要他的協助，所以他在聖方濟各的二十多年間，一邊當校長，一邊協助明愛總部策劃新校。參與創辦多間職業先修中學的李崇德笑言：「我本來是英文老師，現在變成建樓專家」。

明愛拓展另類教育背後的推手

這個時代的「明愛人」談到明愛的精神與使命時，都不得不提起來自意大利的力理得神父⁶，他是明愛的總裁，亦是影響李先生甚深的前任老闆。

⁵ 馬登基金由若翰·馬登 (John Louis Marden) 夫婦成立，贊助職業先修學校的開辦及其他慈善的工作；馬登家族創立及經營洋行「會德豐」。

⁶ 力理得神父 (Francesco Lerda, 1926-2003) 屬宗座外方傳教會，他於 1951 年晉鐸後，在羅馬額我略大學攻讀社會科學博士學位。力神父 1956 年來到香港，曾服務於竹園的聖堂，1959 年出任香港明愛副總裁，後於 68 年擔任總裁一職，直至 2003 年逝世為止。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力理得神父〉：<https://bit.ly/2UBjOiz>。

他為人沉默、善良及腳踏實地。明愛開始時，辦公室只有五名員工，他是其中之一。到今時今日，明愛有六千多名員工，而在他去世時，已有四千多名員工。在他任內的三十多年，明愛的發展是一日千里，但他從不接受訪問，不會在報章上看見他的名字。

他對於人的看法，即何謂天主的肖像，何謂尊重每一個人，不是用口說的，而是以行動來做給我們看。他不但對待所有員工一視同仁，而且對越高級的職員，越是平淡，但對基層和庶務的同工，他十分尊敬及熱情對待。例如，每年通常年初四開工，我們想到寫字樓向他拜年，他會婉拒，說沒空，但轉個頭吩咐人為他安排，把所有「阿姐」（工友）都請來，集合在一個房間。我們起初都不曉得為甚麼，原來是他要主動向她們拜年。他是反轉來做的，不是高高在上，而是謙卑自下，他要服務最低層的人，便由自己的機構和辦公室開始。他做給我們看。

另外，他每年會邀請我們到長洲，像避靜般，但明愛的同事，十個有八個都不是天主教徒。他捉我們去長洲過三日兩夜，不是避靜，而是一個退修活動，由他自己主持、定主題和討論範圍。每年做甚麼呢？他總是圍繞著一個話題，簡單來說，他要我們每年集中談明愛精神。何謂明愛精神？即是明愛在今天的定位是甚麼？社會的需要是甚麼？我們應該做甚麼？我們是否需要改變？我們是否察覺到社會上有某些需要？我們有否忽略了某些人的需要？他長期地，每一年都要求我們做這件事：檢視、反省自己的工作，不要固步自封，不要自滿，要不斷反省。

大家看見今天的明愛，教育、社會福利樣樣都做，尤其在以前，我們被人家批評心口繡個「勇」字，為甚麼呢？因為很多政府的新項目（new project），未有人做的，政府想找些機構做白老鼠，成功便去做，不成功便算數，那時力神父都很願意接辦這些新項目。例如現在很出名的「向晴軒」，專門收容遭遇家暴的婦女，作為中轉站，起初是社會福利處的pilot project（試驗項目），明愛接辦。職業先修學校也一樣，那時是pilot project，讓我們試做，不成功便作罷。他正是願意接辦這些項目，覺得只要這件事為社會上某些人是有需要的、是有用的，他便不介意去接辦。

這對我們來說，尤其我自己是教友，我覺得這是真真正正活出福音的精神，不是用口說的，是實在地做的。明愛的服務和教會一向都說的，我們不分種族、國籍、宗教，所有人都是弟兄姊妹，那麼我們究竟是否這樣做呢？

「忠誠勤樸，敬主愛人」的教育理想

我為明愛的學校訂立校訓，多間學校都用同一的校訓——忠誠勤樸，敬主愛人，沿用至今，這是我個人在信仰中摸索出來的教育理想。教育年青人修身立德，要以「忠誠勤樸」為原則。「忠」是忠於自己的理想，「誠」是做人的正直 integrity；年青人不勤力便不會有成就，即「勤」；有了成就也不要驕傲，要樸實一點，即「樸」。

我認為「忠誠勤樸」這四個字是做人的態度，「敬主愛人」是做人的目標。我們作為一間天主教學校，信仰的傳遞是必要的，因此一定要教學生認識天主；「認識天

主，愛護他人」就是我們教育學生的最高理想。所以這八個字，既是小弟的貢獻，也是我的理想。

李崇德總結在明愛近半世紀的經驗，談到當中最印象深刻的，是看見本來被遺棄、被稱為失敗者的青年，因著明愛的教育，有些成了小型工廠或小店的老闆，有些成了工程師和律師等專業人士。李先生不奢望學生們都能飛黃騰達，但願他們有機會發展各自的人生。

我們要做的，是幫他們轉化生活環境，從不穩定變成穩定，便已經很好了。至少他們離開我們時，不會去偷呃拐騙，不會去作奸犯科，會腳踏實地做人，面對自己將來的生活。我常常看見他們回來時，都是拖兒帶女的，一家人回來探我們，很開心。

因此，我在明愛四十五年，一生在明愛服務，我覺得是天主的恩寵，是一份祝福，若非如此，我沒有機會履行福音的精神。

另類明愛社工

—— 鍾炳霖

- 1946 年 出生於香港
- 1956 年 領洗於聖德肋撒堂
- 1967 年 受僱於香港電台
- 1972 年 加入明愛工作
- 2007 年 退休



(圖：鍾炳霖先生提供)

訪問、撰文：陳樂信

退休社工鍾炳霖在香港明愛服務卅五年，一直專注於青少年發展及輔導工作，同時積極關注社會事務，見證教會與明愛，這個面向社會的服務機構之間的微妙關係。

鍾炳霖 1946 年出生，家住旺角，十歲時隨母親在太子道的聖德肋撒堂領洗入教。當年除了鍾父，一家大小在同一天領洗，而後來鍾父亦在臨終前皈依天主。

很有趣的，我媽媽這樣說，找些「鬼佬」¹神父來嚇下我。事實上，當時我覺得，我自己眼見，其實嚇不到我的，神父同小朋友玩，小朋友們爬聖德肋撒堂那道鐵閘門，他又抱他們下來之類，好 friendly（友善）。其實是她驚我們幾個（孩子）學壞。

鍾炳霖在公教家庭裡成長，同時在「海星學校」²和「德仁書院」³這兩所天主教學校讀書。談到中學時期的信仰生活，他認為學校有的並非宗教生活，只是教會的辦學手法而已。

德仁以前是間好學校，是華仁的老師自己出來開辦的，自己跟隨華仁的做法，包括校服，號稱自己是天主教學校，入門口有個聖母像。

它的宗教氣氛比較淡，不過就好嚴。它學了宗教辦學嚴的地方，就是教務主任拿著藤條，在走廊，你知道以前的課室外面有個走馬騎樓，他走過，把藤條收在身後，你一作怪，他就進來，進來就打手板，即是很 harsh（嚴厲

¹ 香港人對西方人的稱呼。

² 海星學校由方濟會修女創辦，為何文田新徙置區的學童提供教育。學校於 1958 年由瑪利亞方濟各傳教女修會接辦，至八十年代末收生人數持續下降，最終於 1992 年停辦。參夏其龍、譚永亮編：《香港天主教修會及傳教會歷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1），頁 231-232。

³ 德仁書院已於 2006 年停辦。

的) 那種教育。但是就沒有宗教生活，它給你看到的宗教，是聖相之類。

聖德肋撒堂的堂區生活

領洗兩年後，鍾炳霖開始參與堂區活動。他十二歲加入聖母軍，主要工作是售賣《公教報》，及至年紀漸長，便負責探訪聖母軍輔助團員⁴、探訪醫院病人和教主日學等工作；這些參與，在他十八歲升上成年支團後繼續。直至廿二歲，由於搬離社區及電台工作繁忙，鍾炳霖才離開了聖母軍。

現在九龍明愛那裡，以前旁邊有一棟，有三、四層是神父住的，有一個 hall (副堂)，是頗標準的羽毛球場的禮堂，正式的比赛也在那裡舉辦，亦有個 stage (舞台)，好像現在的 school hall (學校禮堂)，當然是大一點，星期六晚會放電影，最後面還可以擺放兩張乒乓波枱。我們即使未做聖母軍時，已經在那裡玩，因為在那兒玩，就被人 recruit (招攬) 了。

當時都不大理會，十二歲入青年支團，都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總之，開會、念經，每人要買一本《聖母軍手冊》，很大本的，中文版，而且是硬皮的。我所屬的青年支團，主日在副堂負責一個流動圖書館，我就是在那裡看到很多青年與神修的書籍。那時我看的《聖經》是中文版，長大一點的時候，拿著本英文彌撒經書望彌撒，追隨祭台上用拉丁文的神父讀經，都頗辛苦。

做聖母軍後，慢慢覺得自己有點不同，其實那是一個 social group life (社交生活) 來的。因為加入了聖母軍，

⁴ 輔助團員主要在家祈禱，藉以給予「活動團員」支持，是聖母軍的精神支柱。

有些比我還小一、兩年，十歲左右，已經是青年支團，我顯然是大哥哥般。團員十八歲就要進成年支團，如被選任青年支團團長會再派回來。與其說宗教生活，在我身邊的人，感覺上是社交生活多些，少年人都是這樣。只不過是念經、去聖堂、賣報紙、清潔聖堂、探訪。

在與一些較年長的團員交流探訪輔助團員的經驗中，鍾炳霖感覺到大家都曾遇到的成長與宗教思維的衝擊；當遇上「冷淡教友」輕慢的挑戰時，團內的弟兄起了支持的作用。鍾炳霖也談到在聖母軍青年支團時期的社群化對自己有益，亦令他較早熟，但神修生活實在太淡。

還好，那時每周六下午在聖堂主堂內有信仰及生命講壇，由劉榮耀神父⁵主講，有公開討論。由於劉神父主講形式生動活潑，沒有禁忌，除了討論信仰生命，也涉及世界大事，很受歡迎，每次都有坐滿主堂約一大半的參加者，我每周六都跟隨母親去捧場。在公開討論時，一些較年長的青年每每對劉神父提問，有些很有挑戰性的，引致神父和青年、青年與青年之間唇槍舌劍，大家不以為迂，我從中得益。

及後劉榮耀神父被調走，聖德肋撒堂找不到另一位可取代的神父，找來了當時駐鄧鏡波學校的慈幼會士余秉昭神父⁶主理神修講壇。余神父雖然不及劉神父充滿活力，但他溫文爾雅，中外古今見識廣博，兼資料豐富，在原班

⁵ 劉榮耀神父 (1908-1986) 出於香港，1934年晉鐸後，在海豐和惠州工作，至1947年回港於堂區服務。劉神父擅於音樂，是教區的著名作曲家；他在教會推行禮儀本地化之下，致力創作中文聖樂，對中文聖樂的發展作出極大的貢獻。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劉榮耀神父〉：<https://bit.ly/2DhuY0X>。

⁶ 余秉昭神父 (1921-2000) 生於澳門，1942年加入慈幼會，1952年於香港晉鐸後，主要服務於香港教區內的慈幼會學校，並曾任聖安多尼堂助理主任司鐸。參「鮑思高慈幼會」網頁：<https://bit.ly/2GsIBLs>。

講壇支持者以外更吸引了另一批擁躉，公開討論亦較為融洽。自此，我曾有大半年定期到鄧鏡波學校找余神父聽輔導和辦告解。

不知道當時有沒有其他堂區及神父能負責這類開放性的信仰生命論壇，放之於今天，世事多元兼對立，為只在彌撒中單向講道的神父們，相信是極大的挑戰。

中西薈萃的堂區

聖德肋撒堂位處九龍塘，建堂時附近已是個花園洋房式的高尚住宅區，有不少外籍人士居住，形成中西結集的一個天主教生活群體。

我們逐漸長大都覺得，很多「有錢佬」在那裡望彌撒，李業廣都在那裡望彌撒的，你知道李業廣是誰嗎？是財經界很厲害的人。還有一些演藝界，有人見過尤敏、羅蘭。曾慶文神父兩兄弟和康建璋，這三位神父，那時女教友們見到他們有如「糖藕豆」⁷般，我看著他們被女教友迫到埋牆。

那兒是西化的，西化而有錢，以及有外國人，真的很多外國人，菲律賓人和其他國家的人。聖德肋撒堂不時都有巡遊，如聖母聖心、耶穌君王之類。除了有外國人參加巡遊，聖母軍及其他善會都有英文支團，都有外國人擔大旗。走在他們中間，加上背景一帶的低樓層洋房，一時會覺得身在外國，與走在油尖旺區的感覺截然不同。

當時聖德肋撒堂有三個入口，除太子道那面有巴士到，另一邊就是窩打老道。我小時在聖母山那面的窩打老

⁷ 廣東話，一般形容人與人的關係十分親密，形影不離；這裡的意思是，女教友們常常黏在三人的身邊。

道入口賣《公教報》，那裡很多由尖沙咀開出的七號巴士經過，很多菲律賓人及外國人在那兒下車，特地來聖德肋撒堂望彌撒。那些菲律賓人不是現在的菲傭，是很「身光頸靚」⁸的，很摩登、很有錢、很前衛的。當然有些看樣子是「band 仔」⁹，我雖然年少，也分辨到是 band 仔來的。

那個地方附近有喇沙、有瑪利諾、聖羅撒，在裡面讀書的，各類「好叻」¹⁰的人都有，又有 foreigners（外國人）。這使聖德肋撒堂變成是一個，很有趣的，華洋雜處的地方。在參與彌撒的教友中，基本上都會有一班來自附近、夾雜中、外、混血的學生和家庭。我們在聖堂如果被派到負責維持秩序，有時都要講英文。

你知道那時的彌撒全部都是拉丁文，就算拿著本彌撒書，好厚、很大本、燙金邊的，很多人都是拿著串玫瑰念珠在念。即是，他有他在念《玫瑰經》，上面有上面在做彌撒，到時候就站起身、跪低；都無得對答，都是拉丁文來的，唱的歌也是拉丁文，有一、兩台英文彌撒，但分別只是講道用英文還是中文。

其實，中國人社會的價值在那裡還有很多。我見到有人在牆腳插香，也有的用元寶蠟燭來拜，當然不多，久不久就會見到。有些「婆仔」還會裝完香就進入聖堂望彌撒。

⁸ 衣著打扮光鮮的意思。

⁹ 對以樂隊形式表演的男性的稱呼。

¹⁰ 很棒、很聰明的意思。

明愛工作三十五年

鍾炳霖在香港電台從事播音工作數年後，在 1972 年加入香港明愛，直至退休。他坦言當初只是想做一些關心社會議題的工作，並不知道社工確實是怎樣的一回事。他首先服務於牛頭角明愛社區中心內的小組及社區服務單位（當時一般稱為青少年中心），入職翌年已經主動向上司自薦兼做社區發展的工作。

我其實不是太知道明愛是做甚麼的，都不知道社會服務是做甚麼。我是純粹很想由電台走出來，我被它困了幾年合約，日日講到我口水都乾了。我又不是完全不知道社會上的事，因為那段時間，又有反越戰，社會上有很多社會問題，特別是由大陸走來的人士，住街邊紙皮屋，包括老人、兒童、失業和貧窮等這些問題，你路過都見到。

我本來是很想做那類工作，那類工作在我入了明愛之後，才知道是要用社會行動或者社會組織的方法可以做到。

在我工作的辦公室，除了是青少年中心的辦公室外，隨著服務發展，也加入了社區發展隊，於是，便同時是社區發展隊的辦公室了。我跟上司說，我可不可以兼做兩個單位的工作？除了她同意外，當然亦事先得到了社區發展隊的督導同意。我想明愛歷史上只有我一個是這樣，以後亦沒有同時在兩單位服務的前線工作人員了。於是我就開兩邊的職員會議，做兩邊的工作。

那邊是做一些社區發展的，譬如九龍灣，那時還是爛地來的，仍是 squatter area（木屋區）、resite area（安置區），及觀塘茜草灣、復華村等。而這群人的前身，是在明愛東頭邨裡做關注東頭邨廁所事件的；因為那些邨的廁

所是沒有門的，女孩子被人非禮、被人偷窺之類。即是關注類似這些社會問題，其實我想做這些。結果，我在爭取環境改善的九龍灣安置區和爭取九年免費教育的行動中幫手。除了參與策略及推行，我更曾將一些歌就九年免費教育重新填詞，給不同區的社會行動參與者唱，唱通街，凝聚力量。

但同時，我兼顧我平時的青少年工作，搞社交舞，開結他班，都有意思的，帶小朋友的圖畫組，小孩子組員大帶細地互助，很有家庭氣氛。牛頭角明愛季刊出版義工組及其他義工小組，會寫文章關注時事，後來的人稱之為 Social Concern Group（社會關注組）。

當時明愛正在發展，仍未發展成老人服務的先驅老人服務組群就依附在我們青少年中心內，以每周兩個下午運作，招待七、八十位老人家，我又被分派在老人組工作。當時我亦以特別活動，如民歌晚會、音樂會或分享會等方式，帶人們去看社會在發生甚麼事，睇返越戰、爭取中文合法化的過程等，我也在自己所帶的青少年小組中，放這些內容。不過那段時間很短，大約兩年，然後我去了讀書。

我由一個有些人很羨慕，生活像是多姿多彩，又高人工的電台播音員，轉做一份當時少了成千元的工（當時一般文職只每月三百多元人工）。我去求職的時候，給我面試的高層說：「嘩！你人工還多過我這麼多，你走來做甚麼？」我說：「我相信我喜歡這工作，昨天經過洗衣街，還看到一位老人家在街邊紙皮屋的小櫈上，很小心地吃著恐怕不多的食物。我問，怎麼會這樣？」

服務所有人的天主教機構

明愛作為天主教會的社會服務機構，鍾炳霖認為機構內的天主教氣氛並不算濃厚，這是很自然的，皆因「明愛在它的宗旨裡說明是不分宗教的，所以它不 sell (推廣) 宗教」。

機構的宗旨是這樣寫的，那你就這樣 lay down (制定) 你的目的，也就是配合了所有源於基督宗教文明的社會服務的理念和目的，是以人為本，沒有偏私的。明愛接受政府約百分之九十資助，政府會看你在推行服務時的人手與時間投入是否符合你的服務承諾，即是政府沒理由給你錢去傳教。不過，就有機構形象 (corporate image) 和社會服務理念這些東西。明愛打著天主教愛與關懷、倡導公義和平這些源於基督文明的理念，實踐得好，便傳達了天主之愛的訊息，亦滿全了天主的旨意，使需要幫助的人接受幫助及最終能得自助自主的尊嚴。

很多教區人士以至神父對明愛有誤解，嚴重的會以為明愛是教區的附屬品，或以為可以在明愛取得優惠，以為教區可以隨便調動明愛的資源。鍾炳霖舉例，某區一間小學來了一位新校長，聽說在教區有點聯繫，希望鍾炳霖派同事每周一節到校做福傳課。

當然不可以，她便到明愛總部投訴，說天主教單位也不幫天主教小學做福傳。總部大惑不解，但也要來電調查。還好，我負責的這個單位所屬的堂區神父是這中心服務諮詢委員會的神師，便由他出馬，向該校長解釋：其一、社工的工時投入 (input) 並無福傳這項，難以算入服務時數，除非說謊，或逼人做義工；其二、她說她的老

師很多不是天主教徒，難以做福傳，其實，明愛天主教徒社工佔比例也很少，大家處境相同。

雖然明愛服務不分宗教，而員工亦不一定是天主教徒，我當時的上司、高層也不是，當時機構的財務秘書甚至是回教徒，天天在辦公室到時到候都伏地做他的膜拜。但其實大家都知道，明愛是存在著作為教徒而獲得升職，或不合學歷資格聘用的優惠的，有傳有些人是為了升職而去領洗，這情況在早期制度未建立得好時明顯有發生。故此我對於自己是教友身份低調處理，亦秉承機構宗旨，對不同背景的同事一視同仁。對新入職同事，在 orientation（入職導引）時，明知他是天主教徒也好，我都會對他們說，明愛是一個 social welfare agency（社會福利機構），社工以社工專業去服務，教友亦然，不分國籍、不分宗教；至於如何以天主教教義影響受眾，那是個人的本事，但提醒所有同事遇到墮胎的個案時，要緊守機構尊重生命的立場，免做墮胎轉介。

事實上，為容納不同宗教，深化認識宗教與人生，有一段時間，明愛曾和堂區合作，揀適合的服務單位和適合的同事，負責與服務受眾建立一些「靈修小組」。這些小組，真的是不分宗教，有天主教、基督教，甚至佛教都可以參加的，旨在探討人生、幫人自省，即使你是佛教徒，大家都會有些共同的想法。但是只維持一段短時間。

明愛還有其他與堂區合作的事工，甚至在各正式服務以外有間歇召開堂區工作統籌小組。然而，鍾炳霖看不到實質上有明愛社會服務跟教區融合的計劃步驟的做法，甚至有人虛報實況，使他毅然退出參與。其實明愛與堂區關係，受制於宗教與專業，以及明愛這服務單位遍佈港九

新界的大機構的綜向及橫向管理的矛盾與隔核。至於明愛內部用人以宗教背景作為優惠考慮，到最近似乎陰魂不散，死灰復燃，以至一些人事升遷拖延，相信亦一定程度上影響服務。

鍾炳霖加入明愛時，宗座外方傳教會力理得神父（Francesco Lerda）已是明愛總裁，他認為力神父既強調明愛服務的宗旨，又沒有降低和淡化其宗教性。

他是我相當尊敬的神父，是他帶給我們所謂的「明愛精神」。現在你問明愛那些人，沒有人會講，甚至覺得好好笑。他常常所謂「派麵條」，即是訓話，講的都是如何 care for community（關心社區）、如何 serve（服務）人、先知與僕人角色、無盡發展 eternal development、參與 participation 及解放 liberation 的循環軌跡等，自己做社工，要如何 diminish（縮小）自己的 self（自我）以實現服務對象的自主自立。他當時所說著的，已類似解放神學，部分相似現代摩登術語之充權 empowerment。

他也頗重視神修；例如，我們有活動是跟他一起的，他一定會開彌撒。我們去明愛的營地做 Annual Camp（周年營會），他一定在那兒做彌撒。而且，其實他每逢星期六、星期日，就會去明愛的營地，他就在那裡住，在那裡開彌撒。

他不是 playdown（淡化）宗教，他一方面講社會參與，但從來沒有降低宗教的重要性。反而因此在提供服務時，同工在履行專業服務宗旨時，在理念上得到宗教的和應與支持，使之更為堅實，對「打份工」意識肯定有抗衡作用。這是他的繼任人沒有做的。

面對社會轉變與挑戰的明愛

以前與社工行家閒談時說起，說明愛是第二個 SWD（社會福利署），意思不是說它跟 SWD 的做法，而是規模大到好像第二個 SWD。有一段時間明愛是站得很前的，又大，有些人又 outspoken（勇於發言）。這是早期的。

我覺得有時明愛不是抱殘守缺，而是宗旨頗硬。因為同期發展的，你看其他機構，例如看 Lump Sum Grant（整筆撥款津助制度），他們千奇百怪，為了省錢甚麼都做得出的。明愛就不是，即是堅持，寧願自己想辦法「搵錢」，就不會虧待自己的同事。明愛是在一筆過撥款推行早期，唯一一間沒有跟社署薪級表脫鈎，仍然跟著同一個薪酬制度的機構。不過慢慢，當然裡面一些好細緻的行政事務，就好難解釋，例如慢慢變了不是 permanent staff（終身制僱員），都要請 contract staff（合約制僱員），如果請 contract staff 就有很多 loophole（漏洞）可以走。

我是「企得硬」¹¹ 的，譬如屯門有幾個單位都是我一手一腳開的，例如青少年綜合服務、外展、容圃中心。剛好那段時間是 Lump Sum Grant，數年下來，其他一些服務隊伍被 cut（裁撤）得肢離破碎，機構其實對我的人手虎視眈眈。但我可以「企硬」支持下去，這當然是要明愛支持，我的機構、我自己的上司支持。

明愛曾經有過一段堅持於社會和政治參與的日子，但在大環境的轉變下，也逐漸改變。他經驗過高層在不同時期對前線工作的施壓，都與

¹¹ 堅持的意思。

社區發展這類爭取權益的行動有關。他認為這跟教會和資助來源有關係。

早在我還是在牛頭角明愛負責兩邊單位工作的時候，社區發展那個上司，被我們大老闆召去問話，當然不是大老闆的意思，是教區以至政府的意思，責其走得這麼前、搞這麼多事。她自己見完回來說：「我沒辦法，那時我唯有不斷哭，我答不到他。」那壓力是多厲害。

在我退休前，亦知道因為有社區中心同事參與抗議遊行而令高層被社署署長當眾訓示。明愛社會服務是受社署資助的，壓力是在那裡。至於，有多少是教區的壓力，我不知道。這是一個長期的 struggle（掙扎），一直都爭取做社會參與、社會關注，有一段時間是相當「勁」，人人都知道，行家都知道，有好多行家都羨慕我們的堅持。但慢慢地，時移世易，人事變動，一代一代不同了。

我離開明愛的前七、八年開始，得到明愛整個青少年及社區工作服務及其屬下十幾個單位的支持，各單位抽一個社工同事，成立了一個關於青少年關社工作發展策略的協調小組，推行在服務層面及地區單位的青年關社工作。如此抽調人手，而且老實說，關社並非各單位的路向，長久下來，雖要應付統籌、游說及反彈的壓力是很大的，但我始終「撐住」，因為青年關社不可不做，一定要做。但慢慢我走了，後來聽說，「撼下撼下」¹² 這架構、這類事工就沒有了。是否沒有人像我般「企得硬」呢？我不知道，他們有多支持這個方向呢？好明顯是慢慢走向輔導，現今人們最受落的輔導。

¹² 「撼」是一種細微的動作，把東西撕去、剝掉；「撼下撼下」就是逐小逐小減去的意思。

最近他們出版了一本書，我有幸，都算是書裡面受訪問的其中一個經驗社工，但整本書都是談輔導。我當然做過很多輔導工作，我做處理邊青的外展、做吸毒問題、精神健康等，我為何不做輔導呢；我也可以說我做輔導都「幾叻」，我經常要督導在我不同單位的下屬做輔導。我不會說輔導不好、不重要。但我覺得，青年關社應該獲得同樣的關注，也就是有沒有人會出一本關於明愛社會關注的書呢？只會出一本書是關於輔導。我跟同事說，這可以反映現在走的是甚樣的路。或者有待將來吧。

除了明愛，鍾炳霖也在其他平台上，燃燒他關心人、關注社會事務的心火。自九十年代起，他一直參與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並擔任過多屆主席。退休後的他依然忙碌，時而參與正委會的研討會，時而參與遊行示威。在日益嚴峻的社會環境裡，鍾炳霖依舊本著良心「企硬」。

與勞動人民一起的農家小子

—— 華天祿神父

(Fr. Paul Vallat, MEP)

1939 年	出生於法國
1966 年	晉鐸，到越南服務
1977 至 1994 年	到香港服務，在工廠打工、從事基層工作
1983 至 1991 年	任公教職工青年會（工青會）神師
1994 至 2000 年	任國際公教職工青年會（IYCW）亞太區神師
2014 年	榮休



（圖：華天祿神父。圖片來源：公教報，攝於 2016 年）

訪問：陳樂信、黃奕清

撰文：陳樂信

晉鐸逾半世紀的巴黎外方傳教會華天祿神父，無論兒時在法國家鄉，抑或正值動盪的越南，還是來到香港，一生都與勞工和基層家庭在一起，與他們生活，並向他們學習。認識華神父的人大多稱呼他「華仔」，這正表達了他是一位謙卑、與人親近的牧者。

農家小子

華神父出生的當天，正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宣布開戰的那一天。他的父母本來務農，養活一家八口，但後來在工業化及現代化的潮流下，他們也要到工廠工作才能夠維持生計。

我在1939年出生，當媽媽聽到開戰我便出生了。爸爸因為要當兵，已離開了家庭。那時候為人父母，甚至做人，都很困難。

我父母都是農夫，與我們六個兄弟姊妹住在法國東北部的鄉下，一家人憑自己的勞力都足夠應付生活。後來社會有很大的轉變，農民有多努力都「搵唔到食」¹，周圍都變成公司，但是我們不能夠建立一家公司，我爸爸要到隔鄰的一間工廠打工，才可以養家。

再次成為小孩子

華神父成長的環境，跟歐洲大部分村落十分相似，他的鄰里都是教友。雖然他年紀輕輕便順利進了修院，但在聖召辨別的過程中，也有搖擺不定的時候。

我開始做輔祭，也有意做神父，我入讀小學時已經有這個念頭。我們整條村都是一個團體，信仰生活為大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讓我覺得做神父很好。當時只是一個夢想，小學畢業後升讀中學，就在那時進入修院。

¹ 廣東俗語，即不能維持生計的意思。

我在中學讀哲學和神學，在十九、二十歲的時候，也有一點懷疑：是否真的要當神父？天主總會尋找你走回正路，我繼續朝這方向去。

而且我想過有些神父並非留在法國的，而要去到遠方，去未有信仰的地方，找未認識耶穌的人。那時透過與天主的關係及祈禱的生活，我感得福傳未必要留在自己的家鄉，未必要留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天主要你去哪裡，自己並不知道，在適當的時候回應天主便是了。

就這樣我有了一些方向，或是進苦修院，或是去傳教，到不認識的地方，可能要再次成為一個小朋友，學習語言及另一個民族的文化。最後我作出的決定，就是加入巴黎外方傳教會，因為這個團體是去亞洲的，是離開我們很遠的地方，很不同的地方。這是一個大的挑戰、好的回應。

當年傳教會的習慣，是待修生祝聖為執事，才安排他們的去向，而這時修會決定派遣華神父去的地方，正是他最不願意去的——越南。

那時候會長讓我們按個人期望，提出想到那裡，並且可以給予意見。我去哪裡都可以，只有一處地方不想去，就是越南。越南以前是法國的殖民地，我不想去曾經是法國殖民地的地方，去印度、日本、韓國或中國都可以。

我不想去法國控制過的地方，因為傳教未必順利，而且事實上在越南，很多人不喜歡自己國家曾經是法國殖民地的這段歷史。最終，我竟然是派往越南！那時，當地正在戰爭中，我的家人很擔心，問道：「那裡多年在打仗，你去做甚麼？」

讓人成為自己的導師

越戰發生於 1955 至 1975 年間，華神父於 1966 年到達越南，在胡志明市堤岸服務平民區內的華人。成為傳教士之後，他首先體驗到的，是一個新的學習過程。當他跟當地人的關係越深，越察覺到不公平的情況及種種的社會問題。作為他們的朋友，華神父思索如何與他們同行。

在越南很多人要當兵，特別是平民和窮人。如果你有錢，就可以避免，但平民沒法子，因此有很多寡婦。我在越南接觸的區域，就是那些平民生活的地方。

越南是一個很好的地方，好在哪裡呢？在平民區裡，你到哪條行、哪個區，人們都很歡迎你，尤其是如果你懂得他們的語言。平民區很多人講廣東話的，潮州人、客家人、廣東人、福建人，人人都講廣東話，所以我學廣東話，又要學越南話。

那時，我看到自己的不足，需要別人帶領的、要向人學習的，不只是語言，也是生活，也是認識別人。也就是說，不是你到那裡做老師，而是別人做你的導師，學習就是謙下自己。你要成為他們的近人、朋友，一旦成為朋友，他們便會帶你深入他們的生活。在那裡，我看到貧窮、疾病和眾多的小朋友。

那些小朋友沒機會上學，我跟一些人安排民眾識字班，為小朋友提供基本的培育：讀書、學習語言和遊戲。這些事並非獨自一人能做得到的，一定要和一些人一起關心他們。民眾識字班有本地的青年，他們很多不是教友，不認識這個區，甚至未去過，只知道是貧窮的地方。他們

知道我住在這區，因為你在那裡，有些人跟你去，而他們也成為那些家庭的朋友，即是建立關係。

到了 1975 年，越共奪得控制權解放越南，華神父見證這個大時代。當很多人選擇離開的時候，他選擇留下，卻又事與願違。

所有人都要憑雙手謀生，以前做的事現在都不能做，沒有人去打工，全部要去挖地，我也跟著一起去挖，這就是解放的生活，生活中的事和經歷，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愈來愈好、愈來愈密切。我經歷過很多辛苦的事，不過能與人們在一起，都顯得十分值得。

有些人一解放便走了，我則因為解放，更想留在這個地方。不過由於我是外國人，始終被趕出來了。我在越南經歷了十八個月的解放生活。

華神父用盡各種理由和方法嘗試留下來，但最終於 1976 年被迫離開越南返回法國，在當地協助安置越南船民。

走進香港工廠，與工人做朋友

華神父 1977 年再次被派遣，來到香港。這裡是另一套的生活方式，跟越南截然不同。他當時對香港有這樣的印象：

我初到香港時，驚覺這裡有很多東西是「假的」！假髮、路邊攤檔的假花、茶樓內五顏六色的塑膠用品，還有茶樓樓梯長長的紅地毯，而且人們會跟我說英文，感覺上很陌生。

華神父在香港服務的第一個堂區，是柴灣海星堂。他在牧民工作的初期，多次碰壁，對香港的人情冷暖，又有另一番體會。

第一個經驗是，我遇上一位女生，十七歲左右，她流著淚來找我，哭訴學校跟她說：「你不行，要到另一間學校。」

我認為一個學生如果成績不好就要教好，要協助他改善，培育他。如果只跟她說：「你不行，要去另一間學校。」這樣會令這個學生很失望。我跟這名女生去找她的校長。校長是一位修女，她跟我說：「神父，你不懂，你不要理會她，她一定要去另一間學校。」這次對我來說並不是好的經驗。

另一次經驗是，我和一位修女晚上八點半去探訪窮人。探訪的家庭會說：「神父，你很清閒嗎？我們都未放工。」或者，他們會告訴我正在洗澡，還未吃飯。我感覺像是在阻礙別人，他們還沒有準備要和我建立關係。

就在那時，華神父決定不要留在堂區，因為堂區通常都要兼顧學校事務。他開始投入工廠生活，接觸基層工人，親身去福傳，以行動表達天主的愛。

我去了一間塑膠廠做玩具，另一間是做文具的。本來主教想安排我當海星堂的本堂神父，但我已經進了工廠，而主教也知道我在打工，半日在工廠，半日在堂區。當時的主教胡振中親自問我：「如果你願意，就做本堂，如果不做，請通知我，給你一個星期考慮。」一個星期後，我跟主教說：「我希望繼續在工廠工作，你派我去有工廠區的地方就好了。」

於是，華神父獲調派到新蒲崗善導之母堂。在 1977 至 1994 年間，他從事過不同行業的工作，包括製衣、機械、電子等，曾駕駛小型貨車送貨，亦曾經歷過遭人解僱，和他一起的工友們大都不知道華神父的真正身份。

我去打工的時候沒有人知道我是神父，我不會在工廠傳教「講耶穌」的。他們只會覺得「鬼佬」失敗了，來這

裡打工。後來他們看到我在伍華書院出來，會問：「你在那裡做甚麼的？」他們才慢慢知道。

華神父以工人的身份與工友拉近距離，並且建立互信的關係，大家都樂意和他分享生活的瑣事！

向青年工人學習

早在五十年代「公教職工青年會」² 這個教會組織已在香港成立，目的是協助職工青年們發現生活的真實意義，並使他們也負起責任去尋找改善實況的方法。八十年代時，華神父成為了這個在職青年運動的神師。

從 1983 到 1994 年，我一面在工廠打工，一面做公教職工青年會的神師。這個運動的特點，不是從上而下由神父計劃，而是由工青他們計劃。工青會有他們的領袖，在不同的區域有他們的負責人。

我在那裡有很深刻的體驗。工青的理想是，每個工人都要成為領袖，有個人的想法，有個人面對的生活情況，由自己和其他人建立關係。

例如，我們以一個人際關係的課程，宣傳公教職工青年會，由一個工青領袖負責至少八次聚會。我參加完第一次聚會之後，這位領袖跟我一起檢討，我回答他聚會辦得不錯，人人都有參與，大家都頗主動。但他問我：「你有沒有留意到有位女生，整晚默不作聲的。」我作為神師沒看到，但他留意到十六人之中，這位女生有點異樣，建議我多點接觸她。

² 香港公教職工青年會（簡稱「工青會」）成立於 1957 年，是國際性的天主教職工青年組織，總會設於比利時。

這位工青領袖的洞察力果然厲害，原來女孩和父親的關係不佳。這些事情，就要在工青的聚會中看到，然後跟這個人認識、跟這個家庭建立關係，讓這個人有點信心。那位女生後來也成為工青一個小組的領袖。

這些往往不是神父做得到，而是有賴工青會的領袖懂得接觸和留意。我作為神師，只可以陪伴和鼓勵，遇上特別問題便加以協助。而且，香港工青會很多成員不是教友，連領袖都未必是教友，當中只有幾位是教友。

這些工青會的領袖，其實很欣賞教會有生活、行動和祈禱，即是有人的經驗。他們會留意周遭發生甚麼事、問題如何影響人、有問題要跟誰人去改善，以及要有甚麼行動。這些都是長遠的行動，因為不能說一次就解決，至少要一年的時間才能解決。工青會的領袖有他們的課程：培育組員學習觀察、願意行動，以改善關係、生活和環境等。

香港教區在 1991 年成立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簡稱「勞委會」），在籌組的過程中，工青會也獲邀出席會議；然而，華神父對勞委會有獨特的見解。

勞委會是怎樣建立的呢？是因為教會想關心工人而立的。勞委會要找主席，然後職員，有職員才可以執行計劃。而工青會的運作則不同，是工人們自己思考、決定和計劃去做一件事。如果不是這樣，工人未必跟從，也未必來參與活動，而且未必達到培育的效果。勞委會和工青會在理念上是完全不一樣的。

隨著香港社會的製造業向中國內地北移，工青會也悄悄起了變化，並在 2013 年 9 月 29 日舉行的五十六周年紀念典禮中，宣布「暫停運作」。

發展讓人建立關係的堂區牧民

華神父在 1994 年開始擔當國際工青會亞太區的神師，直到 2000 年才重返香港的堂區，先後服務於青衣聖多默宗徒堂、九龍灣聖若瑟堂及葵涌聖斯德望堂。工青會的經驗，影響他的牧民方式，以及與教友的關係。

2000 年時，我在聖多默宗徒堂和歐陽輝神父³一起工作，跟青年一起，而且是在職青年的小組。我覺得教會最好就是以小組形式推動，在不同地區發展信仰小團體，教友在聚會當中可以唱歌、分享生活、分享福音和祈禱。

後來我被派遣到九龍灣聖若瑟堂，在那裡去家訪，是很好的經驗，是很值得做的。現在我覺得香港缺少的東西，就是人與人的關係，這不是靠一個電話或 whatsapp 所能做到的。

如果教會不保持與人的關係，發展便沒有意思了。教會內要互相聯繫和支持，彼此分享福音，慶祝生活。堂區的計劃，要與教友一起計劃，做本堂不是做老闆；如果神父要做老闆，教友會怕了他，所以神父和教友一定要做朋友。

³ 歐陽輝神父 (Luigi Bonalumi)，意大利籍，屬宗座外方傳教會，1989 年來港，1993 年在青衣服務。

工人運動裡的酵母

——黃學明

- 1942 年 出生於香港
- 1955 年 入讀香港仔工業學校
- 1956 年 領洗於香港仔工業學校
- 1959 年 加入公教職工青年會（簡稱「工青會」）
- 1961 年 當選工青會副會長，及後多年擔任會長、發展委員等
職位
- 1995 年 退休



（圖：黃學明先生，攝於 2018 年）

訪問、撰文：陳樂信

香港在戰後五、六十年代，憑著工業發展，經濟突飛猛進，同時也因為種種的勞工問題，形成了不少勞工組織和活躍的工人運動，為工人充權。

教友黃學明是「公教職工青年會」的資深成員，以工人領袖身份，見證香港工人運動的發展和天主教會在當中的參與。從他的故事及所見所聞，亦可以看到一些傳教會為回應當時的社會需要，除了帶來救濟物資，亦傳入了社會運動與社區組織的思想和經驗。

小學階段——左派初接觸

黃學明一家七口居住在紅磡，父親是黃埔船塢工人。黃父把孩子送進左派背景的小學，漸漸發覺學校所宣揚的共產黨訊息有問題，於是黃學明後來轉讀紅磡街坊會小學，遇到當時來實習的司徒華。

當時的香港來說，大家都會知道那個環境，左右兩派政治團體的角力很大。我爸爸在船廠，當時黃埔船塢是很出名的，那裡是共產黨那邊的工會，他們在我們區內都辦了一所學校——勞工子弟學校。我小學的時候，就送了去那裡讀書，讀了三年。

學校給我們的那些老師，我現在可以認識到所謂的統戰工作，做得非常緊密。老師可以和家長打成一片，晚上開設一些興趣班、縫紉班，日間辦一些合作社，跟家長一起做；還有課餘活動，放學後的，老師都和我們一起。

我爸爸發覺，聽來一些訊息，對共產黨沒好感，他知道這學校是共產黨的。於是我讀到三年級，他把我轉到街坊小學，稍為中立一點。當然他在船塢工作，他認識一些稍為有份量的人，在街坊會內有點職位的人，介紹我入讀，在那裡讀了三年。

這三年裡，當然與起初那小學是兩回事，有規模，老師很嚴。讀到五年級，學校不知道從那裡收到訊息，華民

政務司¹想找些清貧學生到香港仔兒童工藝社，即現在的香港仔工業學校，是慈幼會的。我被選中，而家人又讓我去。幾經華民政務司署的面試、篩選等等，媽媽帶著我很多次去中環，最終給我入讀。

我好欣賞我爸爸和媽媽的決定；我是排行第二的，那時實在很窮。華民政務司，即是政府的部門，它看我爸爸一個月可以付多少錢，那裡是寄宿的。

中學階段—教會學校寄宿生活

香港仔工業學校原本是一所兒童工藝學院，於 1921 年設立，由四位華人領袖仿倣外國做法，讓一些因家貧而失學的兒童和青年學習謀生技能。學院於 1935 年建成校舍，同時把管理及教育的重任交予鮑思高慈幼會負責，至 1952 年改名為「香港仔工業學校」（簡稱「香工」）。² 在黃學明的記憶中，當時學校的神父都是外國人，也有一些中國人修士負責管理。

我們有分大班、中班和小班，修士跟我們一起，而外國神父當校長、副校長、校監，這幾位都是神父來的，他們的廣東話很好，不用講英文。每晚有晚禱，站在一起，念完經有神長訓話，然後才能睡覺。

因為寄宿，每天有規律、有時間表，早上起身就去聖堂，祈禱、念《玫瑰經》、早課、望彌撒，天天如是。我們星期六下午、星期日不用上課，下午在自修室，主日就有位神父來講道理，使我們認識天主、天主教。最深刻印象的，就是《創世紀》。

我在 1956 年領洗，那時是在聖誕子夜彌撒領洗的，在學校。領洗後，更學做輔祭，當時用拉丁文，彌撒都不知

¹ 華民政務司，為華民政務司署主要官員，早期又稱為總登記官，專責處理華人事務，諸如出入境統計及監督本港華人組織，同時亦為政府建立與華人溝通的渠道。

² 參「香港仔工業學校」網頁：<https://bit.ly/2I9LQuB>。

講甚麼，神父背著我們教友，我想只有我們這些老教友才記得。

當時所認識的天主教，個個都是「鬼佬」，沒有中國人；我認識初期，沒有中國神父，我沒怎麼認識他們。我們學校對面山就是華南總修院，即現在的聖神修院，只知道是培養神父的。

雖然我是在學校聽道理，但我覺得，現在才知道，原來我們是很不足的，和現在的慕道班是完全不同。（背）《要理問答》都有個好處，就是你要識，但不求甚解，有些是解不通的。

踏入社會，加入工青

黃學明自言不擅工藝，未畢業就出來工作，經工青當時的副校長介紹，加入英資公司「香港電話」。離校待業期間，他每天到紅磡聖母堂輔彌撒；至入職後，屬聖母聖心會的本堂神父向他介紹公教職工青年會。工青會與聖母聖心會一樣，都是起源於比利時，是香港首個以藍領公教青年為主的團體。在工青會的參與，成為黃學明認識教會的另一個階段。

我們的公司，不是左派工會，就是右派工會。左派工會是大躍進，58、59年，他們叫些工友去參加歡送會，歡送那些工友辭工回祖國大躍進。我知道，那時有點認識，教會有點暗示，小心不要跟共產黨有那麼多不太好的接觸。我回去問本堂神父好不好，本堂神父沒答我好不好，他只是介紹：「我們有個工青」，介紹我入工青會。

最重要的是，當時教區白英奇主教³，他是米蘭會，

³ 白英奇主教（又名白勞靈，Lorenzo Bianchi，1899-1983）出生於意大利，1923年來港，1952-1969年任香港教區主教，1983年逝世於意大利。他屬於米蘭的郎巴地外方傳教修院；此修院於1926年與「羅馬宗座外方傳教修院」合併，成現在的宗座外方傳教會。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白英奇主教〉：<https://bit.ly/2lu65n7>。

現在的宗座外方傳教會，以及他有一群神父，在不同的堂區。

其實工青會是由慈幼會謝維道神父⁴開始，1957年去羅馬參加第一屆（國際工青）大會，聽完之後，覺得香港是需要做、可以做。當時他率先在荃灣的南海紗廠組織工人，因為那裡有男子宿舍，而且有一位教友科長，也很歡迎有一些教友聚會。

我不知道慈幼會或者他如何交給白主教，交回給教區；後來就有力理得神父⁵從意大利過來，他是社會學博士，是明愛總裁，早期在竹園，由他重新再開始工青。

由堂區開始，向堂區神父介紹工青會。那時每個區都有工廠，工青起初在香港、九龍、新界都有。香港在西營盤和中環，靠嘉諾撒修女那邊，聽說因為嘉諾撒聖心那裡有些孤兒，有些在職的，或者職業學校，去認識那裡的青年。

我們在幾年內發展得很快，在不同的堂區；觀塘是個重點，黃強生、林櫻英修女都是觀塘的。我當時都未搬過來，還在紅磡。其實當時工作沒有分地區，你在那兒住，但未必在那兒返工，哪裡有工作你就去那裡，甚少可以原區返工。

當時荃灣是重點。因為女仔多，拯望會在眾安街開會，聚集女仔；至於男仔，後來也租了個單位，給男仔用的；後來才有荃灣明愛。而九龍區就在紅磡，當時我剛剛認識工青都是在紅磡，亦是它剛剛開始。

在工青的過程中，可以說是另一個轉捩點，對教會更

⁴ 謝維道神父 (Natale Cerrato)，慈幼會士，現居於意大利。

⁵ 力理得神父 (Francesco Lerda) 屬宗座外方傳教會，於1959-64年及1965-74年間擔任工青會神師。

加認識。因為我們每次接受訓練時，我們要訓練的，有普通會員、基本會員和領袖訓練，除了祈禱的經驗，還有《聖經》，讀《聖經》、認識《聖經》、福音，而最重要一點，就是耶穌教導我們甚麼。在那時我們要學「觀察、判斷、實行」，一方面讀《聖經》，第二方面在每次的例會裡，都有一個叫「生活檢討 Review of Life」，每個人講出近況、家庭、工廠，從中你看到些甚麼，然後大家一起商討。

為何我們要用這個方法？第一，認識、了解實況，然後想想，如果耶穌在這個情況下，祂想我們做甚麼。所謂的「see」就是觀察，認識實際環境如何，然後看看教會、法例有沒有抵觸這些事，特別在工廠、工作，最後思考有些甚麼解決方法，有甚麼行動，就是「See Judge Act」。

在工青裡學習這些，也是慢慢成長的，所以一定需要神父，他做一個指導，耶穌在當時，祂會怎樣做。神父也說，我是代表耶穌，在我們工友之間，在這個團體裡，我是耶穌的代表。

六七暴動下的天主教工人運動

1967年，香港的親中愛國左派為配合大陸的文化大革命，以「反英抗暴」的名義在香港發起工潮，甚至演變成暴力行動，他們以工人階級為主。黃學明提到，香港教會和工青會在當時都是沒有角色的，而當時參與工青的神父釐清工人運動與工會之間的分別。

有些微矛盾的，不過當時我們的討論，神父對我們說，工會是工會，它是一個合法的代表，我們可以的話，最好加入工會，但當時的工會是左派工會，你很難加入，亦不想加入。

我們只有在工友之間接觸，認識一個真正的工會，怎麼團結，或者有行動時，大家如何互相知道情況。甚至在大罷工時，人造膠花廠，我們工青會已經進入了這些不同的機構，我們電話公司也有靜坐，我們領袖有時也有幫手，都認識這些事。

我印象最深是，六七暴動之後，政府開始有一些社區中心（疏導青年），給他們有些活動、學習的機會，在荃灣雅麗珊郡主中心，當時荃灣明愛中心開始。當時的理民官⁶和我們的神父好熟悉，神父和政府的關係都十分良好，他邀請我們派一些青年領袖去那邊接觸青年，這也是很大的參與社會和政府。

工人運動在全球各地均被視為左翼份子，教會人士，尤其是神父，常會有所避忌。按黃學明的經驗和觀察，在香港教會裡這並不算很明顯，但一般認為基督徒是不應該參與有政治色彩的行動。

當時的神職人員對於工人的情況、所需要的東西，他們都不太認識。很幸運，教區一早委派了一位總指導司鐸，然後每個堂區的支會都有神師，否則我們真的很迷茫。

當時力理得神父，因為他是社會學家，他的層面會闊一點，或者他和主教的溝通，使主教認識。但我猜想，那時大家都是摸索，除了力神父，大家都是摸索。但是我們相信，我們基督徒，祈禱、學習《聖經》，幫助我們很大。

⁶ 理民府的首長，是英人租借新界初期的重要行政機關，早年集警官、地方法官和土地官於一身。1982年政府實施地方行政，各區的理民府改為政務處。參陳天權：〈新界理民府〉，《大公報》，2013年10月11日。

教會參與爭取勞工權益

「工人司鐸運動」的興起，加上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簡稱「梵二」）帶來的新氣象，鼓勵了不少神父走入基層的生活。在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於社區發展工作的前線及爭取勞工權益的運動中，亦不難發現外國神父的蹤影。

在梵二之後，一方面有些神父還俗，一方面開放了，不少神父到工廠打工，接觸工人。其實華神父（華天祿）、甘仔（甘浩望）之前也有，例如區神父，區成賢、萬籟寂神父，甚至恩保德。⁷

70年以後才開始有瑪利諾會，主要在盲人工潮。瑪利諾會幾位神父，包括戴能皓神父⁸，他們組成了「勞工輔導組」，黃強生在那裡幫手。他們會去勞工處，代表工友。

勞工輔導組比較積極，因為見到當時教會都無能為力，沒有全職的人，如何關心工人？如何接觸工人呢？即使我們做領袖，是在工廠裡做而已，在行動上我們做不到很多。他們神父則不同，可以和全職職員一起工作，方便得多，也懂得怎麼處理。那幾位瑪利諾神父真的影響很大。

⁷ 華天祿神父（Paul Vallat）為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甘浩望神父（Franco Mella）、萬籟寂神父（Mario Marazzi）和恩保德神父（Giovanni Giampietro）均屬於宗座外方傳教會，而區成賢神父（Francis G. Elsinger）為教區神父。他們現在仍在香港服務或居住。

⁸ 戴能皓神父（又稱戴南海，Thomas E. Danaher，1934-2012）出生於美國密蘇里州，屬瑪利諾會，1962年來港。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戴能皓神父〉：<https://bit.ly/2IKyAfK>。

後期就是孟家華神父，他組織了「勞資關係協進會」。⁹ 這位神父可能認識一些大學生，是知識份子，他來找我們，因為他要想做事的話，一定要有成員，要基層。他跟我們合作辦活動，他們出錢，我們找人，因為事實上，我們也沒有經費去辦大型活動。我最有印象的一次，是在龍蝦灣燒烤。

但是，我們都看到，即是我們所認識到最重要的一點，是一個理念，只有職工青年才了解職工青年的問題，只有職工青年才能解決職工青年的問題，即是其他人幫不到你，這是我們工人青年的職能，或者是我們的使命，這是工青的精神。因為你不在其中的話，你不理解實況，你亦不能做到甚麼深入的工作，只有理論，要靠我們幫忙。

黃學明後來又認識了「亞洲社會經濟促進會」，學習由耶穌會士郭樂賢神父引入香港的「儲蓄互助社」¹⁰ 的理念，由自己生活的屋邨開始，再帶入公司實踐，這成為他在工青會以外的另一份重要經驗。他有感：「犧牲、承擔、分享這些字眼，只有在參與當中，才可以看到、學習到那一份樂趣。」

我在青年運動、工人運動裡是酵母，那時未學到地上之鹽、世界之光，未到這些，只是酵母，發揮一個催化。

⁹ 孟家華神父 (Patrick Terence McGovern, 1920-1984) 是愛爾蘭耶穌會士，在 1947 年來港。他成立的勞資關係協進會成立於 1968 年，是政府註冊認可的非牟利勞工團體，亦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團體成員。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孟家華神父〉：<https://bit.ly/2DnkIK0>。

¹⁰ 郭樂賢神父 (John Collins, 1912-1997) 出生於愛爾蘭，1937 年來港。他引入的儲蓄互助社是一種非營利金融機構，集合會員的儲蓄作投資，定期派發利息回報，亦向會員提供低息貸款。據「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網站，儲蓄互助運動在六十年代初傳入香港，天主教徒為成員的聖方濟各儲蓄互助社是於 1964 年成立的首個此類組織。郭神父是協會創辦人及永久顧問，目前有十二個天主教堂區設有互助社，受相關條例監管。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郭樂賢神父〉：<https://bit.ly/2Gxqpqw>。

敏於回應時代的轉變與需要

—— 鄭生來神父

- 1941 年 出生於牙買加
- 1958 年 任教於高主教書院
- 1964 年 入讀聖神修院，66 年往羅馬修讀神學
- 1970 年 晉鐸，出任香港聖若瑟堂助理司鐸
- 1972 年 出任西環聖母玫瑰堂助理司鐸
- 1975 年 創立「優良電影介紹小組」
- 1979 年 創辦《驛》
- 1983 年 成立「信仰探討中心」，自 89 年以「天主教綠色傳人」推行生態環保



(圖：鄭生來神父。圖片來源：天亞社中文網)

訪問、撰文：黃奕清

由回應聖召、當上神父，到後來創辦不同團體和關注生態，鄭生來神父都在實踐一份「不離地」的信仰。正如他說，自己一直都是「看著事物的演變，看著所需要的，而去回應。」

中國人身份意識的萌芽

我爸爸是在香港出世的，鄉下在淡水，客家人。淡水很多人都出去第二處，他的弟弟去了牙買加，做生意，他安定下來之後，就叫了我爸爸過去。我爸爸是中醫師，他便過去做中醫師。

爸爸比我大很多年，大我五十幾年，那時他已經接近六十歲，那時六十歲已屬老年。他弟弟離世時，他們用馬車送殯，我陪他坐馬車。我坐在爸爸身旁，他哭得很厲害，他跟弟弟很「老友」¹的。然後，他說要回來，想著要落葉歸根。他想到自己年紀大，都不會有多少年了，他想在國土死，為他香港也是國土，那就回來。

父親的這份鄉土之情，除了把鄭神父一家帶回來香港，也在鄭神父的心裡，埋下了一顆關懷祖國的種子。

始於香港的信仰生活

鄭神父的母親是牙買加人，與鄭父在牙買加結婚。夫婦二人雖然都不是天主教徒，卻把剛出世的孩子們都帶去領洗，鄭神父估計是由於母親在當地認識的一位耶穌會神父。而鄭神父對教會的印象與認識，都是在六歲隨家人來到香港定居後才開始。

我大哥去了德肋撒堂當輔祭，我就跟了他去做輔祭，那是第一次接觸教會和信仰。最主要的是去輔彌撒，做輔祭

¹ 廣東話，要好的意思。

都做得很開心。不知何時開始，每朝早去輔六點半彌撒，由東頭邨行去。

在那裡，影響我最大，而且最深印象的，是基督；在彌撒、祈禱和福音中，基督的印象是最深的。覺得祂是服務人，所以那裡都影響很深，即是服務，基督和服務。

堂區生活讓年紀小小的鄭生來漸萌修道之意，希望像神父們般服務。可是，人愈是成長，做神父的意念愈是淡化，為甚麼呢？

開始覺得神父與社會脫節，與人脫節。即是那時長大一點，就有這種感受，覺得都不太是基督那樣，基督是跟人接觸的。

在神長們的關心和多番提醒下，鄭神父中學畢業時，還是約見了修院院長，同行的還有兩位好友。這一行，卻是適得其反。

做神父的想法已經淡了，去到之後更差了。那位院長，那時他們穿長袍。我們在等他的時候，在房間內有講有笑，然後他接見我一個。他說：「你見不見到我穿黑袍？」我答：「見。」他說：「我們穿黑袍，是表達我們特別的身份。如果做神父，身份是高一點的，比教友的身份高一點的。」

然後他說：「你是否常常去旅行之類？」那時我是輔祭和歌詠團團員，有時我們也會去旅行。他說：「如果你想做神父，你要開始考慮，跟教友有少少隔膜，因為身份高一點，以及不要去那些東西那麼多。」

我立即決定，我不入去，在心裡面，我決定不入。我已經在想，神父跟人、跟社會有點脫節，去了修院還更加疏離了。不是說完全不入，但是傾向不入。

尋求與回應天主的聖意

那是 1958 年。剛巧高主教書院開校，鄭神父在堂區認識的祁良神父 (Giuseppe Carra)² 去當校監，邀請未有甚麼打算的他去當教師。鄭神父補充說：「他都是其中一位提我有聖召的。」

從事教學工作五年多的鄭神父，雖然享受跟學生的相處，但他仍然想著天主的意思是甚麼，再次思考未來的發展。於是他安排了一連十日，課後到公教進行社的小堂祈禱。這一次讓他清楚自己的意向，遂向學校辭職，正式踏進修院，那天是 1964 年 3 月 31 日。

梵二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 是 1965 年。高主教的校監有一份刊物，是英文的，報道梵二。他收到之後，看完之後，便寄給我。梵二的內容，忘了入修院前有沒有看，但入修院後，收到時便看，其中一份談修院教育 (《 司鐸之培養法令 》) 。

我見到覺得不錯，便問同學，有沒有興趣討論這份東西；他們說有，那我說：「好吧，我介紹吧。」我們坐在一起討論，都討論得不錯。但是，忘記了在討論甚麼，校方有人叫我們散會。我忘了在討論甚麼，他不喜歡，使得大家都很不開心。

² 祁良神父 (1921-1991) 屬宗座外方傳教會，1946 年在意大利晉鐸，曾在中國河南省傳教，至 1953 年來到香港，在 1954 至 1958 年間服務於聖德肋撒堂。祁神父在教育方面的貢獻尤其傑出，他 1958 年創辦高主教書院，自此的 33 年間，一直擔任該校校監。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 祁良神父 〉：<http://bit.ly/2G1gd2Q>。

即是，入修院後，梵二已經開始影響我。我又可能幸好有梵二，因為梵二給我另外一個教會觀。那時教會是內向的、關閉的，教宗在梵二之前已經說，我要開個窗，讓新鮮空氣進來，不知道他有沒有說開門，但也有這個意思，要出去，即不是只是向內，要向外。

根本我是不想入修院，但是要做神父，就一定要經修院，那就入了，要做神父沒辦法，我只想「快快趣趣」³讀完，做神父就算了，所以我對修院並沒有期望。看梵二的這些，為我是很好，而且也是我的需要。

梵二是很重要，如果沒有梵二，我不知自己會怎樣了。

羅馬假期⁴

鄭神父也果然是「快快趣趣」，哲學課程讀兩年就完成了，然後被安排到羅馬升讀神學課程。

後來，香港開始考慮派神學生到羅馬讀，不知是否做了試驗品，派了我去。66年。關俊棠、夏其龍就一早去了，他們去讀哲學。之後那幾年，出外讀神學的都是派去羅馬，後來停了，然後派去台灣，然後又停了。即是香港的神學院停了，所以派出去；香港神學院重開後，就停派神學生出外。

³ 趕快的意思。

⁴ 「羅馬假期」是《公教報》的一個專欄名稱，於1970年2月6日、3月6日和3月13日這三期刊出，是羅馬港區修士的集體創作，分享他們在暑假期間不同的進修學習或生活體驗。

當時教會剛剛有梵二，開始有新的，但又仍有些舊的。在（羅馬）修院有幾位教授比較開放和先進，但仍是舊的制度，修生都有點亂，修生都要改變，負責人未必想改變，或者思想有點不同，所以修院也有點亂，但都有幾位很好的教授。在那裡可以多方面接觸到不同的思想，不同類型的事物都可以接觸，以及在暑假可以自己周圍去。

當時令鄭神父深受啟發的其中一次經驗，是一個為期三周、關於宗教社會學的暑期課程。那是 1968 年。

我以前小時候，即未入修院之前，是基督、信仰、祈禱和個人實踐。中學時，天主處處都在，即是天主在周圍，空氣裡、樹裡，處處都在，這在中學那時已經很深刻。教書的時候，以及之前也是，個人及個人的成長，教書時是心理學、心理成長。

因為家裡窮，所以耶穌很關心窮人，這為我就很強烈。要解釋貧窮，單單做慈善工作，是解釋不到的；單單做社會工作，即是福利工作，又解釋不到；愛德工作，又是解釋不到。1968 年那次的課程，就是可以解釋為何貧窮存在，是甚麼導致它存在。原來要解決它，就是要社會制度的改變，在那裡有很大的得著。即是，多一個層面去看。

當時又是一個有很多不同神學興起的年代，其中鄭生來神父就看了很多關於解放神學的書籍。在這段時期的學習和思想啟蒙，影響了鄭神父往後的各種選擇。

解放神學其中一個特點，除了社會分析，它都強調社會分析，它也強調貧窮；其中特別的是，它強調實踐，神學是由實踐做反省，即不是搬書本，又不只是一個學究式的神學，是要信仰實踐的反省。

解放神學也有很多的，其中之一，是 conscientization，意識培育，或者意識省覺，即是說，要破除貧窮，破除不正義。它都很強調低下層、基基團⁵；拉丁美洲的基基團運動，是他們反思自己生活上的種種，以及他們要做的事，要爭取的東西，不斷以《聖經》做反省，以及常常講突破、釋放和解放。

Conscientization，不是每個人都這樣說的，其中有些，即是最主要的人。就是說，你跟你對立或者對抗的人，目的都是要他覺醒，即是說，不是要打倒他，是要他覺醒，這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是要打倒對方，你就不全面了。如果你要對方覺醒，你未必做到，但你的目的不是打倒那人，是要他覺醒。意思就是，如果你令他覺醒，你就是打倒了他，但不是要消滅他。我覺得這點很重要，以後的社會運動很多時欠缺這樣。這是基督徒的，但甚至教會社會運動，都是欠缺這個，是要打倒人，他是你的敵人，沒有愛敵人的存在。

耶穌基督是由上而下，降生成人，然後帶我們上去，他由上而下，然後跟下面一起上。於是這方向很重要，由

⁵ 基基團，全稱基層基督徒團體，香港天主教會亦稱它為「信仰小團體」。它是教會中的最基層組織，被認為是培育教友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見徐錦堯著，〈活力小團體——基基團聚會手冊〉：<http://fr.luketsui.idv.hk/>。

上而下，意思是，要帶上層的人體會下面的人。如果上層的人不體會下面的人，如果教會只看上層那些，就不全面。但如果由下面看，就全面了，因為看下面，是一定也看上層。但你看上層，未必看下面。那上層的人要變成怎樣呢？變成他們懂得下來，以及懂得體會下面。

基督徒在上層，不這樣做的話，就是有所欠缺。所以基督徒上層的人，一定要關心下面的，配合基督。關心下面的，是要與基督、與人一起上，即是帶人上，不是可憐人，但要人上去，這才是真正的關心。所以，福利工作只是可憐式，或者是施捨式，就不夠徹底了，是要讓人可以上去。不一定要上去上層，但要在他的欠缺之中提昇。

我回來香港，跟關俊棠、夏其龍一起升神父。我們在羅馬已經想，我們不在大堂（主教座堂）升神父，次次都是去那裡，不去！找一個窮的堂區升神父。我們又不知哪裡，最終想到聖老楞佐堂，我們都不大清楚，好像是窮的堂區。我們討論，大家同意，就寫信給徐誠斌主教⁶，他接受了，於是就在那裡升。

我們就是如此選擇。我們也選擇回來升的，而不在羅馬升，想在香港升。我們回來後，也舉辦很多講座，關於梵二。

⁶ 徐誠斌主教 (1920-1973) 出生於上海，1959年在羅馬晉鐸，回港後出任《公教報》主編，其後任公教真理學會主任、公教進行社社長及香港教區對外聯絡處主任等要職。他在1967年獲委任為教區輔理主教，翌年任教區署理主教，1969年正式成為教區第三任主教，是香港首任國籍主教。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徐誠斌主教〉：<https://bit.ly/2Gtcr2H>。

在堂區與教區開展新事物

我是想去一個窮堂區，然後是講中文的堂區，卻推了我
 去一個英文堂區。

那是 1970 年；鄭神父首個服務的堂區，是花園道聖若瑟堂，那裡的教友大都是外籍人士，只有少數華人。

在那裡要思考（教會）本地化，那裡完全是英文彌撒。我問，想不想在舊曆新年有一台中文彌撒，他們說：「好啊！好啊！」

那時我是副本堂，但本堂放大假，徐主教跟我說，現在他不在，給你負責，但又不想公開你是暫代本堂，即是仍然是副本堂，但事實就是負責。

定了這台彌撒，在《堂區通訊》登了，說舊曆新年加開一台中文彌撒。突然接到一個來電，他問：「為何有中文彌撒？」我說：「有甚麼問題？」「我們是英文堂區，傳統上是英文彌撒。」我說：「中文彌撒有甚麼問題呢？是新年，也為中國人。」他說不可以，是傳統。我說，我沒有改任何東西，只是加東西，即我沒有改原有的彌撒，只是加。他說也不可以。

他是外國人，在香港很久，而且有很多中國朋友，在堂區很久。我說，沒法子，這台彌撒是一定會開的，以及你這樣是歧視。他說要告向主教，我說沒辦法，因為我真的沒改甚麼。他真的去告了！

徐誠斌「叻」。徐誠斌跟他說：「這是你堂區的事，如果你有這些事，你去跟堂區議會說。」然後，他就去堂

區議會說，堂區議會責斥說：「誰准許你去主教那裡？你沒有問過我們，你自己去了。這台彌撒我們沒問題。」

就這樣，聖若瑟堂舉行了第一台中文彌撒。

七十年代中，一齣瞬間落畫的音樂劇《歡樂福音》，啟發鄭神父在 1975 年成立「優良電影介紹小組」，分享好的電影。七十年代後半期，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剛好教宗向中國招手，又有北京主教表示願意聯繫，鄭神父又看準時機，在 1979 年創辦《驛》，嘗試「以朋友接觸朋友」的方式，透過出版與中國教會彼此分享訊息。

愛主愛人愛大地

今天，鄭生來神父是香港天主教會關注生態環境的代表人物。其實，在中學時期已感受到「天主處處都在」的鄭神父，早於七十年代初在西環聖母玫瑰堂的時候，已經開始做收集舊報紙、舊衣物等環保工作。至八十年代，他創立「信仰探討中心」後，意識到需要全面地去看整個生態，於是又開展一個新組織——「天主教綠識傳人」。那是 1989 年。

八十年代尾，覺得要開始一個組織，剛巧在黃大仙，找一些人聊，要幫手想個名字。大家商量，有個男孩子說，「綠色傳人」，顏色的「色」，最好聽的就是這個名字。我說好，但不要顏色的「色」，要意識的「識」，因為我仍然是想 conscientization，就用這名字成立了。

邁向八十歲的鄭神父，從來沒有停下來，近年他推動「愛主愛人愛大地」，提出了《天主經》的問題。

《天主經》有甚麼問題呢？就是「奉行在人間」，「人間」的問題。因為，我看過全部，所看過的《天主

經》全部都是「地」，舊版是「承行於地」，《聖經》裡的都是「地」，只有白話文版是「人間」。

「人間」，如果從歷史上看，即是宇宙歷史來看，人的存在是很短時間。你看「量」，人的量是很小。那天主的旨意，奉行在人間，講細小的範圍，把天主的旨意，局限在這細小的範圍。「承行於地」，就至少是一百三十七億年，人只是數十萬年。而且，這麼多樹，這麼多動物，天主的旨意不在那裡嗎？天主的旨意不是一直在運行嗎？

因為《聖經》是「愛主愛人」，但信仰是隨著時代而變得豐富，為二十一世紀的生態危機，以及教宗都說了，對大自然和造物主的責任和義務是信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⁷ 如果《天主經》講來講去都是「人間」，沒有了「地」，那如何把「地」加入去，即如何叫人強調愛大地？

他感嘆說，這個問題已經提出了好幾年，可是「寫的信、寫的文章，都沒人理睬」，未來要再大力一點推動。他就是既敏於洞悉時代徵兆，又勇於作出信仰回應的鄭生來神父。

⁷ 這理念由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在《1990年世界和平日文告》中提出，教宗方濟各在2015年發表的《願祿受讚頌》通諭中重申。

信仰之路，譬如行遠，必自邇；
譬如登高，必自卑

—— 范錦棠神父

1946 年	出生於香港
1964 年	進太古樓小修院
1978 年	晉鐸
1981 年	到羅馬進修，約一年後回港
1989 年	到加拿大修讀傳教學碩士課程
1991 年	回港，在聖方濟各堂及其他堂區服務
2011 年	調派至聖雅各伯堂服務至今



(圖：范錦棠神父，攝於 2018 年)

訪問：陳樂信、黃奕清
撰文：加俾爾

成長路是人生路，人生路也是朝聖路。在人生路上，我們常常像是在迷霧中行走，遠遠望去，前路是一片濛濛，辨不出方向狀況。於是，我們遲疑、我們駐足。當我們終於鼓起勇氣向前走去的時候，就會發現，其實每走一步，都能將下一步的路看得更清楚一些。每個人都有一條屬於自己的路要走，對范錦棠神父而言，回應天主在他身上的召喚，在生活的實踐中，逐漸領會上主的旨意，一步一步地跟隨、實行，便是他生命與信仰的依歸。

范神父認為人生路和真實道路的差別，在於人生路不是鋪設好、死板板的道路，而是錯綜複雜會隨著我們的步伐逐漸向四面八方開展。《中庸》曰：「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唯有往前走，路才會誕生，才會存在。

孕育於太古樓的信仰

1946年，范錦棠出生於香港，少時在「太古樓」露德聖母堂受洗。他1978年6月10日在香港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晉鐸，屬於香港教區的神父，1989至1991年於加拿大渥太華攻讀傳教學碩士學位。范神父曾服務過的堂區包括善導之母堂、聖方濟各堂和聖保祿堂，現任為聖雅各伯堂主任司鐸。

孟母三遷：「昔孟母，擇鄰處。」生活環境對人的成長及品格的養成至關重要，范神父年幼時居住在薄扶林村，就讀聖華學校¹，毗鄰是一間法國古式的聖堂露德聖母堂，附近是有教友村之稱的太古樓。聖堂每日在彌撒開始前都會敲幾次鐘。晨鐘定省，范神父從小便是在宗教氛圍下成長。據他憶述，家中最早認識天主的是大家姐，姐姐領洗後，全家人在潛移默化、耳濡目染的影響下，都先後領洗了。

¹ 聖華學校由巴黎外方傳教會在1951年創辦，由來自法國的外方傳教女修會負責管理和教導。學生主要是居住在太古樓、薄扶林村、草寮以及鋼線灣一帶的兒童，校舍於1978年遷到沙田禾輦邨現址。

香港在五、六十年代經濟環境十分惡劣。幸好，爸爸是一位廚師，收入尚算穩定，加上「近廚得食」，家中可以說是三餐無憂；在那年代，社會上的熱心人士都會透過教會捐助物品給有需要的人，其中包括日用品和衣物，經過分類、整理、縫補後，會送贈給貧苦大眾。由於當時的生活艱苦，很多人都是依賴教會的救濟品補給過活，正因為這原故，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反而變得互助互愛、緊密和諧。信仰的種子也在不知不覺間萌芽生長。

現今香港是推行十五年的免費教育，然而在五、六十年代，不管是幼稚園、小學或是中學，讀書都要付學費的。在生活條件仍是三餐不繼的情況下，想讀書確實非易事。范神父能夠順利完成中學課程，全賴家人對他的支持，以及他自己所付出的努力。

聖召種子之萌芽與成長

回顧四十年的鐸職生涯，范神父形容對他影響至深，引領他一步步走進信仰之門，並且令他甘將一生奉獻、踏上聖召之路的人，是明之剛神父²。這份影響不單只在信仰，還有做人處事之道。

明之剛神父屬巴黎外方傳教會，是昔日太古樓露德聖母堂的主任司鐸。對當時年紀尚幼的范錦棠來說，神職人員就是那些整天穿著中國傳統黑長衫，說得一口流利廣東話，高高大大的外國人。

明神父的一言一行、所說的話都很有道理。他仁慈、有愛心、又喜歡幫助人。村內的居民很敬重他，特別是年

² 明之剛神父 (Rene Chevalier · 1909-1981) 是法國人，在 1942 年晉鐸為巴黎外方傳教會神父，二戰結束後來華傳教。他在 1952 年被迫離開大陸來到香港，任薄扶林露德聖母堂主任司鐸，服務該堂區十九年之久。他在 1971 年調任聖神修院神師職，至 1980 年任聖母玫瑰堂主任司鐸，翌年回國休假途中，在探訪泰國邊境難民營後遇車禍喪生。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明之剛神父〉：<https://bit.ly/2VHKRVL>。

青人和小朋友都很喜歡親近他。「容孩近我」（瑪 19: 14）相信就是這般的意思罷！

露德聖母堂每年都舉行幾個大型活動，明神父會帶著一百幾十名村民，扶老攜幼浩浩蕩蕩由薄扶林村、太古樓出發，徒步經瑪麗醫院，沿山路往下走到大口環療養院、兒童院……做探訪。期間除了關懷問候病者、安慰憐愛孤兒弱小、送贈生活必需品外，很多時候眼見被探訪的人穿得太單薄或衣衫過於殘破，明神父甚至把自己身上的衣服也脫下送給他們。「白白得來，白白分施。」（瑪 10: 8）明神父那捨己忘我的行為，實在令人折服。

那時候我很小，不知道這些是愛德工作，看到姊姊去，自己便跟著去。有一次，我雙腳行得腫了起來，明神父便揹著我「騎膊馬」³繼續向前行。在途中遇到賣甘蔗的小販，他便賞給我們一人一支甘蔗以作鼓勵。我依稀記得，當時我一邊騎在他的膊上，一邊咬著甘蔗。結果，我吃得滋味，但明神父就被我弄到滿面蔗汁，狼狽不堪。這點點滴滴的片段，令我體會到傳教士犧牲的精神，他們對福傳的堅毅熱忱。「非爾役人，乃役於人。」（瑪 20: 28）

其實，外國傳教士到香港傳教一點也不容易，他們離鄉別井，要克服語言的障礙，適應生活文化上的差異。明神父所屬的修會為了方便他到不同的地區服務、傳教，提供了一輛「福士」汽車給他代步。可是，除了出外探訪，大多數的時候，他的汽車都是用來服務區內的村民。有些

³ 廣東話，一個人坐在另一個人肩膀上的動作。

人借來當花車用，有些人借作十字車用途……遇到緊急的情況，明神父甚至會充當司機接送人去醫院。

在訪談的過程中，范神父告訴我們他一生熱愛收集不同的面譜，藉以接觸了解不同的文化和種族。面譜像人的容貌各有不同，但在每人的臉容下，各有獨特的一面，當中隱藏著基督的容顏。而他在明之剛神父的臉上看到了主耶穌的面容——克己犧牲、謙遜仁愛。

走上兒童、學生運動之路

范神父坦言，他從小在宗教氣氛濃厚的環境下長大，加上明神父的悉心教導、以身作則，在信仰上可說是他的啟蒙老師；正因為這些原故，令他深深明白到紮根信仰，必須自小培育。在過去的數十年裡，范神父一直致力於青少年牧民工作，而他個人在年少時已經是「樂鋒會」的活躍分子。

「樂鋒會」IMAC，International Movement of the Apostolate for Children，是一個國際運動。它源於法國，香港萌芽的基地在太古樓，我年青時是「樂鋒會」的小領袖，入小修院之後，每年暑假都會抽空去參加和協助「樂鋒會」籌辦的南丫島生活營，期望透過遊戲、生活體驗，令這群青年學生以「觀察、判斷、行動」的方法，了解、分析和反省生活現況，從而作出信仰的回應。

《樂鋒報》就是為了配合這個運動而發行的，內容主要有故事、遊戲、手工創作的的方法、集郵園地，以及「樂鋒會」的最新資訊。這本刊物有中英文版本，除香港以外，也會郵寄到東南亞的國家，是一本益智的青少年／兒童刊物。

後來，范神父去了羅馬讀書，返港後「公教學生青年會」（YCS·

Young Christian Students) 的幹事聯絡他，於是范神父便成了學青的神師，同期他也曾任理工及柏立基師範學院的神師。

由於樂鋒會和學青的參與，范神父經常要走訪東南亞出席一些國際會議，因而有機會認識了解其他國家的傳統文化，開闊眼光和知識的領域。在加拿大攻讀碩士期間，他曾探訪不同地區的傳教士，學習他們如何傳教；畢業後，范神父在非洲居住了兩個月，對當地的傳教士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加拿大讀書期間，曾有人向范神父提出幫他辦理手續，邀請他留下來傳教，但范神父說：「生於斯長於斯，香港更需要我！」婉言拒絕了對方的好意。

魯迅曾說：「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當心中已有堅定的目標時，就應該勇敢邁開步伐。「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唯有往前走，才有可能抵達。

教會與文化

美麗環境孕育出的信仰宣講者

—— 徐錦堯神父

1943 年	出生於大澳
1954 年	領洗為天主教徒
1956 至 1962 年	西貢聖神小修院
1962 至 1967 年	華南總修院哲學課程
1967 至 1971 年	赴羅馬讀神學
1971 年	晉鐸，香港仔聖伯多祿堂助理司鐸兼任中學神師、小學校監
1973 至 1977 年	教友總會神師、青年聯會神師
1977 至 1980 年	長沙灣基督君王堂主任司鐸，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校監
1980 至 1982 年	赴英國牛津大學深造倫理教育
1982 至 1985 年	寫作、出版一套六冊的倫理書
1986 至現在	成立公教教研中心，任執行董事，後轉總幹事



(圖：徐錦堯神父)

訪問：黃懿縈

撰文：黃懿縈、張小蘭

在香港教會內，說到東西文化薈萃的一個代表，不能不提徐錦堯神父。已逾七十古稀之年的徐神父，出生於山清水秀的大澳一戶貧窮人家，初中時進入小修院，然後在香港和羅馬接受神哲學培育。大澳水鄉的童年生活，以及在歐洲有過深刻的生活體驗，使他對信仰自有一番見解，七十年代回港晉鐸後，一直提倡信仰與中國文化、生活和社會的結合，至今仍孜孜不倦地向華人傳揚福音。

信仰與聖召因人而開始

徐神父出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正酣之際，遠親近鄰沒有一個天主教徒。他的家離聖堂不遠，當時每一、兩個月有外籍神父到大澳主持拉丁彌撒，他由於聽不懂而沒有機會接觸天主教信仰，直至入讀大澳永助小學，熱心而好人的伍煥貞老師教學生《要理問答》，他很感興趣，後來領洗。

我多謝天主，尚算聰明，三四歲開始讀《三字經》、《千字文》和《幼學詩》，認識了很多字，所以對《要理問答》頗有興趣，是我自己看的，又覺得老師很好，所以其實我開始是信老師，而不是信天主。

大澳的童年生活讓徐神父認識時間、永恆、大自然的觀念；和其他小朋友不分貧富階級一起玩樂，中秋節躺在鹽田，欣賞漂亮的月色，讓他喜歡上大自然和團體生活。而父親臨終前的叮囑，對他有很大影響，以至道德教育成為日後不停宣講的內容。

我覺得我的聖召和信仰不只是在教會接觸的。大澳當時沒自來水也沒車也沒電，我那時接觸到的是，最美的世界，比西藏還要美，完全沒有污染。真實的天和地，加上有節奏、有韻律的文字，讓我擁有與眾不同的視覺。

我家裡有兩件最大的家具，一是神枱，另一是床。神枱上有神主牌。因為我是唯一的兒子，其他兩個是妹妹，早晚上香是靠我做的。我天天上香，拜山時又要叩頭，又有「天地玄黃」之類的文字引領，我覺得信仰、人生真理便是這樣慢慢的種在我心裡。

我父親在我九歲時去世，終年四十六歲。他留給我兩句話，他說：「堯仔，我們很窮，但我們窮也要窮得有骨氣。」這就是道德，窮也要有骨氣。他還說：「即使窮、失敗、跌倒也好，要咬緊牙關做人。」這與時下香港人「走精面」¹很不同的，這便是道德。所以我特別喜歡從事道德教育。

教育是很美好的，讀書是很好的，團體也是很好的，大自然也是很乾淨的，我隱約覺得有神的存在，生命有真善美、有價值，尤其是讀《三字經》、《千字文》和《幼學詩》。第一，它們是韻文，是鏗鏘的，裡面有江山、有美人，也有英雄豪傑。小時的我當時心裡充滿憧憬，尤其是老師這麼愛學生，神父這麼愛人，我想做神父，我想傳這個教。其實，當時是想傳這種老師和這種神父的教，並不是耶穌的教。

他的司鐸聖召亦是受到神父修士的善表吸引，萌生修道的意願。所以，他認為自己的信仰和聖召都是因人開始，而不是甚麼高深的道理。

我中學會考，考到在香港市區讀書，應該是大澳辦學歷史上第一個。但我家很窮，不可能交出又食又住又學費，不可能在香港市區讀書。後來，不知為何，教會送我

¹ 廣東話，走捷徑的意思。

去澳門慈幼會的職業學校，甚麼都是免費的。當時特別有個修士叫葉際趨，我們叫他師父仔，極端好人，不斷幫助我。另外有個劉戩雄神父，他也很好的。就因這兩個人，我覺得神父、修士這麼好，所以我便想做神父。

本地的修道生活

在澳門讀了一年書，仍是少年的徐神父決定進修院。然而，母親和所有親戚大力反對，不想沒人繼後香燈。他哭得很厲害，結果母親心疼兒子，答應讓他去修道。

我一說進修院，母親即極力反對，因為她是外教人，又只有我一個兒子，她又是個寡婦。我想當時所有親戚都反對的，尤其很疼愛我的伯父與姑媽。

最終也是去了，但一定要父母簽名。我那時十三、十四歲，去香港總堂見白英奇主教，又要跪又要簽紙甚麼的，我甚麼都不懂，我媽也糊里糊塗地簽了紙。所以我媽後來常說笑，天主教騙了我，教會騙了我。後來我媽媽是喜歡我做神父的，但那是很久之後的事。

聖神小修院位於新界的西貢，如今已不復存在。當年進修院的人很多，但離開得很快；與徐神父同時進去的有十一人，只有他一個祝聖為神父。

當年西貢發展落後，修院在墳場旁邊，蚊子很多，有一年幾乎一半修生患上瘧疾，服用金雞納霜令臉色發黃。我們自修時要把腿放上椅子上，因為地上滿是蚊子。雖然條件艱苦，修院生活還是開心的，逢星期三、六下午出去爬山，樂趣無窮。

由小修院升讀華南總修院，為徐神父是自然而然的，他對自己的聖召從未懷疑過。唯一一次驚險關頭是十八歲時，左耳動了兩次手術，變成半聾狀態，少了做神父的半個「S」。

聽神父說，他們開修院會議時曾討論要否叫我退學，因為殘障者不能做神父，那時聖召又多，不在乎勸退幾個。但可能因為我的學業成績好，又負責彈琴和指揮，對修院有用，所以沒有趕我走。

如果對修院沒有實際用途可能會趕我走的，聖召那麼多，找個健康的不是更好嗎？以前聖召有三個條件，三個S（拉丁文）：Sanitas，即健康；Sanctitas，即聖德、品格；Scientia，即學問。三個S，這三個基本條件，健康、聖德、學問，中庸即可，這些是基本條件。

在梵二前的舊式教育下，他的一位同學就沒那麼走運。

我很記得我們同學當中，有一位修生在休息時間上天台讀英文，據說長上問他為甚麼要自修英文，是不是想做主教，說他驕傲，便趕他走了。以前就是這樣的，梵二前的教育以及靈修是這樣的，大概是恃著聖召多，趕走一、兩個也無所謂。

在歐洲的生活體驗

哲學畢業後，徐神父於1967年到羅馬念了四年神學，並且在三個暑假期間，到了其他地方增廣見聞。

我很珍惜這三個暑假。第一年讀意大利文，第二年讀法文。最有趣的是打工，第一年我在一間醫院做工，第二年在一間巴黎的餐館做工，第三年在德國西門子一間工廠

做事。我很珍惜這些經驗，讓我明白工人生活真的很辛苦。

特別是第二年在巴黎餐館做工，當時我有國家學生證，我記得如果你吃一頓飯，六個法郎左右，如果你有普通學生證，便四個法郎，如果你有國家學生證便三個法郎左右。

當時我做了一個多月，掙了八百法郎，飲食的花費很少，後來去英國觀賞歌劇、芭蕾舞等。開演之前十分鐘有一段時間，可以用最便宜的錢坐最好的位置，是給學生的，因為學生應該接收文化。還有，最好的位置如果不坐滿不好看的嘛，所以那時我每個星期都去看。

還有各種博物館、藝術館，我全都看過，去過米蘭看最後晚餐圖。另外是參加各種社會運動，例如 better world movement²。我也記得有一年自己拿著結他走遍歐洲參加很多類似的活動，大家彈結他唱歌，很開心。

世界觀的建立

徐神父認為，如果六十年代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大公思想、拉美解放神學、反越戰活動，以及中國文化大革命（全國人民參與革命的理想）能夠合流，有可能造就一個大同世界；而美國卻刻意推動一種把宗教限制在教會內的神學和神修，去對抗大同思潮，並且成功了。對於「文革」這樣敏感的話題，他解釋：

² 基愛大同運動，又稱好世界運動，由隆巴迪神父（Fr. Lombardi S.J.）始創。他呼籲人們重新抱有希望，互相修和及相信主耶穌基督是唯一拯救全人類社會的救主，藉由更新、團結、忠於福音精神的生活，使教會成為實踐天主救世計劃的酵母和工具。參陳岡，〈訪問譚維仁先生——談好世界運動〉，載於《神思》，1989年第二期，頁55-57。

我在英國讀書時發現，七十年代幾乎所有社會學的書都是讚揚文革的。當時的社會學家認為中國能夠動員全國人民去改造舊中國，學生要上山下鄉，要與人民走在一起，這個理想本是很好的，當然用的方法不妥。但如果有解放神學做基礎，有梵二的理論滋潤，有學生的理想，以及有一個全國甚至全世界的運動，那距離世界大同不遠了。

在羅馬讀書的四年給我很深感受的是世界觀。當時的世界觀很美麗，但之後就不一樣了。受到美國福音派（基要派、原教旨主義者）的影響，基督徒不斷強調：「我們得救，你不得救。」前幾天接觸到一個慕道者，他是在一間基督教小學教書的老師。他常聽到校內基督徒都說神愛世人，不過要信才行，如果不信，神就不愛你了。他覺得很沒道理。

現在大陸很流行的，都是「主啊！主啊！」的神學，例如：基督的寶血洗淨我、唯有主才是一切之類，與人間沒有甚麼關係的。我現在回大陸看，全部的所謂「福音歌」都是與生命無關的，全部都是「主啊！主啊！」有天無地也無人。

另外，在荷蘭一個短期課程中，徐神父首次聽到宗教社會學，用社會學方式分析宗教，其後在八十年代初到英國深造教育時進一步思考，到現在他極為相信天主創造人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希望人快樂。

我覺得天主創造我們只有一個目的，是想人快樂，想我們分享他的快樂。如果你快樂，但你身邊的人不快樂，你快不快樂？不快樂的。所以如果你想快樂，必需家人快樂、社會快樂、國家快樂、全世界快樂，甚至小狗小貓，

花草樹木也欣欣向榮，這樣才是真正的快樂。換句話說，如果要人快樂，便要全世界也要快樂，這就是做基督徒的目的，這才叫建設天國。

如果天主創造人是為了要人光榮侍奉祂，有點滑稽，為甚麼呢？基督宗教出現了二千年，佛教出現了二、三千年，如果神需要宗教人士來侍奉祂、光榮祂，那麼人出現之前的千千萬萬億億年，神不是很孤獨很慘嗎？沒可能的，沒理由的。

我們很多人往往以教會為中心，而不是以天國為中心。如果以天國為中心，一定是天下一家：天主是父親，所有人是兄弟姊妹。天父不僅愛世人，也愛天地萬物。一個人要注重環保，也要視全人類為一家。我喜歡教宗保祿六世在《民族發展》通諭所說，當全世界發展起來才有和平。

寫作和宣講

這幾十年來，除了馬不停蹄地在香港和內地宣講福音，徐神父更將之化為文字，並錄製成粵語和普通話版本的 DVD 光盤，免費派發，希望死後仍能流傳，使這個世界真正成為天國。實際上，他自小喜愛寫作，升上中學後開始寫詩詞歌賦，七十年代中期在偶然的機會下為《公教報》寫專欄，題材豐富多樣。在英國進修時，更開始撰寫倫理書。

《公教報》最初的欄目名叫「天地人」，是每星期寫一篇。後來到英國讀書後，開始寫倫理書，漸漸愈寫愈多，我很記得第一本《正視人生的信仰》出版時，感覺到好像自己生出一個孩子一樣。到現在愈來愈喜歡寫作。

我寫作，必有聖經、生活和有中國文化，每個星期都是這樣的，變相要多讀書，讀完書便想寫東西。

天父以愛作為唯一的法律來統治世界，而愛有兩個條件：寬恕和分享，所以我的著作都是「版權所有，歡迎複製」，福傳小冊子截至2018年更已印製了718萬本。

進入九十年代，社會政治爭拗增多，有時候道理講不清，加上社會正在墮落，他想起「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這句話，亦即最好使社會不要病，所以更積極寫作。1989年出版的《正視人生的信仰》正是朝著三大方向去寫：

信仰與生活要結合。所以與生活無關的事，或抽象的事物，我不重視的。如果聖神在我們心中，我們便要在靜默和祈禱中接觸祂。這是信仰與生活的結合。

宗教與社會的結合。基督徒是地上的鹽和世界的光，鹽一方面可以防止腐化，另一方面使生活更有味道，所以基督宗教該有移風易俗的功能。

我自己也很喜歡聖經與中國文化的結合。中國文化很美麗，它的文字與內容，真的能夠與我的天主教信仰結合而相得益彰。中國文化能用最簡潔的文字來表達信仰，而且，如果我們多讀孔子，便會懂得「處常」；讀老、莊，便會「處變」；讀陶淵明，會愛大自然；讀杜甫，會愛國；讀蘇東坡，會變得瀟灑；讀鄭板橋，甚至會接納「吃虧是福」。所以我在《正視人生的信仰》裡加上了許多中國文化的內容。

將勤補拙學拉丁

—— 陶成章神父

- | | |
|------------|------------------------|
| 1926年2月23日 | 廣西桂林出生 |
| 1940年 | 進入荔蒲備修院 |
| 1949年 | 逃難來港，進入華南總修院 |
| 1956年 | 晉鐸，其後獲分派到不同堂區肩負牧靈工作 |
| 1997年 | 榮休，之後在聖老楞佐堂及聖方濟各堂住宿和服務 |
| 2018年7月6日 | 在香港明愛醫院逝世 |



(圖：教友們為陶神父祝壽。圖片由聖老楞佐堂教友提供，攝於2018年)

訪問、撰文：陳樂信

陶成章神父 1926 年出生於廣西桂林湓田村的公教世家，家族兩、三代人都是教友，所以跟隨傳統出生第三天便領洗。當時廣西教會由巴黎外方傳教會管理，直到 1938 年，桂林才成立監牧區，交由美國瑪利諾會管理。由於陶神父的堂區是法國神父管理，因此自小就有機會接觸外籍傳教士。

我們以前的教會團體好熱心的，好凝聚，大公會議之後，教會冷淡了。我們以前好熱心的，守空心齋，領聖體前守齋，夜晚半夜就不可以吃東西，後來大公會議改了一個鐘頭。¹ 我們鄉下呢，男人去聖堂，穿長衫馬褂；女人好像去「飲」（宴會）穿的那些，望彌撒穿的衣服十分隆重的。現在穿短褲去聖堂很不像樣，好隨便。

陶神父 1940 年加入荔蒲備修院，畢業後入讀梧州平南聖家小修院。其後，在 1949 年加入位於香港黃竹坑的華南總修院，即今之香港教區聖神修院。

拉丁文融入生活

當時在大修院讀書全部都用拉丁文，如果拉丁文不及格便當不了神父。

那時我的堂區派十六名小朋友到桂林的備修院，一名吳姓院長問校長：「這些人當中有誰將來可以當神父？」校長說：「西默。」

「西默」是陶神父聖名西默盎（Simeon）當時在大陸教會的稱呼。陶神父在廣東省江門教區的小修院升學，但因戰亂，修院遷往廣西梧州教區續辦。

我家裡很窮，有五兄弟，我排行最小。本堂神父叫他

¹ 守空心齋是指由半夜起到翌日彌撒中領聖體之前，不能進食，有些地方甚至連一滴水也不能喝。守聖體齋的規定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後，縮短為一個小時。

們若瑟、保祿、伯多祿……最小那個呢，要特別點，本堂神父叫我西默盎。全香港都找不到一個人，只有我一個人叫西默盎。

我有兩個兄長都進了修院修道。但即使你讀書成績好，但拉丁文不好，都不能夠做神父。我兄長就是拉丁文不好，便做不了神父。你英文好也沒有用。

1949年，大陸政權更替，大批教會人士紛紛離開中國避難。陶神父也因此來到在香港的華南總修院繼續學習。當時的教學仍是以拉丁文為主。

廣東、廣西是巴黎外方傳教會管理，在1930年交給美國神父管理，他們當然用英文，拉丁文就不太行了，沒有巴黎外方傳教會那些神父的法文、西班牙文和拉丁文好。

美國神父把他們會的（拉丁文）傳授給我們都不夠用，所以來到香港我們好辛苦。那些人最行？梅縣。我們第一個樞機主教胡振中是梅縣人。梅縣的修院全部由中國神父教書，不要老外。我們廣西是老外，美國神父教拉丁文，教了五六年還是不行，後來有從光芒來的神父，告訴我們一定要學講拉丁文。他會拉丁文，但不夠精，不會講，不會翻譯意思。所以在香港讀書，最差的是桂林、梧州兩個地方的學生。後來光芒修院叫了一位賴神父來教我們一年，已比我們之前學的五年好。

事實上，陶神父來香港前，他的拉丁文水平已不錯。時至今天，陶神父每天仍然使用拉丁文的日課經祈禱，在自己的生辰或晉鐸紀念等重要日子也以特倫多彌撒慶祝與謝恩。²

² 本訪問於2018年2月9日進行。

不是誇自己，有一次拉丁文比賽，我得到冠軍。那時在打仗，甚麼都缺乏，獎品是一塊肥皂，開心死了。現在就有肥皂洗澡，打仗時怎可能有？

我找一些拉丁經文給你看。湯漢主教都未必懂。他會，不過不會念；還有陳日君，他會，他讀意大利文的；其他人會用中文。我用了幾十年，不想變了。我買這些書，你以為便宜？一百五十歐羅呀！

華南總修院修生以中國人為主，原是照顧廣東、廣西、福建、雲南四個省的修生。自共產黨掌權後，很多修生從全國各地前來，部分逗留一段時間再送往外國。至於教授，大多是外籍神父，尤其是愛爾蘭耶穌會士，國籍修生對他們十分恭敬。

那時見到他們都有一種高高在上的感覺，好像很神聖，地位很高，好有學問，好有聖德。

耶穌會神父很棒的，如果你在華仁讀書就知道了，是耶穌會開的。他們講的拉丁文跟講英文一樣，沒甚麼分別，噤噤啞啞，眼都不眨一下。

共產黨來了之後，好多修生搬到香港，有上海的、有北京的、有華南的，有東北的。當然啦，我們是華南總修院，全中國（的修生）都來是不行的，頂多八十個學生。那麼他們有些本來住在這裡，一段時期之後就走了，有些去西班牙，有些去澳門，有些去菲律賓。

外來宗教的華洋分野

在今天的中國，天主教仍多少被視是洋教。即使在殖民地的香港，這種華洋分野在上世紀中葉仍揮之不去。

我家鄉的那條村不是全部教友，只有姓陶的是教友，村民叫我們「番鬼佬」、「番鬼仔」。我們不介意，都習慣了。好像那些老外神父，他們也說：「我係番鬼佬。」那時候的人叫神父做「番鬼佬」。「番鬼」不怕鬼嘛！

陶神父在 1956 年晉鐸後，先後服務於牛頭角的天神之后堂（現遷往順利邨）和柴灣海星堂等堂區。

最初國籍神父是沒有機會擔任本堂一職的，他在十五年間都只能出任副本堂。不過，隨著宗座外方傳教會、意大利籍白英奇主教辭任香港教區主教一職，把此重任交給香港首位國籍主教徐誠斌後，情況立刻改變。自此，國籍神父能夠成為本堂，而外籍神父就開始轉變為輔助本地教會的角色。

徐主教接受後，主教座堂或聖德肋撒堂等大堂區即刻由國籍神父「坐正」！

有個美國神父，現在去世了。他對我說：「Father To（陶神父），你和我們一起，你永遠都是副本堂，做不到本堂的。」我對他說：「做神父不一定要做本堂。」他們這樣說，首先是要輕視你，你沒有錢，又不懂英文，做了本堂誰聽你講？

以前外國神父工作十年，便可以放假一年；而我們國籍神父做到死也沒有假期。徐主教上任後便開始可以放假，那時我已晉鐸工作了十六年，最終有七個月假期。

對於梵二會議推動的禮儀本地化，外籍神父普遍支持，大多認為有利傳教，反而國籍的陶神父，就不太認同。

用白話、用廣東話、用潮州話開彌撒，意思是本地化。我不是很喜歡，因為教會是至一的，講至一至聖的

嘛，現在即是變成幾百個、幾千個。你去其他地方，我不知道你說甚麼，就分散了、不統一、不是至一了。你沒有一個歸屬感。以前不是這樣，你到哪裡，1972年那時仍有好多地方一樣，所以我覺得大公會議改革這些，是有不好的地方。我上了年紀，覺得不三不四，亂套了。

你看一下現在望彌撒的人都站著，以前全台彌撒分分鐘跪下。有時教友領了聖體、念《天主經》之後，就走出去。最重要的部分——領聖體後，跪下念《天主經》；現在不是，成聖體之後，跪一分鐘，全部都站著。

如果講拜祖先，我相信中國的教會已經有好多好多教友，因為西班牙的神父認為，中國人拜祖先就是拜邪神；後來耶穌會的神父說不是，我們拜祖先不過是恭敬祖先。我們這個現象，在中國內地、台灣，每間屋裡都有個祖先牌位，因為這個是紀念祖宗，所以台灣教友一樣有神主牌，我只是紀念祖宗罷了。那時因為西班牙神父不讓拜，如果可以拜，好多人入教了。照道理沒理由不給拜祖先。連祖宗都不要，很要命的呀？！

以愛國為前提助學、建堂

離開了家鄉的陶神父，在內地於 1979 年改革開放後，相隔三十年終於可以回家探親，並開始扶助廣西的教會和人民。

我以前家裡窮，我現在做了神父，蓋了幾間聖堂、學校幫助人。我是愛國愛天主。不要說「愛人如己」，他們不明白的。我愛國，所以我幫你嘛。我做事靠勤勞，用這個力量來讀書。你讀不成，不是你的問題。你勤勞，卻不去請教其他人，不是每個人都聰明的。你盡了力就行了，

你不聰明又懶惰就不行了。我不聰明，但我勤勞，就是這樣鼓勵學生。

我沒有誇張，我先為人著想。所以共產黨對我盡量好，人家好害怕神父，共產黨怕你滲透，好像今年重九敬老大會，他們總會以為搞這些好事，就是從中反共。後來他們來開會看過，我是照耶穌所講來做愛國工作，愛人如己。講「愛國」不講「愛人」，愛人他們不明白，以為指太太。做愛國工作，我不求甚麼，但他們認為你做那麼多好事，一定有目的。我說：「我愛天主、愛國。」

我 90、92 年左右有個大手術，在心臟搭橋，我在醫院，問有沒有危險？醫生說，一半一半啦。可能明天會死，可能不會。我跟天主說，我是個罪人，請你給我多五年做補贖。現在給了我二十五年，我蓋了四座聖堂，蓋了一間學校。有人問：「神父，你的錢哪裡來的？」「我晚上印鈔票呀！（笑）」要求聖母，聖母會幫你的。

2000 年，我蓋聖堂用了十萬元，錢不夠，已蓋得七七八八，我求聖母，幾乎流眼淚啦。我求聖母，還差十萬元，第二天開彌撒，寶血會的修女會長寫一張支票給我，我以為是一萬元，轉帳後才知道原來是十萬。我整天說，你要求天主，就有辦法。對於錢，其實我從來未窮過。

把美式教育帶給香港學生

—— 江天文神父

(Fr. John Albert Geitner, M.M.)

1927年10月31日	美國約紐出生
1944年	加入美國天主教傳教會（瑪利諾會）
1953年	晉鐸
1960年	來港服務，翌年在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中學部）任教
1966至1970年	返回美國修會教書
1971至1982年	擔任新開辦的觀塘瑪利諾書院的校長
1983至1989年	在美國修會總部服務，1989年返港在堂區服務
1991至2011年	擔任瑪利諾教會學校校監
2018年2月20日	逝世於香港



（圖：江天文神父。圖片來源：公教報，攝於2015年）

訪問、撰文：陳樂信

「美國天主教傳教會」的江天文神父 1927 年在美国紐約出生，2017 年接受這口述歷史研究計劃的訪問，還未付梓便傳來他於 2018 年 2 月 20 日在石硤尾聖方濟各堂宿舍在睡夢中離世。

江神父有五兄弟姊妹，他排行第二，其德國裔的父母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他 1941 年加入小修院，三年後受到又稱「瑪利諾會」的美國天主教傳教會在亞洲及南美洲的傳教工作吸引，於是決定加入這個傳教修會，並繼續完成大學課程，在 1953 年晉鐸成為神父。

在修院讀書時，我們接觸到公教會的歷史，包括傳教歷史，於是我對中國的皈依也很有興趣。

多種語言背景助習中文

由於當時的會長希望有些人材在修院教書，所以最初安排江神父進修兩年生物學，並教授瑪利諾會的修生，一直到 1959 年才派他到香港服務。

我 1960 年便來了香港，起初在赤柱的會院學習廣東話，也感到頗難。不過我覺得學習新的語言是頗有趣。我小時候也會說些德文，因為父母都是德國人，我對語言都

有些興趣。讀中學時要學習法文，所以我對語言都有些許認識。

1960 年時都是繼續用拉丁文。在學習中文時，我們都會被派到堂區裡開主日彌撒，講道時找一個教道理的教友講廣東話道理。隨著逐



(圖片來源：公教報，左三為江神父，攝於 1953 年)

漸本地化，福音和書信是用廣東話向教友講的，有個導師會說廣東話道理，因為我還未學會。

江神父沒有修讀正規的中文和廣東話課程，只有在會院簡單地學會話，以及在與教友言談之間向他們練習，卻能用上一些四字成語。

能夠用一些四字成語，可以表示出我對他們的文化有所尊重。

把美國教育帶來香港

江神父來港後不久，1961 年便開始在瑪利諾神父學校中學部教書，主要教授英文和宗教道理。

當時我住在大坑東一間叫聖伯多祿受刑堂¹，現在已拆了。住了一年，同時星期一至五教英文，那時是賴存忠神父² 做校監，我從他身上學些東西，如何應付本地文化。

我 1965 年教中五，做過班主任，學生與我十分合作，我和他們的關係都很好。當年他們要考會考，英文全部都合格，他們十分感謝我幫他們合格。到目前為止，我們這一班最熟絡，他們常常來找我。前天慶祝九十歲生日，他們來請我食飯。五十二年來的友誼，都是十分豐富的。

1966 年修會派他回美國教授生物學四年，在 1970 年回港。當時瑪利諾會辦教育的事業很發達，共開辦了十三間中、小學，由六、七十年代開始主要在東九龍一帶發展，例如秀茂坪、藍田、觀塘和牛頭角。

¹ 聖伯多祿受刑堂建立於 1952 年，最初名為「九龍仔天主教公所」，屬太子道聖德肋撒堂區，其後於 1957 年升格為堂區，堂址最終在 1974 年被政府收回發展公共屋邨。

² 賴存忠神父 (Peter A. Reilly, 1912-1994) 屬瑪利諾會，1940 年在美國晉鐸。他 1952 年底來港後，主要服務來自中國大陸的難民，在九龍仔及觀塘一帶開拓堂區，設立福利中心及創辦多間學校。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賴存忠神父〉：<https://bit.ly/2vd7shh>。

因為那裡比較多工廠，就是多基層工人。那時候 1971 年，我幫任澤民神父³成立官塘瑪利諾書院，第一年在藍田，我們借用聖言中學的課室，跟著 1972 年新校舍正式開始。之後任神父出任修會在香港區的會長，於是把校監職務交給我，做校監九年多到 1982 年。

對於江神父擔任校監，把美式教育帶來學校，老師們都有正面的評價。

那些教師稱讚瑪利諾會教學的方法，給他們多些自由和鼓勵他們運用自己的擅長教學生，因為美國教育的方法很著重自由，即並非死讀書的，所以我們用六日制度，在最後的一堂鼓勵老師們用自己的興趣教學生，有些教體育、有些教英語、有些教書法、有些教電子，即給他們自由，激發學生好奇心，追尋自己的未來，這些可能是瑪利諾的特點。當然要考試，不可以忽略這回事，考試也需要合格，但考試之餘，也要自己研究，要有好奇，發掘自己的潛能。

那我有時都會教授電子學，我在美國時都有做一個業餘的發射台，做原子粒收音機，我會教他們這些電子的東西。

可能我初時教瑪利諾神父學校比較傳統一些，因為那個時代最緊要是「搵食」，那些父母有五、六個子女，要他們讀好書，所以他們並不是很著重這些科外活動。

前幾個主日，有一班第一屆畢業的學生說：「因為神父你辦這些活動，我才會做電子工程師。」

³ 任澤民神父 (John Cioppa)，屬瑪利諾會，1932 年出生於美國，1959 年來港，2016 年退休返回美國。

傳教的困難

學生當中很多都領了洗，但江神父採取不強迫的態度，免得信仰不堅固，也免得他們面對來自家長很大的壓力。

雖然說並不是百分之一百，但至少有三四個領洗，我們也有個感覺，不要強迫他們領洗，因為我知道從前有一些學校，利用一點點的心理壓力，迫他們學道理和領洗，但這些並不穩健，因為你領洗一定要甘心情願，所以我們不是迫他們的，只是希望他們知道公教會是好的。

我知道當時有些父母不希望他們學道理，因為一些中國人父母希望子女在他們過身之後拜那些禮儀，他們覺得如果你信了天主教就不會拜我，領了洗就不是中國人。這樣的阻礙是確有的。

那些父母喜歡我們的道理，因為我們都會教導他們孝順父母，做好的學生，做好的市民，他們十分欣賞這些，但對宗教十分冷淡。而且有時候面對外國人會有一點點自卑。所以教會在香港都要面對這個事實。

這是一個障礙，就好像利瑪竇在北京有差不多的困難，好多人喜歡他的科學，但不喜歡他的宗教。他和太監有很多衝突，這些太監很著重錢和權勢，但天主教並不是講錢和權勢。我想每個國家也要面對這個問題，喜歡金錢的、名利的，未必會喜歡天主教。

香港對西方思想的取捨

江神父在 1982 至 88 年獲委任為瑪利諾會在紐約的正義和平辦事處的委員，他認為在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人在接受西方文化時存在矛盾。

他們一方面很接受西方的科技，但在宗教和民主思想方面他們不太接受。因為科技可以發達，但宗教需要犧牲

一點點自己的文化。

而天主教是一個國際性的機構，我們的教宗是個西方人，而中國對西方都有一點點壞印象。為何呢？因為外國來中國是有些政治的衝突，這是歷史上的悲劇，英國、德國、法國都入侵中國。

中國一向也沒有民主，自從秦始皇之後一直沒有民主，但西方百多年前有民主，美國、法國，但滿清就很抗拒孫中山先生，他接受了香港的文化，而且有外國的文化，他想改革但最後失敗。

在港幾十年，江神父看到教會和社會很多改變。

第一是本地化，彌撒都是用本地話與廣東話，然後是最後的西方主教——白英奇主教退休，接任的是徐誠斌主教。他死後，李宏基⁴做了一年，死了之後，到胡振中樞機。我見到教會發展得很順利，很多人領洗和學道理，我們天主教的事業也很成功，有很多學校和學生。

現在我發覺香港人很喜歡吃東西，十分浪費也很不環保，一頓大餐幾千隻碟要洗，要做很多東西。其實人呢，主耶穌說，人不只靠餅而生活，那我們應不應該食那麼多東西呢？香港人愈來愈肥，初時每個人都瘦，現在肥了。愈來愈多糖尿病，因為吃太多，太豐富了，所以我們要改變生活。1960 年的時候，很多人都十分貧窮，他們很多子女，在不簡單地生活。香港現在發達了，它的生活水準很高，但這是一個危機。

⁴ 李宏基主教 (1922-1974) 出生於廣州，1952 年在香港晉鐸。他於 1969 年被擢升為香港教區副主教，並任主教座堂主任司鐸，同年調任聖神修院院長，至 1971 年被擢升為輔理主教，73 年 5 月獲委任為教區署理主教，同年年底正式成為教區第四任主教。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李宏基主教〉：<https://bit.ly/2KQcJ94>。

從梵二發現自己的中國魂

—— 恩保德神父

(Fr. Giovanni Giampietro, PIME)

- | | |
|-------|--------------------------|
| 1934年 | 出生於意大利 |
| 1958年 | 晉鐸，同年來港在不同堂區服務 |
| 1994年 | 發起「齊家運動」 |
| 1999年 | 與青人一起創辦「逾越之音」團體，以音樂做福傳工作 |
| 2005年 | 開辦網上福傳學校 |
| 2013年 | 籌辦大型音樂劇《流芳濟世》 |
| 2018年 | 與公教藝人一起籌備大型音樂劇《利瑪竇》，擔任神師 |



(圖：恩保德神父。圖片來源：天亞社中文網，攝於2018年)

訪問、撰文：陳樂信

恩保德神父整個生命都為了傳教，在預約訪問時，他說為候洗者在準備復活節，已經忙得頭腦也筋疲力盡。這就是他對傳教工作的熱情。

「倒過來」的聖召

恩神父自言其聖召與其他人的聖召不同，一般人先做神父，然後才想到要去外方傳教。他卻是倒過來的。

我第一個聖召是離開故鄉，不是因為不喜歡意大利，或者不喜歡意大利文化，我覺得（外方傳教）好重要，當時不知為甚麼。現在回想，更加相信一個人如果不離開故鄉，好像是一隻在蛋殼裡未出生的小雞，要離開那個殼回頭望，才知道自己的由來。如果沒有離開，你以為在殼內是自然正常的生活。當你看到周圍都有蛋殼時，你才會意識到每個殼內都有一個人，才會去想這個問題。

第一個想法是離開故鄉，然後是獨身，因為不獨身好麻煩，離不開的。第三才是做神父。

恩神父廿四歲之前在意大利南、中、北部都生活過。或許，這種經歷，令他對故鄉沒有很大的留戀，而對那些地區的文化各有認識，幫助他面對將來的挑戰。

我出生後不久，意大利、德國和日本就組成軸心國打仗。本來我媽媽的鄉下在意大利南部，但因為打仗，我小時候便搬到羅馬附近。

所以，我認識一點南方人的思想，然後到中小學在羅馬的時候，開始認識中部的文化。你知道意大利這個國家是由很多個獨立的省組成。在羅馬時，講話有媽媽鄉下的口音，人家就會問我是哪裡來的。

到了十七、八歲，我決定選擇外方傳教，當時自己教區沒有派遣外方傳教士的，所以我要加入米蘭外方傳教會（即今之宗座外方傳教會）。於是我便到北方的米蘭去讀書。

來到中國

恩神父形容他在修院的年代不是很民主的，更好像中世紀的規矩一樣。

我們的院長表面好像很民主，叫我們寫下最喜歡的地方。通常修院都不會這樣問，不過他竟然問了，但他說：「我不能應允一定可以讓你去，但我會盡量滿足你的願望。」

那時我對亞洲有些微感覺，但中國這個選項在修院裡本身很少提及。我在1958年晉鐸，那時中國有毛澤東的出現，中國關閉了，不許外籍人士進入，所以對中國想都不用想。我們每日也有會士由中國出來，回來會講那些共產黨。

另一個很傻的原因不想到中國是：那時我們在修院吃飯不會聊天，要聽一個人讀書。當時有本書叫《在中國三十三年》，是位意大利神父寫的。他是主教，寫他在中國的生活，簡直「悶到抽筋」¹。他寫得好悶，而且很多處都用國語拼音，為我們來講都差不多一樣，是賊、是好人、是壞人，是偷東西、是殺人，我們都不知道誰是誰。這本書讀了一年多，我決定不可能繼續下去，於是我想

¹ 廣東俗語，意指悶到發慌。

「反正都沒有人在聽，我試試一下子跳到最後，相信也沒有人留意」。

怎料，當恩神父把書翻到差不多最後時才發現，最後很多頁都是圖片。

我讀得好快，大概幾分鐘，我好大聲說：「FINE（意大利文解作完結）。」同學都覺得好奇怪，沒理由那麼快讀完。院長立刻過來對我說：「年輕人你很聰明。這部分你沒讀，你知不知道？現在我命令你由第一頁開始重讀。」

因此，恩神父最初對中國完全沒有興趣，他第一志願是到日本傳教，其次是印度，但在「放榜」那一晚，修會公布派遣他到香港去。

Hong Kong？我幾乎聽都未聽過。我非常失望，也不想來，非常抗拒，但有些同學恭喜我，說至少可以離開故鄉。因為有其他人會被派去讀書，讀三年教會歷史。

我當時的心情真是很抗拒，加上我媽媽很反對我離開，她說：「你做神父就算了嘛。」離開意大利之前，主教來到我家門口開彌撒，好多人來，不錯的。但始終我心裡面有些想法，又不知道香港是甚麼地方，只知道是英國殖民地，但你知道意大利同英國打足球，經常打架。而且痛苦加痛苦，院長說我不可以乘飛機到香港，一定要坐船，一共二十五日。我怕浪，坐船便暈船，不吃不喝，一到香港的心情非常惡劣。

我還記得來到香港時，在尖沙咀上岸，是晚上，周圍都很黑，有些山，那些屋。我從未見過那麼多屋在山上，第一個感覺好像意大利人在山上搭建的馬槽。

梵二扭轉想法

恩神父為了來香港而先學習英文，但發現在街上很少香港人能以英文溝通。

原來英國人很少，殖民地政府不太理會香港的人，如果你不與政府接觸，你可以一生都不用英文。我發現原來大家都說廣東話，電台、報紙和麗的電視²都是用中文，中文最重要。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召開，其強調的本地化，令恩保德神父對這個城市的態度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大公會議強調本地化，這些思想來得很快，改變了我一生。我發覺到，如果用信仰的眼光，我根本是喜歡中國的，但因為那些政治的環境、那些情緒、那本書，那些好悶的事情，把天主的禮物掩蓋了，沒有看見。我在聖瑪加利大堂服務，開始和附近很多學校的學生以簡單英文溝通，發現原來我不知不覺跌入了中國。香港不就是中國嗎？

香港就是中國，香港文化就是中國文化，英文是政府文化，方便做生意，但香港人的思想都是用中文的。拐了那麼遠的彎，原來都是來到中國。所以九七回歸，我覺得沒有甚麼問題，因為香港就是中國的一部分。我愛中國、愛中文、愛香港。

這第一個故事是告訴你，天主安排很多東西，我們發覺了也不理，要找第二個地方。我要找日本，要找印度。

² 麗的電視原稱「麗的映聲」。英國麗的呼聲於1949年在香港開設分公司，設電台廣播及電視業務。麗的映聲於1957年啟播，是香港第一家電視台，至1973年更名為「麗的電視」，於1983年轉售成為「亞洲電視」。

天主說：「好吧好吧，你去找，你去找。」兜兜轉轉……回到你不喜歡的事上，但過了一段時間，你發現這是個包裝，裡面就有你需要的東西！



(圖：恩神父擔任神師的音樂劇《利瑪竇》於 2019 年 4 月公演。圖片來源：公教報)

無法變成中國人

恩神父甚至曾經想變為中國人，但很快便發覺無可能。

我可以吃中國人的食物，可以盡量學講中文，但不可能變成中國人。

我開始學中文的發音時，並非現在到中文大學學習，只是跟著一位老人家學。中文好困難，廣東話是所學的語言中最難的，發音最困難，每個字要記得發音，但有些音很美麗。

中文有一些概念在歐洲沒有。我問老師「I am a man」中文怎樣說。老師答：「我是人或者男人」。我說：「為何『或者男人』？」已經有點兒不同概念。我又問老師：「那麼，I am a person 呢？」老師答說：「我已

經講了，就是人嘛」。我發現對「人」的概念，在語文中反映很大的分別。

對我來說，中文是兩個大問題，一個是音，第二是有些字的 concept（概念）會不同，有些字是沒有的，沒有 correspondence（對應的文字），無法翻譯出來。

你即使講「天主」，我講 God，不是同一件事，因為「天主」是利瑪竇在明朝想出來、寫出來的，這兩個字是非常之有自己的文化。「天」是個很美的字，有很多內涵；我很喜歡「天主」這兩個字。我現在用中文唱《天主經》比用拉丁文來唱有更多的感受。

我很投入中國文化，好喜歡呀，好像孔子那些思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但這些無法翻譯。我慢慢發覺到，原來意大利文沒有這樣的東西。如果你用因果論來演繹，這就更美麗了。因是「修身」，結的果是「齊家」；因是「齊家」，結的果是「治國」；因是「治國」，結的果是「平天下」。

因此，恩神父發覺自己學習其他語言和文化時，都比不上母語一樣，是在基因裡的。

我在意大利學法文、西班牙文，但我發覺所學的僅僅是依附在腦海，隨時可以脫落，但母語不會。意大利文在基因裡植入了，可以生鏽，但慢慢會回來，其他語言太久沒用會刪除。

所以即使現在我和你用中文交談，但你都不會認為我是中國人。我發現無可能變為中國人，這有很大的刺激，因為要放棄這個願望，我去到哪裡都是陌生人。

我在香港六十年了，我仍然覺得自己是外籍人，但我堅持自己是意大利籍的香港人。因此對我來講，今天的香港都是很困難，因為好像失去了身份。那時香港做甚麼都是為了中國的益處，貢獻中國。好像在香港都是為了向中國傳教，我們的禮儀、音樂等等，即使是中國的經濟發展，香港都有很大很大的貢獻。但現在好像沒有這些了。

我的身份就是一條橋，意大利同香港的一條橋。有一年，我帶一群香港青年做外方傳教，華人的外方傳教，你知道我用音樂做那些事，因此去了 Prato（普拉多）。途中經過我家鄉，就安排去一下。我鄉下的小村落有五千人，見到那麼多中國人信天主教，小村的市長在我們聚會的時候，立即給我和同行的每人一個 medal（勳章），是民族和民族之間的橋樑的 medal。我好喜歡，亦即我家鄉的人都發覺到我是中間人，我不再是小時候鄉下的我，有些不同的，那個就是我的身份。

受保護的動物

—— 李海龍神父

1928年4月30日	出生於上海
1947年	來香港加入「聖鮑思高慈幼會」
1948年	宣發修道聖願
1954年	往英國接受神學培育
1958年	晉鐸
1975年	往美國進修神學碩士學位
1994年	任聖安多尼堂本堂神父十七年
2012年	榮休



(圖：李海龍神父·攝於2018年)

訪問、撰文：張小蘭

李海龍神父於 1928 年 4 月 30 日生於上海，祖籍寧波。雖然慈幼會是國際修會，但在上海只有學校，沒有修院，所以要修道就必須到香港的修院，就這樣李神父於 1947 年來到了香港。

希望拯救自己的靈魂

當時天主教會頗有名，那時我在慈幼會學校讀書，讀到高中二年級、快將畢業的時候，我跟慈幼會的神長講，我想做神父。他們說上海沒有慈幼會的修院，只有學校，想加入修會，就要到香港才行。

那時候我大約二十歲，之所以想做神父、加入修會的理由，因為我是這樣想的：做神父比較容易拯救自己的靈魂。

想成為修道者，首先都要經過家人這一關，因為很多家庭，尤其環境不好的，都期待孩子讀書出來打工，幫補家計。而當李神父向家人表達意願時，便遭弟弟責罵。

我跟媽媽說，我要做神父。媽媽回去跟弟妹講，二弟第二天跑來指著我鼻子說：「你是個黑心的人。」因為家裡窮，只有我有機會讀書，其他的弟妹都要幫家庭做販賣的工作；他們期望我畢業後，就可以有能力幫補家庭的生活，但我卻要離家去修道。但事實卻不是這樣，因為慈幼會知道會士的家庭貧困，就會自動每月寄相當多的錢到會士們的家——每月二百元，令媽媽非常高興說我有福氣。

經過一年初學、三年哲學、三年管理學校和四年神學，就可以返回上海；豈料當時政治風雲色變，只能留在香港，因為統治中國是無神論的共產黨：誰信教就要坐

牢，甚至殺頭。所以我就不回大陸，而做個香港人了，直到現在。

摩登的上海和香港

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是個很興旺的城市，也頗為西化，所以身邊的人對他接受一個外來宗教沒甚麼問題，而且上海天主教發展得也很好。至於香港，當時已是英國殖民地，同樣相當西化。

我到這裡的時候，香港是鄉下來的。由上海到香港，只有黃包車，我和陳日君兩人一起坐一架黃包車到來。

這裡的外籍修士比國籍修士多些，外國人來中國傳教嘛。但大家都是修會的人，都是信天主的，尤其是慈幼會是講愛的生活，所以我們相處沒有甚麼。

其後李神父在美國修讀碩士，成績優秀，原本還想讀博士，但因他曾批評校方管理不善，意見雖被接受，校方卻不讓他繼續讀下去。回港後，李神父擔任香港鮑思高舊生會的神師一段頗長的時間。

我們慈幼會學校有很多舊生，所以學校組織一個舊生會，我被選為他們的神師，管教他們，希望他們做個慈幼會好的工作人員。

他在西環聖安多尼堂區，當主任司鐸也有十七年之久。在堂區裡，李神父又成立聖母進教者之佑會，這是一個幫助剛畢業學生的善會。

我們慈幼會十分恭敬聖母，那時慕道班的學生畢業後到社會工作，我怕他們受世俗潮流影響而掉失信仰，所以特別成立聖母進教者之佑會，目的是讓他們一個周末聚會一次，大家交流一下信仰的經驗，希望在分享中堅強大家的信仰，因為在大學讀書多數不會提到信仰，尤其新教友

領了洗沒多久，在這麼一個不講信仰的環境中很容易迷失。

新教友家庭長大

李神父對新教友自有一番體味，因為他就是來自一個新教友家庭。他父母年輕時加入了天主教，但首胎兒子出生後患病，看遍上海的醫生，最終還是病重死去。父母開始對天主感到灰心，一次兩次沒去聖堂，慢慢地就沒有再去，直到他九歲的時候。

我家裡真的蒙天主保佑，我生活在已經不算是教友的家庭中，很多禍患，閣樓明明沒有人沒有水，竟然可以聽到腳步聲，板與板之間會有水滴下來。我們六個人輪流生病，你先病，到我病，一圈之後又重來，這是上主特別警醒我們。

那時我們放棄了信仰，認為家裡有鬼，所以搬家。我們經常搬家，結果也是一樣。父母認為城市裡面有鬼，不如搬到鄉下，看看那些鬼會不會跟著我們。這樣我們就搬去上海的郊區，真的是遍地泥濘，用竹搭的屋子，真的是鄉下來的。

李神父認為，可能天主認為時候到了，浦東堂區做戶口調查，發現他們很久沒有進堂，於是派修女和傳道員來鄉下探訪，勸導他們回教會。李神父還很清楚記得自己第一次踏進教堂的感覺。

聖堂派了一個修女和一個傳教先生，兩人不遠千里從上海浦東到我們鄉下地方來探訪我們，看看我們發生甚麼事。那時我在念二年級，在鄉下學校讀書。他們既然來探訪，我父母便想：他們應該也想見見我，便派人到學校叫我回家。

我回到家，看到有些陌生人在，沒甚麼好說的。他們

看看我，了解我的情況，詳談之後，那修女和傳教先生希望我們再回聖堂，而父母也答應了，說下星期主日會到聖堂。

那時我九歲，第一次到聖堂，對教會的道理半點也不曉得。聖堂相當宏偉，見到很多人在一起，又唱歌，又不知道做甚麼的，完全不明白。彌撒完了之後，教友便陸續離開。

那時教會有一種規矩，父母是教友，子女未成年也應該領洗。我父母是教友、領過洗的，只是沒有再去聖堂，而我尚未領洗，他們也就幫我領洗。我領洗時只覺得很有趣，為甚麼那些人在我頭上點水？在我喉嚨位置上搽油？我只覺得痕癢，完全不明白發生甚麼事就領了洗，做了教友。

成為教友就要上教會學校。由於他們家離開教會已久，不知哪裡有天主教學校，而教堂旁有一家女校叫聖心學校，得到校長破格錄取他入讀二年級。

聖心學校是女校來的，不收男生。那時我們不知道哪裡有天主教學校，便試試問校長能不能在那裡讀書。校長見我只九歲，這麼年幼，也就無所謂。那裡全校都是女生，只有我一個是男生。因為我頗懂得唱歌跳舞，所以她們不時讓我開會時唱些歌。我懂得唱《麻袋歌》，她們覺得頗有趣的。

「耶穌出巡愛西環」

若說中西文化薈萃最為顯著的例子，可能是李神父發起的「耶穌出巡愛西環」，由他帶領教友走出聖堂，隆重地在街上傳教，加強教友傳教意識。巡遊自七十年代開始，曾經停頓過一段時間，在 2000 年又重新開始。

最早是我發起的。我做聖安多尼堂的本堂十七年，發起了很多東西。其中一個就是西環的耶穌出巡。我不太記得了是那一年開始。

我發覺到傳教隆重一些，在街上出遊會有效一點。香港從來沒有這種事，所以我發起這個耶穌出遊，目的是傳教，在街上遊行，有音樂等，使外教人認識一下天主教。

要一、兩個小時停車停行人給我們遊行並不容易，那時要向英國政府申請的。但我覺得傳教是要走出去，讓街坊看到我們天主教的情況，這是向街坊傳教的意識。開始時當然很困難，因為這是從來未有過的，政府若讓你這樣做，便要封路不讓車行。我想盡辦法，找了不少人幫忙，最後終於得到英國政府的批准。

教友們很高興，很多善會參與。香港有很多菲律賓人，他們多高興啊，全部菲律賓的女傭都一起參加，相當隆重的。我們有音樂，又有打鼓，很多街坊也走出來看熱鬧。

外教人在街旁看熱鬧，我們特意在路上擺一些攤檔，有些小朋友跟他們父母來買東西，弄得好像墟市一般。又沒有車，有人遊行，又有攤檔，真的很熱鬧的。

這活動也確實吸引了一些教外人，而傳教沒有難度的李神父，便在堂區開展了兩個慕道班。

以前的時候好一點吧，多些人。現在人們只有上班沒有下班，都沒有時間來慕道班了。

傳教是很容易的，講天主教道理，講耶穌降生成人發很多奇蹟。奇蹟便是事實，證明耶穌不是普通人，普通人不會發奇蹟的。既然耶穌發很多奇蹟，死後復活，五餅二

魚能餵飽幾千人，這些奇蹟是事實來的，充分證明耶穌不是普通人，他是降生成人的救世主。

李神父本身也遇到過奇蹟，使他認為傳教其實並不困難。

佘山的奇蹟

上海佘山有一個乙級聖母聖殿，是教會著名朝聖地，當時人人都說佘山有奇蹟。每年五月聖母月，教友都蜂擁前來朝聖。媽媽和外祖母帶他一起參加聖心學校的朝聖，沿十四處苦路跪拜上山。

那時五月份，去朝聖的人特別多，鄉下城市各處都有人去佘山。我領聖體時，我九歲嘛，真的是腳不著地去領聖體。為甚麼？因為人多啊，把我夾在中間，真的是腳不著地。

佘山你知道吧？現在有水泥地，以前只有泥地，上山很難的，五月份又是雨紛紛的時候，地上很濕。到第一處時，我那時穿著白褲子，媽媽給我一條手帕讓我墊著跪下。到第二處時，媽媽收回手帕，因為她看到同去的修女，穿著白色修女服也不嫌棄，就這樣跪在泥地上，我媽媽不好意思。

我就這樣跪下，起來一看，卻不骯髒。天主對我非常好，我感覺很奇怪，仔細檢查，確實是乾淨的。我們把這件事當奇蹟，但沒有大聲跟別人說。

望完彌撒走出聖堂門口，我媽媽提議：我們上來時沒有沾污，現在下過微雨，聖堂面前是石板路，有些凹凹凸凸的水窪，積了些雨水，我們跪在水窪之中再試試。

我們找了些石板不平積了水的地方跪下，卻不沾濕。這表示天主特別寵愛我們吧。因為佘山上面有很多聖像，

一個一個，周圍都有，我們到處去看，到處跪拜。

後來我做神父，想先去佘山朝拜聖母，那時天氣已經很乾燥，我第一時間想試試會不會弄髒。我走到第一個聖母像的位置，先看看地面，頗乾燥的，有些草在，我先試試會不會弄髒。一刷，立時有些草跡，那時便知道九歲時的事是奇蹟來的，不是經常會有的。

九十一歲的李神父已從堂區一線工作退休。一路走來，他從來沒想過放棄修道，也從沒有質疑天主，因為修道生涯讓他感到快樂，透過聖體與尊貴的天主一起。

與天主一起行聖事，代表天主送聖體，代表天主講天國的道理，是多麼尊貴啊！

我們的信仰並不是說，信了教就有福，有時甚至要面對痛苦的，我們的救主耶穌便是釘在十字架而死，不過他為了表示自己不是普通人，死後三日復活，之後升天。這一切事實都足夠令人信服，讓他們看到天主教是真正的信仰。

我只想幫助他人入教，因為人的本性是相信神的，你沒有就會自己搞一個出來，有學問的人也是這樣。

為此，他也為有傳教心火的教友，創辦了「靈火文化中心」。

中文聖樂的洋人創作者

—— 杜逸文神父 (Fr. Dino Doimo, PIME)

1934 年	出生於意大利威尼斯附近
1946 年	加入本地教區維托里奧·維內托的修院
1957 年	加入宗座外方傳教會
1959 年	晉鐸，同年到香港服務
1963 至 1965 年	擔任教區教友傳教總會神師（現稱香港天主教教友總會）
1967 年	擔任油麻地天主教小學校監和聖保祿堂主任司鐸，之後在新蒲崗、葵涌、大埔等多個學校堂區服務
1992 至 1996 年	返回意大利總會服務
1997 至 1999 年	擔任恩主教書院校監
1999 至 2007 年	擔任兩屆宗座外方傳教會香港區長
2008 至 2018 年	擔任九龍灣聖若瑟堂主任司鐸
2018 年至今	擔任上水聖若瑟安老院駐院神師



（圖：杜逸文神父，攝於 2018 年）

訪問、撰文：陳樂信、張小蘭

翻開香港教區各堂區都採用的中文聖歌集《頌恩》及《心頌》，不難發現杜逸文神父的作品。除非是認識他的教友，單看他的名字，大概沒人會想到他是一位會創作中文歌的老外神父。他早在意大利的教區修院生活時，已偶然創作聖歌。

在堂區、修院已經玩，有個教授教我們音樂，我偷偷地找他，請他看我作的東西，他說：「好，但你現在要讀書，不要做這些事。」

杜神父在教區修院會彈風琴，後來加入了宗座外方傳教會，那裡沒有機會彈奏，來港後要學習也沒有時間，漸漸便放下了音樂這個興趣。

創作聖歌生涯的開始

直至有一次到洪水橋代替一位休假的神父開彌撒，那裡的歌詠團需要唱「答唱詠」和「信友祈禱」的答句，他就為他們創作一些短誦。不過，杜神父創作最多禮儀歌曲是八十年代在新蒲崗善導之母堂之時。1985年，他更曾出版一本A6尺寸的小型歌集《大地兒女的喜樂》。

當時有《頌恩》，但歌曲不多。那裡有兩隊歌詠團，他們願意做我的試驗品，我作了甚麼，他們就試唱。

《上主，求你垂憐》是我在新蒲崗時候創作的。想作整套彌撒曲，「上主呀……光榮頌……聖聖聖」。我好喜歡大戲，所以想用這個方法，便創作了《上主，求你垂憐》（《垂憐頌》）。起初給人們聽，尤其是一個司琴，是一位女士。但她說：「神父，唔好啦……有無搞錯。」所以我便放下了。我天真的以為人家會喜歡，原來人家不喜歡。在那裡開始作其他歌。因為教慕道班，所以有了《從日出到日落》，還有聖母經、天主經、奉獻詠，多數是簡易的歌曲。

當時教會的歌一般都是西式風格的，我覺得應該是中

式的。那次之後感到有些失望，放下了一年，後來再試用西式，不過仍舊覺得不好，應該有東方的特色。

英語大戲到神功戲

杜神父對粵劇大戲的喜好，自他 1959 年到港不久後，因一場英語粵劇而愛上了這種華南傳統表演藝術。

我來了香港一年左右，跑馬地聖堂有很多海報，其中一張宣佈有一個樂團從新加坡來唱粵劇，是耶穌會將它譯成英文，他們用英文來唱。我便到大會堂去看。當時跑馬地有戴遐齡神父¹，他也有寫聖樂。那次我是與他去聽。我非常之欣賞，因為他們先解釋那些粵劇的動作是甚麼意思，甚麼時候是進來，甚麼時候是出去，甚麼時候是自己的思想。他有時講的說話，講另一個人不好的說話，其實是他在思想，不是他講出來。它的音樂是有一種格式的，而它的樂器，你知道是甚麼樂器，就知道是他的思想或者其他。如果你不明白，就不會看得懂。

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們開始唱，其他人都在笑。我就奇怪：「有甚麼好笑呢？唱得不錯呀。」原來他們笑，是因為那是一首很 popular（流行）的粵曲，他們習慣聽中文，但那是他們第一次聽英文。這（英語大戲）是很好的，可惜沒有甚麼發展。西人是會喜歡的，中國人就不會。西人會欣賞和明白那些衫、那些動作、那些化妝的意

¹ 戴遐齡神父 (Antonius Riganti, 1893-1965)，出生於意大利，屬宗座外方傳教會，1920 年抵港，曾任香港代理主教及副主教，生前創作多首廣為人識的中文聖樂。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戴遐齡神父〉：<https://bit.ly/2GseljW>。

思。所以我之後偶然也會去看大戲，在街邊那些，不用錢的，即鬼節時候那些戲。²

音樂是歌詞的僕婢

杜神父的作品多數取材自《聖經》，而廣東話有九個聲調，他認為本身以朗誦式宣讀出來已經好像有旋律一樣。

我不懂得分開作曲和作詞，我要先有詞，再作曲。常常是那些字給我旋律，給我動機或理由去把音樂譜出來。我的觀點，第一個原因是，我敢作曲，但我不敢作詞，因為作詞中文要很好。第二是，我覺得禮儀音樂要幫助發揮文字。教會的音樂、額我略的音樂，有一個原則，就是 melody（旋律）是那些詞的僕婢、工人，是幫助那些文字。所以一首歌的價值是在歌詞裡，因為那些詞是來自《聖經》。

我作的音樂，不過是發揮那些詞，將它們提昇或者給有興趣的人唱或者講那些詞出來，讓他心裡面有更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創作的歌，時常都是有這目的。我多數是想到慕道者為對象，希望他們會背《聖經》。如果單調地背誦可能會好難，倒不如我寫成為音樂，令他們容易一點去背誦。

根本廣東話是有那些聲調，如果我將那一句，順著那聲調，已經有種音樂感在裡面。不過，聲調不是已有一個旋律，那我可不可以將它原本已有的聲調 adapt（切合）

² 鬼節又稱中元節、盂蘭節，香港的民間信仰團體在農曆七月會舉辦一至五天的盂蘭勝會，免費表現「神功戲」給人神共享。

那旋律？好像塑膠那樣，我要給它一個 shape（形狀），若一首歌不宜太高，便拉低一點，就可以做出一個旋律。

在新蒲崗服務的時候，有些潮州人在彌撒後，會以潮州話念經，差不多一個小時，全部都是這樣唱出來。我覺得非常好聽，應該把客家人、潮州人、廣東人以前的唱經錄下來。他們自己方言的《聖母經》、《天主經》，可以加上音樂，可以好中國化。

現在我作曲的靈感好像乾了的水泉，無水出來，好少創作……去年底作了《信經》。彌撒中念的那篇好長的《信經》，無人敢唱！不過以前我已經將《宗徒信經》編了歌曲，因是比較短些，很多人唱。但去年創作了這一首，還有和聲調的，現在有一、兩個堂區想唱。

但對於自己最滿意的禮儀音樂，杜神父感到不知從何說起，因為他覺得好的，沒太多人愛唱；反而他認為普普通通的，在教友間卻很受落。

我疑惑我自己的音樂到底好不好？它們有沒有價值？因為有一些歌我覺得很好，但卻沒有得到太多人接受和歡迎。反而，有一些我覺得「麻麻地」³，卻又有很多人接受。我覺得「最靚」的一首，是「我的靈魂歌揚上主」（《卑微的人》），但沒有人唱。

還有在《心頌》的《基督的榜樣》，是〈斐理伯人書〉的句子。我們堂區以前也有唱，但外面堂區就不太多唱這首歌。可能它要求有一個獨唱，還有重唱。重唱是教友一起唱的，獨唱則是一個男或是一個女，可能要求高一點，也可能是歌詠團不敢唱或甚麼原因。其中有幾首我覺

³ 廣東話，指普普通通。

得很好的，但很少人唱。

起初最使我開心的是《從日出到日落》。這是很簡單的旋律。這個我覺得也好，但實在太簡單了，可能就是因為簡單，所以教友喜歡唱。旋律真的好 simple（簡單），還有奉獻「上主，你賜給我們食糧」（《禮品》）。另外一首是《基督耶穌》。但未必是我覺得最靚的、最有意思的，及最有內容，我指在那旋律方面。還有幾首並不 popular（流行）。所以我對自己的作品有些疑惑。

與其說是疑惑，更可能是出於杜神父的謙虛。因為在 Youtube 上，不難找到有歌詠團錄製他們演唱杜神父的多首聖歌。此外，他的 1985 年歌集《大地兒女的喜樂》，已有教友歌詠團重印成 A4 尺寸的歌集，收錄了十七首他當年的作品，準備於 2019 年 8 月演出。



農村音樂氛圍

杜神父在距離威尼斯約一小時火車路程的一條小村莊出生。家裡除了父母，還和三兄弟姊妹一起過著農耕生活。他的音樂細胞就是來自家裡，因為在他的鄉下，幾乎所有人都會玩一種樂器。

我們自己有塊很小的田，甚麼都種，例如粟米、生果、薯仔和麥，夠自己食，也釀酒自己飲和售賣。一年一次最能賺取現金的就是養蠶賣絲。我那區差不多每個農夫都養蠶蟲，五、六月就最辛苦。這好值錢。我們附近最早的工業是製絲，好多沒田的工人就是在這些工廠造絲，或者織棉。其他工業都有，但最重要是這個工業。

那裡是意大利東北，有氣候的問題，到了十月之後，便日短夜長，尤其是十一月至一月期間，夜晚是很長的。農夫晚上不去耕田，沒甚麼事情做，便多數在家裡聊天和唱歌，所以很多人都會學一個樂器。

最普遍的樂器是手風琴，第二普遍的是結他。我有一個 cousin（表兄）拉手風琴很棒，我很喜歡聽他拉。我姐姐的老師是我們的朋友，教我們拉奏，都是自己學的，又或者有師傅，像有一個農夫會拉，便教我們。我爸爸會玩 mandolin，不知中文叫甚麼，有兩條弦一對一對的⁴。他們多數是自己玩，或者慶祝甚麼，或有甚麼機會去另外一個農夫的家裡，便在晚上玩，玩到很晚才回家。所以很多人懂音樂，我們小朋友就是在這種氛圍中，從看和聽中學來的。

情願去緬甸

八十五歲的杜逸文神父已來港六十年，在 2018 年成為安貧小姊妹在上水聖若瑟安老院的駐院神師，卸下了多年來專注堂區服務的職責。他回想十二歲加入教區修院，完成神學二年級後，便立志到外方傳教。

當時對傳教最大的想法是，我們這裡（歐洲）每個人都認識耶穌，那麼另一邊的地方大多數人都不認識耶穌基督，而且當時是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之前，教會認為不認識耶穌基督便沒有得救，所以都想出去傳教。其次，這裡也有很多神父，他們的生活都很舒服，所以年輕人就覺得出外傳教是刻苦一點、有多些挑戰。

⁴ 曼多林，又稱洋琵琶，是一種形體較小、面平背駝、琴身形狀如半個梨的彈撥樂器。

看這些雜誌，尤其是我的米蘭會在緬甸有好多神父，有其中一個現在已是真福，他寫的信講那裡的生活，看到「嘩，好好」，後來我真希望有一天會派我去緬甸看看，不過沒有。

杜神父的父母知道自己兒子的心願，所以也沒有反對，覺得他已是成年人，最重要是自己考慮清楚。傳教士獲派遣到甚麼地方福傳都是由修會長上決定。雖然如此，但每位傳教士心中都有夢想的傳教地點，而杜神父最渴望到緬甸，反而最不想到日本，其次就是香港。

我來自鄉村，覺得緬甸或印度的地方比較貧窮和簡單，比較適合自己。我有表達心願，但好小聲，因為他們知道你想去哪個地方，就不會派你到那裡。

傳教士在晉鐸前的晚上，修會為他們舉行明供聖體祈禱，並即席宣佈派遣他們的福傳地點。緊張萬分的杜神父聽到宣布：「香港！」

明恭聖體時，我祈求天主，因為最怕他不會派我，留在意大利一、兩年深造，或在其他修院做會長、培育……每個都想（被派遣）。宣佈派去香港，一方面好開心，因為有派遣我出去，但一方面又不太開心，因為不是我最鍾意的地方。

翌日早上，杜神父的家人遠道從威尼斯到米蘭參加他的祝聖禮。熱心的母親知道結果後，對他加以鼓勵。

「你不是很鍾意，但都派了你了。」他們知道我好想被派出去福傳，不想留在意大利。她好開心，她每天參加彌撒，爸爸沒有。她說：「我求了好久，求天主讓你做傳教士。」或許她看到我整天都看傳教士的雜誌，所以他們已經知道我可能有這種思想。

「文」字輩的老外神父

來香港服務的傳教士，為方便與他人溝通，大多會起中文名。中國人起名字，傳統的家庭會跟隨族譜，同一輩份的叔伯兄弟，名字裡都有一個相同的字。宗座外方傳教會的一批老外神父，雖然沒有族譜，但有好幾位的中文名也取用了相同的「文」字，為的是紀念他們的中文（廣東話）老師——文明德神父⁵。

文明德神父教過我，我又教了幾位神父，周偉文、胡永文，他現在不在香港，還有宋啟文，有三、四個神父，我都用「文」字，所以就保留了個「文」字。現在最近有一個印度的，叫文凱華，在馬鞍山服務。

是我負責找人起名，多數是找老師，告訴他：「這個人叫這個英文名，我們想用這個姓氏，想紀念我們以前在這裡的神父。」剛才提到戴遐齡，我們2000年有兩個神父來香港，那時是2000禧年，兩個姓名最後一個字是「禧」，第一個的姓氏就紀念以前的神父，所以一個姓「戴」，叫戴民禧，現在在聖德肋撒堂。另外一個是龍家禧，紀念一位以前的龍神父。⁶

然而，杜神父自己的名字，卻是在跑馬地聖瑪加利大堂認識的一群小伙子替他改的。

我的英文名 Doimo。來到香港，當時有一個石副主教⁷，是中國人，他幫我們改名。他當時就跟我們西人的名

⁵ 文明德神父 (George Caruso, 1908-2004) 出生於意大利，屬宗座外方傳教會，1932年抵港後從未返回意大利，在港服務七十二年。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文明德神父〉：<https://bit.ly/2XsVvXi>。

⁶ 龍家禧神父 (Michele Camastra) 屬意大利巴理教區，在1999年被派遣來港傳教，為期十年。他已於2012年返回意大利服務。

⁷ 石抱璞神父 (1895-1962) 為香港教區神父，在1954-62年擔任副主教。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石抱璞神父〉：<https://bit.ly/2KR15eg>。

字，取同音字，Doimo，Do-就改杜，-i-mo，他就改了「杜義模」。我去跑馬地服務，第一年都未學中文，與青年接觸，他們有些是在讀中學的青年。他們問我叫甚麼名字。「杜義模」。他們很快就笑，給我改了很多「花名」⁸，「杜意無」、「道而無」、「多兩條毛」等古怪嘅嘢。他們說：「神父，這個名字不好聽，不如我們幫你改。」我就挑戰他們，他們揀了幾個名字，其中一個是「逸文」，我便選了「逸文」。

期望出現亞洲或東方元素

1962-65年的梵二大公會議對近代天主教會是一個很大的衝擊，尤其在本地化方面。其中，彌撒採用的語言，由拉丁文改為各個地方的本地話。對中文聖歌更是需求若渴。

它通過了，我們好開心。在彌撒中，最初以為彌撒讀經當然會本地化，但感恩經不可能，或者會保留成聖體那部分是拉丁文，但誰知全部都可以本地化，嘩，真係好好。這一來又要開始唱中文歌。

另外一件事我沒有機會跟外面講過：為何香港的歌，除了我們創作，用好多外面的呢？即是歐洲的，德國啦，法國、英國……為何我們不用越南的歌呢？日本的、印度的歌呢？即是我們有傳統好有價值的歌，但多數是歐洲的。既然我們能夠唱以前或現在的歐洲歌，為何我們不把越南、菲律賓或者日本，或者韓國的歌拿來用？我在九龍灣聖若瑟堂聽到越南的歌好好聽。

⁸ 暱稱，多用來取笑對方。

梵二前後的教會文化

杜神父在聖瑪加利大堂服務時，堂區由幾位年輕神父管理，比起另外一些由資深神父做主任司鐸的堂區更自由。

當時全世界，包括香港，堂區有本堂神父，而本堂神父好威風，好有權勢，副本堂要聽本堂神父的，這都是大公會議之前的，之後好多東西改了。本堂神父好像一個 boss（老闆），你就做伙記，你做「神父仔」就要聽他的。但我那裡就不是。我們有幾個神父，一個好老，其他好活躍，容神父、博神父、恩保德，好似四個兄弟。大家分工作，你負責甚麼，你又負責甚麼，沒有一個 boss。

另一個神父，在另一個堂區，我們不多久就見面，他向我訴苦，他那裡本堂神父也是意大利人，但他會訂好一切，差不多幾點去洗手間都訂好。我說：「有無搞錯，那你跟他講。」他說：「那有這樣容易？」「你試一下。」「不可以這樣講，要聽話……」。

杜神父印象深刻的一次，是時任教區主教白英奇親自駕車到跑馬地接載他和另一位新來的神父到新界，他覺得這和在意大利的文化不同。

我在意大利的教區見主教，要先兩、三天預約，而且要在主教辦公的地方等，好像一件大事，即使現在回去見主教也是一樣。另外，主教也不會自己開車，他們通常都有自己的司機。

不過，白主教就自己開一部普通的小車。而且他又吸煙，當時吸煙給人的感覺是比較世俗。現在回想都覺得好欣賞（這種親民態度）。在香港，你可以上主教府那裡吃飯，同主教一起聊天，即不用先預約，除非你要講一些特別的事，否則隨時隨地都可以接觸到。

從越南起始的漂泊修道人

—— 林銘神父

(Fr. Pierre Lam Minh, MEP)

- | | |
|--------|-----------------|
| 1953 年 | 越南西貢出生 |
| 1968 年 | 進入修院 |
| 1978 年 | 逃難到馬來西亞 |
| 1984 年 | 法國波爾多教區晉鐸 |
| 1991 年 | 來到香港，先後在不同堂區服務 |
| 2001 年 | 任聖神修院神師 |
| 2009 年 | 獲委任為副主教至 2014 年 |
| 2018 年 | 任聖母玫瑰堂主任司鐸 |



(圖：林銘神父，攝於 2018 年)

訪問、撰文：黃奕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越南陷入南北分裂的戰亂時代，林銘神父出生於南越西貢的一個華僑公教家庭。熱心宗教的家庭生活，為他埋下聖召的種子。在當時的越南，外國傳教士相當活躍，來自法國的尤其多。年輕傳教士所表現的犧牲精神，吸引了少年林神父。

那時剛好是打仗的時候，很多難民在我們堂區，我們青年煮飯、打掃，接待他們。有兩位年輕的傳教士來到，未曉得本地語言，只是過境，但他們跟我們一起服務，倒垃圾、接載人們去醫院等等。我就想，傳教士為甚麼不在他們自己的國家舒舒服服地生活，要來這裡跟我們一起受苦？想到，基督的愛催迫著我們（格後 5:14），他們有天主的愛，所以要跟我們分享。

林神父視他們為榜樣，願望成為神父，像他們般當傳教士。他十多歲便想進小修院，然而因為父親未准許，要等到十五歲才入修院，然後在西貢聖若瑟大修院接受神哲學的培育。不過，他當時並沒有想到要出國。

因為越南至今仍有些地方是很偏僻，沒有神父去的，或者政府都不想你去那兒發展傳教工作。我的理想是在越南，在鄉村、偏僻的地方，沒神父想去的，就去那裡做傳教士。

漂泊的修道之路

1975年，西貢淪陷，南北越統一，變成到現在也是，在一個共產主義制度裡，開始時教會都受到很多限制。

南越解放之後，我們都很想留在那裡。後來所有修院被關閉，我們都想到沒機會在那邊升神父了。主教讓我們在堂區工作，我們有些留在堂區工作，有些回家、回鄉

下，看各自的意願，有些找辦法出去，有些留在那裡打工。

當時林銘神父已經是神學最後一年，快要畢業，卻無望在越南晉鐸。政治變化，加上排華，大量越南人被迫離鄉別井，成為難民，林神父也是其中之一，他在 1978 年坐船到達馬來西亞。

我們在南越下邊，出來後最近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不過新加坡是不收的，所以我們多數去馬來西亞。

到達馬來西亞，政府送我們去一個孤島，叫「Pulau Bidong」；Pulau 即是島，Bidong 是名字，即「比東島」。因為那是孤島，很辛苦，甚麼都沒有，Bidong 讀音又近「悲痛」，所以我們稱它為「悲痛島」。

我們的難民營是 1978 年 5 月才開始的。我在島上都找到些教友，有些比我早走的弟妹也在那裡，日常生活就由他們負責。教友們建一間聖堂，那裡不像香港政府般搭建所有東西，我們自己找，上山斬柴，做四條柱。馬來西亞看管我們的警察，給我們一個軍人用的帳篷，做了一個頂，周圍沒東西的，每日有一兩位修士值日。

因為我在越南已經是神學四年班，其他修士都比我低班，教友叫我和另一位越南修士出來，每日在聖堂值日，有教友來，或者我們去探訪教友，鼓勵和安慰他們，因為走出來，大家的情況都很惡劣。

在「悲痛島」熬過了九個月，林神父獲法國收容。他先被接到一個青年祈禱團體，度過一年的適應期。期間他再次接觸曾在越南傳教的神父，他們知道林神父有繼續修道的心，便把他介紹到波爾多教區。終於，林神父 1984 在法國晉鐸，服務於波爾多教區。

回歸亞洲的傳教之路

天主安排我去到法國，那幾年就在法國當傳教士。不同的只是，我當時的理想，做傳教士的理想，是服務貧窮人，在鄉村，像傳教士般跟人在一起。天主偏偏把我放在最大的城市。天主放我在這裡，我只好接受。

法國的主教是很關心福傳的，法國以前讓很多傳教士向外福傳。主教見到現在他們的聖召不多，所以很難派出去，都有但很少。那位主教很有傳教精神，他接受我時心裡想：「我們現在很難派神父去越南、去亞洲傳教，現在有一位由亞洲來的，我們要好好培養他，待他準備好了，有一天，我把他送回亞洲教會。」

林神父感受到主教的這個想法，於堂區服務了一段日子後，他獲主教的支持，加入巴黎外方傳教會，從而被派來香港。

原來，林神父在越南的時候，已有看過香港的《公教報》和台灣的《教友生活週刊》等，因此，香港和香港教會對他來說，並不算陌生。不過，還是有待來到親身體驗，才算真正的認識。況且，他來香港的時候，已經是1991年。

一位華僑眼中的香港社會與教會

林神父本身是潮州人，在越南也常用廣東話和國語；跟其他傳教士不同，他來香港後要學習的，不是廣東話，而是英語。

香港是國際城市，有很多外國人，他們不會中文，多數說英文。堂區有菲律賓團體，有很多菲律賓人，星期日他們來到聖堂，跟他們接觸，都有需要。

我們傳教士，去到一個地方，即使懂得語言，也要有兩年的適應期，學習語言，或者適應、學習當地的風俗習

慣。香港和越南的華人團體是很不同的。香港是一個不只是廣東人，潮州人也有，或者其他各種人，客家、上海等等，這是第一個不同。

香港雖然是個華人社會，但是比較西化一點，因為始終是在英國政府的管治之下。我覺得很多我們在僑居地，我們的風俗習慣會很似我們在鄉下的，但是在香港已經被西化了。

因為在僑居地，一方面要投入當地，要學語言，因為不學當地語言就無法生存。但是如何保持自己的根，那個文化，是要有一個平衡。

我說一樣很簡單、很具體的例子。我們的家，由我最大到我細的弟弟，我們都會說潮州話。但是在這邊，跟我們同輩的，我來到才知道有些堂姐弟，或者表兄弟，但是他們不會說潮州話了。

林神父觀察到，在這種文化背景下，香港教會的本地化相對走得比較慢。他以越南教會的本地化為例指出，七十年代，第一次在台灣談祭祖，越南主教都有去開會，開完之後他們就進行教會本地化。此外，由於越南也深受中國文化影響，所以也有慶祝中國人的節日。

在新年，由年三十晚到初三那幾天，越南教會訂了，年三十晚是感恩、謝主，年初一是求平安，年初二為敬祖先，那麼那天祭祖，年初三為工作，求風調雨順。即是禮儀年已有這樣的安排。

中秋節是比較小朋友的節日，就好像多了一個兒童節，有中秋節的彌撒。每個堂區都訂了，除非碰巧那天是慶日，否則就有中秋節禮儀，新年就有新年的禮儀。

在禮儀中，我們「掬」香，是西方的。如果你有機會去越南，由八十年代開始，所有堂區有個鼎，一個香爐；進台禮的時候，輔祭會給神父三支香，神父就插下去，代替獻香。

反而在香港叫人「裝香」，人們很難接受。因為在香港拜神的人多，如果天主教都「裝香」的話，就會令人覺得「你跟了拜神的人嗎？」人家會這樣說。在越南就不會，因為一般的家庭都可以「裝香」，聖堂都會「裝香」。大家覺得沒甚麼特別，是一種敬主的表達。

林銘神父來香港之時，社會正面對九七回歸，很多人移民外國。在教會內，正值胡振中樞機發表《邁向光輝的十年》牧函（1989）之後，林神父就經驗到積極的一面。他特別欣賞當中提出的兩個項目：信仰培育和信仰小團體。

那時開始有聖經學院、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向外，很多的培育中心成立。這是信仰培育，我覺得很積極的方面。

第二方面是信仰小團體，是鼓勵在每個堂區有信仰小團體，即是鼓勵鄰舍。這在越南，一向堂區都是這樣組織的，很久了，傳教士一來，就教他們這樣組織，鄉村也是這樣組織的。

我來到這裡，剛好在柴灣，我們巴黎外方傳教會一位神父，黎和樂神父¹，他以前在越南，是我們堂區的本堂神父，我們那裡也是分成幾區，教友住在不同區，裡面有些信仰小團體。

¹ 黎和樂神父（Gabriel Lajeune，1926-2018）屬巴黎外方傳教會，1950年晉鐸後獲派到越南傳教，至1976年被迫離開。黎神父於1977年來港，1979年成為柴灣海星堂本堂神父，服務該堂十六年之久。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黎和樂神父〉：<https://bit.ly/2GnXmiX>。

柴灣有七區，每區內有一個核心小組，每三個星期或者最少一個月有一次聚會。平日夜晚我們會去小組聚會。信仰小團體跟越南的模式差不多，認識到很多人，到現在我還記得他們住那裡、甚麼名字。那時就是這樣，所以適應時，在堂區沒甚麼特別問題。

林神父的另一發現，是相對於越南和西方，香港教會早已發展出一套相當有系統的慕道期培育。

在這裡，每個堂區都有慕道班，而且慕道班有好健全的系統，一年半的學習，是很著重福傳。外國是沒有的。

相對於越南，大部分都是兒時領洗的，有的是皈依的，人數並不多，未必是開慕道班，個別幾個聚在一起學。而在法國，那時很多都是兒時領洗的，兒時不領洗，長大後都不會去領洗。現在歐洲國家，很多都不是兒時領洗了，慢慢才有慕道班、慕道期。

陪伴在港越南教友之路

九十年代，不少越南人仍然滯留香港，生活在難民營裡，教區內有神父負責難民的牧靈工作。林神父來到香港，仍未接受正式任命的兩年間，專注於堂區之餘，每周也有一天會到難民營探訪難民。

那時去過錦田的石崗營，後來他們搬去萬宜，就去萬宜，有去過大鴉洲，都是一個星期一次，跟他們開彌撒，開完彌撒就探訪他們，例如他們的家庭，有需要就探訪他們。或者跟營裡面的 leader（領袖），團體的負責人開會、討論。

他們有時聚會，就好像在越南般，分享《聖經》。一區一區地，一組人分享《聖經》，一起練習唱歌，或者在

裡面探訪有需要的人；有些可能是剛剛來到，有些可能未適應到。

當時除了難民營裡面，在外面有兩個地方有彌撒。一個在屯門，星期日下午四時。而九龍灣聖若瑟，1986年成立時，由於對面有個啟德營，所以那裡開始有一台彌撒。

因為那裡有一位陳達明神父²，他曾在越南那邊服務。他是屬於廣西北海教區的，那時來香港，在華南修院讀完書，去了越南服務，1975年之後回來。他會說越南話，那時就開始有一台彌撒。

在啟德營有很多是已被外國接收、等待出國的越南人。教友逢星期日申請出來，到對面參加彌撒。

在聖若瑟堂，起初就只是一台主日彌撒，直至1994年，越南團體才成立。林神父於2006年接手照顧這個團體。曾經漂泊的他，也許更能體會越南教友的處境與心情。

那時有些越南船民要被遣返，有些留在香港，因為他們跟香港人結婚，當時就成立了這個越南團體，把他們聚在一起。都是同一台彌撒，不過參加的人比較固定，因為沒有去外國，就成為越南團體。開始的時候叫做「希望的團體」，Community of Hope，因為可以出來、自立，一個希望團體。

有時星期日無神父開彌撒，負責的神父放假，我就會去屯門或者這兒代替，只是幫手開彌撒。當時有其他的越南神父在那裡服務，所以就不用我。

² 陳達明神父 (1934-1998) 出生於廣西，原進入北海小修院，內地淪陷後偷渡往越南，後轉到澳門，1957年加入香港的華南總修院繼續接受培育，1963年成為首位在越南晉鐸的華人神父，直至七十年代回香港服務。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陳達明神父〉：<https://bit.ly/2VebZ1C>。

越南神父們陸續返回他們的國家，或者有另外的工作。2006年當時沒有其他越南神父，變成有個團體，沒有越南神父，那麼我當然要為他們開彌撒。於是我從06年那時開始到現在，負責陪伴這個團體。

這是很需要的，不只是彌撒，而是建立一個團體，他們可能都會遇到生活上的困難，當相遇的時候，大家互相鼓勵，可以互相幫助，我覺得這是重要的。如果沒有越南彌撒，他們就沒有一個地方相聚，變成很孤單，有問題時不知道找誰。

這十幾年來，沒做甚麼特別的，就是去那裡陪伴他們，給予聆聽，有時安慰，有時指導。其實，他們彼此間互相分享，彼此支持，互相幫助，做神父的，是聆聽和鼓勵他們。

由越南走到法國，再來到香港，林銘神父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與不同文化的人合作，深深感受到把人連結在一起的，是教會的使命。

是甚麼讓我們不同的人走在一起，就是我們的信仰，我們的目標，大家都在這裡做天主的工作，無分彼此，亦彼此接納。即使我們有「幾叻」，我們都只是一個人，我們教會是普世性的，教會是大家一起工作的，不是我們做自己的工作。我相信這是很重要的。

教會與堂區

遊走於七層徙置區的老外

——狄和詩神父 (Fr. Pierre Devos, CICM)

- 1941 年 出生於比利時
- 1966 年 晉鐸、在英國倫敦學習英語
- 1968 年 到達香港、在新亞書院學習廣東話
- 1970 年 在聖雅各伯堂當代理本堂兩個月後，先後服務紅磡聖母堂及油麻地聖保祿堂
- 1971 年 調任聖雅各伯堂助理司鐸，翌年升任主任司鐸
- 1976 年 任坑口聖雲先堂主任司鐸
- 1977 年 任聖愛德華堂主任司鐸（至 1983 年）
- 1996 年 回到聖雅各伯堂任主任司鐸
- 2010 年 任聖若翰堂助理司鐸



（圖：狄神父晉鐸金禧。圖片來源：天主教聖若翰堂 Facebook 專頁，攝於 2016 年 8 月 7 日）

訪問：陳樂信、黃奕清

撰文：陳樂信

聽狄和詩神父說他的故事，感覺就像跟著他回到七十年代的香港，遊走於東九龍一帶的七層大廈徙置區之間。獲派來香港傳教，是狄神父當初意想不到的事；在比利時修院與一位來華會士的相遇，把原以為自己只能到非洲傳教的他，帶來到這個東方社會。而在香港服務期間，與一位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修女的相遇，又把他帶進校園牧民的世界。

決心到外方傳教

狄神父生於比利時，在農場長大，中學畢業便加入聖母聖心會修道；他選擇外方傳教會，是因為覺得當本地神職人員不夠挑戰性。

他們（本地神父）的生活似乎很安定；去外方傳教，雖然並非很認識，不是很了解，不過就似乎比較吸引。加入的修會——聖母聖心會，在本地來說，是全部都會去外方傳教的，肯定會離開自己的鄉下。

入初學院一年，然後哲學兩年，神學四年，讀完神學第四年就會立刻離開的。本來，我語言是「麻麻地」。哲學時已經有分開兩個語言：法文和英文，因為會離開本地，本地是講荷蘭話。升讀神學的時候，我們有兩間修院，一間是用英文，另一間用法文；我申請去法文的，心裡想讀法文就去非洲，去剛果，因為是我們比利時的殖民地。

實現到中國傳教的初衷

在神學最後一年級時，狄神父遇上在台灣和香港傳教、剛好回比利時休息的會士，這成為他最終獲派來香港的關鍵，亦實現了他加入聖母聖心會的初衷。

因為我們的修會是為中國而創立的，我們早期所有神父都是去中國傳教的，中國的北部，即內蒙古。不過解放

後，大陸的神父都要走。在五零年代，1958年開始，有些神父從大陸出來，經過香港，有些神父見到香港有些北方人，便想留在這裡。當時本地香港教區是不允許的，所有從大陸出來的神父，他們全部都是經過香港離開中國，但是教區的政策說，不可以讓他們留在這裡，不知道是否怕有太多。

我們有一、兩個神父，很「硬頸」¹的，沒有離開，留在這裡幫助那些來自北方的教友，在調景嶺及紅磡這兩個堂區。在這兩個地方，我們有些神父留下來，因為他們都是服務，特別是服務從北方來的教友，教區都慢慢接受。

我是七零年代的。那位神父回來放假，說需要接班人，因為那批神父都開始年紀大，要找較年輕的神父。他問我：「你有沒有興趣去香港？」我答他：「有，不過修會不准許的。我學法文，多數是去非洲的。」那神父說：「可以的，我會幫你安排。」他真的，讓我畢業的時候，修會決定派我來香港。這其實都是我入修會時的一個期望，因為我剛才說，我們的修會當初都是為中國的。

我讀初中的時候，即是51、52年，那些（被趕離中國的）神父回來，會先回家。他們回比利時的時候，因為我們是天主教國家，所有學校都是天主教學校，他們便會到中學做分享，分享他們的經驗。

他們大家都坐過監，回來休養，因為坐監，都很瘦。他們到學校分享時都說，是暫時性的，很快的，共產黨會

¹ 廣東俗語，固執、堅持的意思。

「祿」²，我們很快就會回去。他們到處去講，使那時候的我，心裡想如果是神父，去外方傳教，覺得去中國好，於是有個心願，他日我都要去中國。不過，入修會的時候讀法文，就去非洲。但到最後，天主的安排，讓我來香港。

既然我這麼多年都是讀法文，會長便說：「好吧，你去香港，你都要懂英文的。」我們都會學英文，中學都有，不過就好像香港人的英文般；於是讓我去倫敦讀一年英文。

我們修會在倫敦有個堂區，我學英文時便在那個堂區服務。誰知在那個堂區我都是年輕的，那堂區的神父都是以前在中國傳教的，都是年紀較大的，我是「後生仔」。本來他們想我留下來，但香港的會長說：「不行，你一定要來香港」。於是，1968年來到了香港。

輕輕的文化衝擊

狄神父來到時，香港已經是一個城市。他在倫敦除了讀英文，也有點牧民經驗，讓他習慣城市的生活，所以來港後亦適應得很快。他覺得這兩個城市的生活有很多相似之處，而不同的，主要是飲食和待人接物的文化。

我來到香港去到聖母堂，他們不給刀叉的，被迫要用筷子，頭兩個星期，隻手真的抽筋，隻手是很累的。不過我很感謝，兩個星期之後，可以用筷子食飯。

去飲茶，食雞腳，人家食，我也食。不過，我都說我是在農場長大的，我們不會食雞腳，頭和腳是會丟掉的，

² 崩潰、倒台的意思。

但是食豬時，就甚麼都吃。來到香港，人們覺得是可以吃的就吃。

初初只有一樣東西是很怕的，就是皮蛋。因為是黑色的，對我們來說，一隻這樣子的雞蛋，就是變壞了。我望都不敢望，我好怕皮蛋。後來都會吃。

食物不同，可以嘗試，也可以避免；語言不同，可以去上課。傳教一定要跟本地人溝通和合作，生活習慣與文化的不同，需要用心認識和體會。

我們都說「東方的心」，或者是「中國人的心」，是很難認識、很難了解的，因為中國人不會直接告訴你在想甚麼。他會用一些說話，你自己要思考，原來是想講甚麼。西方人不是這樣的，會直接跟你說，但中國人不會直接答你。我想當時更加明顯，現在改變了，不同了。當時是這樣，是很神妙的。

徙置區一帶的傳教生活

狄神父在新亞書院學習廣東話，1970年5月完成課程後，曾在油塘聖雅各伯堂當代理本堂兩個月，然後出任紅磡聖母堂的助理司鐸。

一畢業，講得「麻麻地」，聽都可以，寫就更加不可以。但剛剛有位神父，在油塘，他是當本堂的，要離開兩個月，他要去菲律賓。我剛剛學廣東話畢業，便派我去油塘，做代理本堂兩個月，只有自己一個人，是一個好新的經驗。

當時的油塘是徙置區，即是一些七層大廈。我們在第四座有間幼稚園，在地下的，我也住在幼稚園裡，有一位

伯伯負責清潔和煮飯。就在那裡兩個月，神父回來後，我就返回紅磡聖母堂，做副本堂。

當時的聖母堂，附近都是那些七層大廈徙置區。當時好「興」³去探訪，會見到當時的生活，有些人住在路邊，因為房間細小，又是大家庭，家庭都有六、七個人，有張床，有張可以摺起的食飯枱。晚上多數是在穿膠花，家人全部都一起做的。做好之後，貨車便來接貨，同時送新的材料來。

油塘一帶的開荒者

在70-71短短的一年間，狄神父先後服務過紅磡聖母堂和油麻地聖保祿堂，然後重回油塘聖雅各伯堂。

我們修會在油塘，那位神父在油塘建一間中學——普照中學。⁴他在油塘做本堂，而且剛好在高超道有新的屋邨，使他很忙。修會派我去油塘協助他，做副本堂神父。他給我負責高超道那新發展的屋邨。因為油塘沒有地方住，他住在幼稚園，我住在普澤小學⁵，住了兩年。

我是負責新發展的這個屋邨，第一台主日彌撒有四個人，是一個媽媽和三個女，在學校裡面用一個課室。慢慢地，兩年之後，經常會有五、六十個人來主日彌撒，都是用學校課室的。

我負責高超道那區，慢慢組織彌撒的讀經組、歌詠團；慢慢要認識人，因為是新的屋邨，大家都是新搬來

³ 流行的意思。

⁴ 根據「天主教普照中學」網站，該校是由聖母聖心會史達生神父（Ernest Stassen, CIM）於1970年創辦。

⁵ 天主教普澤小學由聖母聖心會創校，已經停辦。

的，主要是探訪。當時還可以探訪，不會有人干涉你，你可以周圍走去探訪，慢慢認識新搬來的教友，慢慢就組成一個基基團。

由社區走進校園

過了幾年，狄神父被調派往人口更少的坑口，負責清水灣的聖雲先堂。

我去了聖雲先堂一年。我起初去聖雲先堂時說，沒甚麼事做的，坑口那條是細村，教友又不多。其實整條清水灣道差不多都是這個堂區的，即是地方很大，但是人很少。星期六晚有一台彌撒，星期日早上一台彌撒，平日都不知道做甚麼好。早期我跟會長說，不可以這樣，在這裡做不到甚麼，我只是做「花王」。⁶

又過了一年，修會會長跟狄神父說，既然他不喜歡，就調派他到別的堂區，但此時的狄神父竟然拒絕？

我跟會長說，對不起，現在我喜歡。為甚麼？因為當我沒事做的時候，不知道是甚麼原因，有一日德望（學校）的修女來我堂區參與彌撒，便跟修女聊天，聽說有位修女病了，德望中學的，她教聖經科。

當年的校長林修女，Sr. Mary Olga（林玲娟修女），她說：「神父，我有一個問題要問你，你不能說不可以。你要幫我，我的修女病了，我要找教《聖經》的老師。」修女說不能說不可以，那我就答她：「好吧。」因為在聖堂都沒事做。修女說代課兩、三個月，那我就去試一試。

⁶ 即園丁。

怎知，幾好的，因為她們上課是用英文，可以用英文，聖經科的書本是英文的，但可以用中文講課，對我來說是容易一點，覺得幾好，都幾喜歡。後來那位修女三個月後都未康復，要延期差不多半年。

後來會長說：「你说不喜歡這裡，我們便作新的安排，你走吧。」我說：「對不起，不可以，我在教書。」會長說：「這是你的問題，是你決定的，你自己解決吧。」

當時胡振中主教委任狄神父到藍田堂區，他把這個情況告訴主教，主教讓他繼續代課，直到修女回校。自此，狄神父涉足教育界，出任多間天主教學校的校監。

後來發現，原來學校是跟青年接觸的一個好好的環境，而且我們是講福傳的。對我來說，在學校的，不要稱為「工作」，是「服務」。牧民工作，無論如何，是在教堂內的，主要是為教友的，但教育是為大家的。

香港的安排是很特別的，辦學團體可以有校監。既然學校需要校監，這為我一方面是為教會的服務，以及對校長和老師，都是一項服務。校長是學校裡最高的，如果學校團體不理想的話，校長是很寂寞的。教育是很重要的，道德觀的基礎，福音的精神，是教會對香港社會的一大影響，過去與現在都是。

見證社區的拆與建

狄神父在 1977 至 83 年間在藍田聖愛德華堂擔任本堂，至今仍記憶猶新的，是附近山頭的幾場大火。

起初在聖愛德華對面，有一座山，甚麼都沒有的，一個山頂。誰知過了一、兩年之後，整個山都是木屋。有一個主日，開完彌撒，我望著外面，有一群男士站著，望向那座山，即是那木屋區。我覺得很奇怪，為甚麼呢？不知道在做甚麼。

原來那晚有山火，後來聽到其實人們是知道的，他們知道會有山火，他們有些人已經離開。木屋是很簡單的，有甚麼？有個電視機，有個洗衣機。有電的，是偷來的電，其實是偷我們學校那條大電纜。我不知道他們如何做，是駁電，也曾經燒斷過，又因為下大雨浸了水，我們學校也試過有三日停電。

他們其實是黑社會，他們搭蓋木屋賣給人，他們有供電，但都是偷的。那晚全座山都燒了，我見下午人們已經在搬東西，他們知道，是會有山火的。燒完之後，怎樣呢？就再搭，都是黑社會，他們再搭、再賣，是做生意。

我在藍田六、七年，有兩、三次這樣的山火。我們說，都不知道是誰，是黑社會，或者是政府。因為要那些人搬走，要發展，要安排的話很麻煩，即是要登記安排，最簡單就是燒掉，變成難民。那些人很可憐，做不到甚麼，一有山火，因為有風，很快地四周都起火。

來港傳教五十載

2018 年剛好是狄神父在港傳教半世紀的紀念，在這段傳教生涯裡，狄神父覺得生活上最大的改變，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這個城市發展中變得疏離。

由早期的徙置區、七層大廈，然後是公屋，可以隨時出入，沒有人會查問。後來開始有鐵閘，有看更。現在，如果你想去探訪，你要預先去約人，否則會問你去哪裡、幾號門牌。我試過去找一個人，知道同一座有其他的教友，就給他一個地址，去完那裡便去其他地方。他看到，來捉住我，他說：「你說去那裡，為何又去那裡？」現在更嚴，現在不可以了，要登記。

生活的環境變了很多，以前是很開放的，大家都認識的。我們在徙置區的時候，有些小朋友家裡沒有人，去鄰家食飯。但現在不是了，鄰居都不認識了。

以《公教報》強化教會與教友的溝通

—— 駱鏗祥神父

1939 年	出生於香港
1948 年	在聖安多尼堂受洗
1962 年	畢業於新亞書院
1964 年	進聖神修院，哲學畢業後，67 年赴羅馬傳信大學修讀神學
1971 年	晉鐸
1971 年	擔任公教報編輯
1972 至 2011 年	擔任聖母軍督察區團神師
1978 至 2006 年	擔任教友總會指導司鐸



(圖：駱鏗祥神父，攝於 2018 年)

訪問、撰文：陳樂信

駱鏗祥神父出身自聖母軍，在白英奇主教的時代進修院，是被派送羅馬攻讀神學的國籍修生之一。他晉鐸於徐誠斌主教的時代，先後擔任《公教報》編輯、聖母軍神師及教友總會神師等要職，見證香港教區在這兩個時代交接下的重大轉變。

公教家庭中的獨子

出生於 1939 年的駱神父，與父母和兩位姐姐在港島西區成長。這個本來沒有信教的傳統中國家庭，在機緣巧合之下認識天主，全家領洗奉教。

那時候有一位阿姨，在澳門替神父煮食的，她領洗了。她來探我們，介紹我入讀天主教學校「聖類斯」。那時我住近第三街，靠近聖類斯，進去之後，慢慢聽道理，便全家一起領洗了。

（父母）起初是有點不習慣，不過慢慢被薰陶了。天主教在香港都已經有不短的歷史。中國人一直都是拜神、拜灶君之類，時令都是中國的節令，信仰方面就要有一點改變了。

最令父母意想不到的，這成為了兒子日後「出家」修道的引子；始終，傳統父母大都期望兒子擔起照顧家庭的責任。

這都是一個特別之處，家裡有兩個姐姐，我是獨子，其實那時這一關都頗難過。家人看到自己如此大的決心，兩個姐姐又支持，家人就算了，放我一馬。我好感謝兩個姐姐，「你讓細佬去吧，我們照顧家庭」，於是放心一點。

聖召與修道之路

聖類斯學校屬慈幼會，駱神父憶述，當時校內仍有不少會士，而且以傳教士為主；他們說得一口流利廣東話，很懂得跟小孩子溝通，又會派糖哄學生，所以小朋友都很喜歡他們。

在聖類斯已經開始跟著一個神父活動，後來去了新亞（書院），讀完中文大學之後，接著我們有幾個一起生活的，即是李國雄、譚坤，有一位神師帶領我們，Father Szeliga 薛理覺神父¹，所以我們一直培養自己的聖召。

我特別跟譚坤神父都住在西環，剛剛好斜對面，所以我們返聖安多尼堂做聖母軍，開完會就一起走到海傍，來回途上談天說地。在聖神修院又一起，接著去羅馬讀書又一起。

67年，那時可能剛巧香港暴動，時勢又混亂，所以我們幾個哲學和神學生，都去了羅馬那邊讀書。也是一個契機來的，如果不是因為香港發生動亂，都未必一定去羅馬讀書的。

當年香港的左派工會受大陸文革風潮影響，在港發起攻擊殖民政府的暴動，導致社會動盪。有見及此，白英奇主教決定保送聖神修院的修生遠赴羅馬學習，他們亦因此近距離經歷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梵二）為教會帶來的變遷。

讀哲學的時候，已經不用拉丁文，用英文的了。用英文就舒服好多，因為用拉丁文的時候，我們讀哲學時都有用拉丁文，只有死記。

我們去羅馬之前，去羅馬鄰近一個城市，讀意大利文一年，然後便開始在羅馬上課。最初，即是神學第一年，上半年教授還是用拉丁文講的，上到一半，有人「嘈」²，

¹ 薛理覺神父（Thomas Szeliga，1915-2005）出生於波蘭，1941年在香港晉鐸後，主要服務於港澳兩地的慈幼會學校，他在1955-66年間擔任聖安多尼堂助理主任司鐸。參慈幼會中華會省：〈薛理覺神父（Fr. Thomas SZELIGA）安息主懷〉，《鮑思高家庭通訊》，第185期。

² 廣東話，吵鬧的意思。

嘈到他講不到課，最終要用意大利文。所以，教會本地化影響整個歐洲，影響整個教會。

在羅馬接觸到很多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人與物，令思想的改變很大，你會接觸到歐洲的文化、中東的文化。又剛好是大公會議的交接，那個新的思想、思維非常緊要。

修院、中大兩邊跑

駱神父進修院之前，畢業於當時仍位於農圃道的新亞書院，亦曾執教於港島的高主教書院及九龍的新民書院。及後香港中文大學成立，駱神父獲修院准許，同時修讀中大的學位課程；這似乎為他日後的職務埋下伏筆。

我那時在新亞書院讀中文，畢業後才進修院的。那時，中文大學仍未成立，還是新亞、崇基、聯合三間，我們是考統一文憑試的，還不是學位。後來我進修院，一年後中大就成立。

那時我正在讀哲學，於是我跟院長（唐多明神父³）說，希不希望我拿個學位，可能將來有用。院長和副院長都支持，說「回去讀吧」。所以我一邊讀哲學，一邊返中大，去完成學位課程。

所以，我那時跟教授說，我會來上課的，我們只有三個人，但你不要問我書，直到我考完，拿到學位後，你便可以再問我書了。

新亞書院由錢穆創辦，也與其他新儒家學者唐君毅、牟宗三等人組成，富宏揚中國文化的使命。駱神父也有跟這些老師學習，至後來又接

³ 唐多明神父 (Domenico Bazzo, 1906-1998) 屬宗座外方傳教會，1933 年來到香港，在 1963-67 年間擔任聖神修院院長。唐神父 1988 年返回意大利，繼續牧民的工作至 1996 年。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唐多明神父〉：<http://bit.ly/2VFvjlo>。

受西方哲學、神學的培育，兩者為他來說並無衝突。

我們讀書時都有受他們影響。我們讀哲學時，是讀唐君毅的，他本身就是中西方哲學融和的一位特別的學者。中國文化，加入教會的原素，可以使中國文化更加發揚光大。

入主《公教報》

當年駱神父從羅馬返港時，心想有兩項工作不要接手：「第一是千萬不要接《公教報》，覺得好辛苦；第二，我是聖母軍出身，不要做聖母軍。」怎料，在1971年晉鐸的他，最終還是肩負起這兩項工作。

因為我是在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畢業，所以那時徐誠斌主教見我們，分配工作：「譚坤神父就去帶大專，你讀中文，不如就幫手《公教報》吧。」

從駱神父口中得知，《公教報》在徐主教的時代，有幾個相當重要的轉變。

因為他（徐主教）親力親為，印刷廠是他親自建立的。以前我們給「星島」印的，他一來到便設立印刷廠，只印《公教報》。所以徐主教在《公教報》上居功非常偉大。印刷廠在荃灣，後來搬回到堅道的教區中心。

以前一直都是主教做編輯的，有些修女等等只是做副編輯的；直到我開始，以神父的身份做《公教報》，他給我當編輯。除了「社論」要給他過目，就放心讓你做。

幸好有位很有經驗的助手，諸正瑛，她已經做了很多年，很熟悉內部運作，所以她在做助理編輯，真的很好。亦有一位專門翻譯的，翻譯「社論」為英文。這兩樣如此重要的工作，都有專人去負責。

我做之前是很少訪問的，我開始之後就做多點訪問，例如邀請一些教友幫忙，訪問不同的人物，放在《公教報》裡，使透過《公教報》，人與本地教會的溝通更為強化。

駱神父感謝徐主教的信任，把教會辦報的重任交給自己；不過徐主教由始至終，都特別重視「社論」，因為這是代表教會。而駱神父在擔任《公教報》主編的日子裡，較為深刻的，都圍繞教會與社會的關係。

我們跟得很貼的，例如「金禧事件」⁴，是一個好的契機，關心社會的契機，即教會與社會是分不開的，會有很多社論和訪問。其中一篇社論叫〈上主之鞭〉，即是藉著這件事來鞭策教會，行快一點，醒覺一點。

接下聖母軍

從羅馬回來之後，我第一日就見到濟利祿神父⁵，濟利祿神父當時是負責聖母軍的。我回來，他說：「好了，我已經頭又痛，我要回意大利退休了。你在聖母軍長大，我將個『波』⁶交給你了。」

駱神父表示，當時相當不願意，因為他早年在聖安多尼堂參加聖母軍，早知負責聖母軍是很忙碌的工作。

我們未進修院之前，常常跟著濟利祿神父，當時他是聖母軍的總神師，坐他電單車後面跟著去探訪。我們有一次經驗就是，香港仔堂區（聖伯多祿堂），我和譚坤神父二人那時都是聖母軍，是區團的正副團長。我們走去，那時香港仔還未有聖母軍的，我們便去探那位神父。他問：「你們來做甚麼？」

⁴ 「金禧事件」是指 1977 至 1978 年寶血會金禧中學發生的一次學生運動，因教師權益及校方財政混亂引發學潮，轟動全港。金禧中學是天主教教會的學校，故此也牽連香港教區。

⁵ 濟利祿神父 (Cirillo Speziali, 1911-1980) 屬宗座外方傳教會，1938 年來香港。濟神父 1955 年赴愛爾蘭考察聖母軍，及後長期擔任香港聖母軍督察區團神師，致力聖母軍在各堂區的發展。濟神父在 1956-59 年間亦負責教區教理中心，是教理課程的創辦人。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濟利祿神父〉：<http://bit.ly/2lo0QEG>。

⁶ 香港人用「波」來表示責任。

我們說，我們想來幫手發展聖母軍。他捉著我們二人，拖我們走，趕我們走，說「你想小朋友結婚嗎？」即是他覺得，他們堂區尚未成熟至要成立聖母軍，好像你見到個小孩子結婚一樣。怎知幾年之後，那神父調去灣仔，那我們便在香港仔那裡成立聖母軍。

堂區善會每個月才開一次會，開會沒甚麼的，幫忙堂區、賣聖物、收捐獻之類。但如果做聖母軍的話，每星期開會，又要探訪，又要教道理，有很多工作，真的不容易。

六、七十年代，聖母軍只是剛剛開始，所以未有好好的發展。白英奇主教的時候，說：「我希望每一條街，都有一個聖母軍」，他有這樣的理想。所以，當我們開始發展聖母軍的時候，他很支持。

他在大陸被驅逐出境，來到香港，他心想如何可以找到教友團體去幫我們，在教區裡面發展呢？想了很久很久，於是他說：「我揀選聖母軍。」於是找了他們修會的濟利祿神父，主力發展聖母軍。

我便跟著他去探訪，探訪堂區，發展聖母軍。因為他想找個中國人，說廣東話會容易些、好些。所以我們坐他電單車後面，周圍去堂區見本堂神父。所以受他的影響很大，他影響到我對這個團體有歸屬感。

因此，駱神父晉鐸之後，他從濟神父的手中接下了聖母軍，而且一做便四十年。

國籍牧者接撐香港教區的新一頁

香港教區成立以來，主要職務和權力都是由外籍神父負責。直至徐誠斌於 1969 年正式成為首任國籍主教後，他開始讓國籍司鐸擔任教區內的重要職務。

我覺得白英奇主教能夠將自己的主教權柄交給華人，這是很大的智慧。特別那時徐誠斌主教的主要工作，是在公教進行社，他沒有堂區經驗，所以普遍堂區那些中國神父都不太歡迎他，所以他做主教有很大壓力。

自徐誠斌主教開始，大部分主要職務都由國籍神父擔當，他們（傳教士）覺得要支持，以前都是由他們負責最高的職務，但徐主教開始之後，接著將教會本地化，所以要讓更多國籍神父、修士肩負教區工作。

我覺得這個的重要性是非常大。自從白英奇主教放下主教一職，交給徐誠斌，本地教會就開始一直發展，更大的發展。其實外籍神父們犧牲很大，他們不想肩負教區內的一些主要職位——主任司鐸、委員會的主席，他們做副手，讓國籍司鐸去擔任。他們比起我們司鐸更加有經驗和能力，不過他們都覺得，這是教會的大勢所趨。

這是傳教士愛教會、發展本地教會一個很大的表現。



（圖：駱神父（中）向為他慶祝八十大壽的教友們祝酒。

圖片來源：聖方濟堂·攝於 2019 年 3 月 30 日）

於葵芳挨戶尋找及探訪教友的開荒者

—— 萬籟寂神父

(Fr. Mario Marazzi, PIME)

- | | |
|--------|------------------------------|
| 1928 年 | 出生於意大利 |
| 1960 年 | 晉鐸，初來香港，在長洲學習廣東話 |
| 1963 年 | 任公教進行社副社長，後升任社長 |
| 1971 年 | 任聖老楞佐堂助理主任司鐸 |
| 1972 年 | 調任荃灣葛達二聖堂主任司鐸 |
| 1975 年 | 同時負責葵芳守運樓彌撒中心工作 |
| 1978 年 | 任宗座外方傳教會香港區會長 |
| 1980 年 | 返回意大利為修會服務 |
| 1999 年 | 重返香港，任馬鞍山聖方濟堂助理主任司鐸 |
| 2003 年 | 移居廣州，入住「慧靈」家舍，與智障人士一起生活 |
| 2013 年 | 於香港宗座外方傳教會 (PIME House) 退休 |



(圖：萬籟寂神父，攝於 2018 年)

訪問：陳樂信、黃奕清

撰文：黃奕清

1960年，幾位宗座外方傳教會會士從意大利漂洋過海，來到亞洲，各自在不同地區開展漫長的傳教旅程；當中的一位，正是接受派遣，前來香港的萬籟寂神父。

我是坐船來香港的。原本可以乘飛機，但同行當中有我們的會士，有些要去印度，有些前來香港，大家都攜帶了許多行李，於是我們決定一起坐船。我的家鄉有一間製造電單車工廠，鄉下的教友送了一輛給我。那電單車在香港是獨一無二的，要換零件就困難了。但我覺得，他們熱誠地送給我，我會帶去香港。輪船在海上航行了四個星期左右才到達香港。

那艘大洋船，先後停泊在巴基斯坦的 Karachi（卡拉奇）、印度的 Mumbai（孟買）、斯里蘭卡的 Colombo（科倫坡）和星加坡，最後是香港。那天深夜時分，船已抵達香港，大家仍在熟睡中；清晨醒來，船停泊在海港裡，我看見這美麗在香港，實在漂亮得令人讚嘆！

原來萬神父有位親戚和另一位同鄉神父，都是傳教士，他們早已來到香港。因此，萬神父對傳教工作，以及對中國，尤其是香港，早已有初步的認識。

那兩位傳教士，賴神父¹和毅神父²，在香港傳教時，

¹ 賴法禹神父（Ambrogio Poletti，1905-1973）屬宗座外方傳教會，1930年來港，前期主要在廣東省惠州傳教，後期服務於新界東北地區。賴神父自1950年起，在粉嶺拓展新堂區，興建聖若瑟堂；期間他在羅湖邊境迎接被中國政府驅逐的傳教士，因而有「中國門衛」的號稱，更獲意大利政府於1956年頒授意國騎士章。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賴法禹神父〉：<http://bit.ly/2Kw7P13>；「粉嶺聖若瑟堂」網頁：<https://fanling.catholic.org.hk>。

² 毅祿師神父（Riccardo Brookes，1892-1980）屬宗座外方傳教會，於1921來港，早年出任新界西區主任司鐸，被稱為「元朗區傳教的先鋒」。毅神父服務過鄉郊及城市社區，擔任過香港教區秘書長及副主教等要職，亦曾任監獄神師和麻風病團體神師。參柯毅霖：《從米蘭到香港：150年傳教使命》（香港：良友之聲出版社，2008），頁138。

某年回鄉度假，那時，我仍未入修院，趁機會聽他們給我講述傳教的工作。他們返港後，我寫信給他們，彼此保持聯繫。此外，意大利也有些雜誌，刊載有關傳教士的工作。因此，我對傳教工作，尤其是對香港，能有一點兒認識，聖召的小小種子就從那時候開始了。

第一站：長洲

地方語言是很重要的，它好像一根鎖匙，進入人的心中，幫助我們認識所接觸的人。傳教士為人服務，我相信講得愈好、愈流利，並懂得欣賞他們的語言，那是對他們的尊重，亦可以更接近他們。

跟大多數傳教士一樣，萬神父很重視地方語言的學習和運用。在香港提供廣東話教授的「新雅中國語文研習所」1963年才於新亞書院成立，那麼，早年來港的傳教士們，是如何學習廣東話的呢？

早年在長洲有間屋，叫「上智之座學院」³，我們五位新來的神父在那裡學習語言。教授語言的，一位是本地的中文老師，另一位是懂得說廣東話的宗座外方傳教會神父。他們兩位和我們一起生活，我們除了在課堂正式學習語言，也有機會在日常生活中彼此交談和分享，練習和實踐所學的廣東話。這方法不錯！幫助我們慢慢地去掌握。

奇怪的是：人們總以為外方人一定懂得說流利的英語！其實，我們那時只認識一點點。於是，我們同時要學習中文和英文，太艱辛了！我們發現兩種語言一起學，不

³ 「上智之座學院」，英文是 House of Study，成立於 1954 年，開辦十年，為新抵港傳教士提供中文和英文的學習；該址現為明愛愛暉營。參柯毅霖：《從米蘭到香港：150 年傳教使命》（香港：良友之聲出版社，2008），頁 181。

是很好的方法。其後，多數受派遣來港的傳教士，會首先前去美國或英國，以一年時間學習英語，然後才來香港，集中精神學中文。

跟語言同樣重要的，是適應生活，也就是生活本地化。學會運用語言是不夠的，一定要慢慢去適應當地的環境、風俗和習慣，inculturation。

在長洲，我們有機會好好的去練習廣東話：山下的聖堂，有許多小朋友，我們可以前去和他們交談；也可嘗試到街市去買點東西。簡單的用語，是練習語言的好機會。我們大多經歷過這樣的情況，覺得語言進步的成效不錯。

下一站：公教進行社

在長洲生活了一年半之後，萬神父獲安排到堂區服務。1963年5月，主教又調派他到公教進行社。萬神父坦言，這是一項「挑戰」，但他感恩在那段時期，遇上好幾位國籍神父，包括後來升任主教的徐誠斌神父。

來到香港起初三年，主要是讀書，也在聖堂做些牧民工作；但在公教進行社的工作是截然不同的，我做副社長，後來升做社長。作為一位神父，一位外國人，我要負責管理四十多位職員，真的很不習慣；要做他們的上司，是個很大的挑戰！

幸好，那時徐誠斌神父在公教進行社工作，他是我要好的朋友，他很支持我的工作。另外，有兩位國籍神父，也和我一起工作，一位是尹雅白神父，他負責編輯《公教報》，另一位是李國雄神父，負責真理學會，出版書籍。

在公教進行社工作八年的日子裡，我一直得到神父們的合作，這使我感到一份支持和喜悅。

我可以用廣東話和英文與別人交談，但範圍只限於書本和關於聖物之類。我的英文漸漸有進步，因為有機會接觸外國人。此外，主日多數會去赤柱監獄探訪囚友，為他們舉行彌撒。

這期間，萬神父見證了香港教區的一件大事，就是白英奇主教的離職和首位華人主教的出現。

白英奇主教於1969年辭職。因為他覺得香港教會成熟了，是時候把教會交給本地的神父和教友去管理。我仍記得，徐誠斌主教請他留在香港，但他沒有答允，因為他怕會阻礙新任主教的工作。我們宗座外方傳教會會士們都為此事高興，因為我們覺得這情況就好像一位爸爸，一位媽媽，看著自己的兒女長大了，離開自己的家庭去結婚，父母當然感到歡喜，因為子女們成長了，要走自己的路。

還未到香港之前，我以為傳教的工作主要由 PIME 會士去做，不太清楚也有其他人致力於傳教工作。到了香港，我發覺已有許多人正在做傳教的工作，如外方傳教會——瑪利諾會、聖母聖心會、巴黎外方傳教會；男女修會，如耶穌會、慈幼會、嘉諾撒會、母佑會等等。

還有，當時香港的教友已經成熟，很多教友已懂得傳教的責任；除了外籍傳教士，本地神父、修女和平信徒已致力於傳教的工作。

中轉站：聖老楞佐堂

萬神父有感於公教進行社工作，很少機會練習廣東話，說話內容的範圍亦相當狹窄，語言表達難有突破，遂主動要求徐誠斌主教把他調派到堂區服務。於是，萬神父在 1971 年被派往長沙灣聖老楞佐堂，出任副本堂。

以前很少機會接觸外面的人，沒有機會去探訪教友，更不會跟別人吃飯，這是第一次在堂區裡跟教友和非教友來往，接觸他們。

我在聖老楞佐堂待了不久，有一天會長通知我，我的媽媽由於意外去世了。那天，她在行人路上走，有一位青年早上趕上班，所駕的電單車把她撞倒了。當時，會長只告訴我：媽媽已經過世。

我仍記得：當天早上得知這件事，而下午我要往長沙灣墳場去主持喪禮。死者是一位母親，在場只有她的丈夫和兩、三位小朋友。我主持喪禮的時候，把這位剛去世的母親看作是我的媽媽。那時，我覺得這位男士很可憐，他沒有親友的陪伴。我沒法回意大利去主持媽媽的喪禮，因此，我以一份對媽媽的愛去舉行這次喪禮。那時刻，我感到這個家庭就好像是我的家庭，他們的痛苦，也是我的痛苦。

下一站：守運樓

萬神父在聖老楞佐堂服務了大概只有一年，便調往粉嶺堂區，然後在 1972 年年底，又調派到荃灣葛達二聖堂去。適逢荃灣區在六十年代初已被政府規劃為香港首個發展的新市鎮，多個新社區在七十年代陸續形成。

在荃灣堂區，我作為主任司鐸，有幾位神父和我一起
做牧民工作。有一天，我和副本堂劉玉亭神父⁴商議：
「你做本堂神父，我做副本堂神父。」他考慮了一會才答
允，主教也願意我們互調職務。

那時，一些新的社區——葵興、葵盛、葵芳，於1973
年至1975年陸續入伙，我和劉神父一起去見主教，跟主教
談這區的發展。及後教區在葵芳一幢私人樓宇（守運樓）
買了一個單位，讓我和周偉文修士⁵一起住。就這樣，我
們在那裡開始了一個新的彌撒中心，為堂區內的居民服
務。

在葵盛，母佑會開辦一所「蕭明中學」，修女願意讓
我們每主日在學校禮堂為教友舉行彌撒。我們開始認識教
友，給他們登記戶籍，漸漸組成一個團體。

為了找到新入伙的教友，我們這樣做：當我們知道某
座大廈差不多全部入伙後，我們幾位神父和教友，開始由
最上層的二十樓，走到最下層，逐家逐戶敲門問：「請問
有無教友？有沒有天主教的呢？」如果沒有，屋裡的人就
立即回答「無」；如果有，他們可能回答說：「咩？乜
嘢？」⁶看到他們沒有立即回答，我們知道可能會有天主
教徒。我明白他們小心翼翼的原因，是由於他們不太喜歡
鄰居知道自己的事，想保護自己的私隱。我們站在門外和

⁴ 劉玉亭神父（1927-2010）出生於河北，1949年來來香港，生前大部分時間在荃灣及葵青的堂區服務。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劉玉亭神父〉：
<https://bit.ly/2IxLQF9>。

⁵ 周偉文神父（Renzo Milanese）屬宗座外方傳教會，1946年於意大利出生，1972
年來港服務至今。

⁶ 廣東話，即「甚麼？甚麼事？」

他們傾談，叫他們不用開門，只寫下門牌號碼和姓甚麼，改天神父會去探訪。

那時用這個方法去接觸教友是最成功、最容易的。有些年青人幫手，和兩位神父一起去，做初步接觸教友的工作。那時這樣挨戶探訪是沒有人阻撓的。我們多數在晚上出訪，因為晚上比較多人留在家中。

除了知道居民當中有沒有天主教徒和宗教方面的情況，也可以知道當中有沒有人遇到困難。他們中有些是病人，有些是殘疾的，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去接觸、去幫助他們，並找方法去解決他們遇到的問題。



(圖：萬神父仍保存的天主教手冊，顯示他在荃灣葛達二聖堂服務)

這就是葵芳聖斯德望堂的前傳。到了 1980 年，聖堂建築竣工，守運樓彌撒中心的歷史任務亦告完成。而在荃灣的這段日子，大約 1974 至 78 年間，萬神父更參與過由天主教、救世軍、聖公會、循道衛理和中華基督教會幾個教會一起推動的社區發展工作。

我們五個教會的牧者和教友在大窩口一起策劃一個社區發展項目，得到一筆款項後，請了一位社工做負責人。

雖然我們來自不同的教會，但在社會服務方面，大家可以走在一起，彼此有個共同目標：幫助人去改善環境，令大窩口居民可以有意識地合作做點事，使生活環境更好。漸漸地，大家都樂意去做這些工作，不用給予酬勞，只需提醒他們在自己的社區發展中，要有承擔，這是在大窩口邨同心合意去做的事。

這是一個好好的合一經驗。合一運動有幾種，有神學的合一運動，即是由專家討論神學的問題；有祈禱的合一運動，那是屬於不同教會的教友，聚在一起祈禱。我們做的，是生活的合一運動 Life Ecumenism。

藉著對社區發展的關懷，我們有機會跟其他牧師和其他教會的教友彼此認識。我們五位神父和牧師每個星期一次，在某地方飲茶、聊天和討論。我們曾在合一祈禱周交換講道，我去了中華基督教會，而該教會的牧師則前來我們的聖堂講道。有時候，我們和教友們聚會，談大窩口的社區發展，鼓勵天主教的教友跟基督教的兄弟姐妹接觸，做朋友。

一個中西薈萃的經驗

回顧在香港二十年的傳教生活，萬神父體驗到香港教會已有相當成熟的文化融合，他看到教區內有很多外籍神父和修女在不同層面上跟本地人合作，認為這對香港社會來說，是一個好榜樣。

神父們在堂區裡，無論主任司鐸是中國人或意大利人，與不同國籍的神父一起生活，是一個好的機會一起合

作，服務堂區。大家對屬於不同國籍的人沒有半點歧視，整體來說，我覺得很好。

我在 PIME 做了兩年區會長，對於教區事務，我曾參加人事小組的會議，主教及小組的幾位神父，要決定調派誰服務堂區時，人事小組無所謂，只要誰人適合就派誰去做。整體來說，是很開放的。

對於我們外籍神父，教友們的態度同樣開放。教友們不分國籍，只要神父是個好神父，他們都會歡迎他。教友們見到我們盡力學習語言，以及慢慢去適應本地的風俗和習慣，他們都樂意接受我們的有限、錯誤或缺點。

一個未結束的旅程

萬神父於 1978 年離開葵芳，回到宗座外方傳教會在清水灣的會院 PIME House 當區會長，然後於 1980 年返回意大利總會工作，一去十八年。當再次重臨他傳教的地方時，萬神父欣見「香港社會和教會都改變了，改善了。」

從萬神父的言談間，處處感受到他與香港人之間，累積了一份濃厚的感情。他分享道，當傳教士，首先要愛那個民族、那些人，即是要做朋友。他同時感受到香港人對傳教士的歡迎和接受，心存感恩。

雖然我們有限，很多東西都不太了解，這是真的；但本地人對我們很好，又得到主教、神父、修女和教友們的支持和幫助，為此，我很感恩。

萬神父 2013 年退休了，他選擇繼續留在香港居住。

本來我可以返回意大利退休，在那裡，與年紀大和患病的會士一起，入住一間本會的安老院。但我想繼續留在香港，不是因為這裡的居住環境比意大利好，其實無論住

在香港或返回意大利，為我都是一樣的。但我認為：我曾被派遣來香港傳揚福音，為本地教會服務，所以我會留在這裡，直到永久是有意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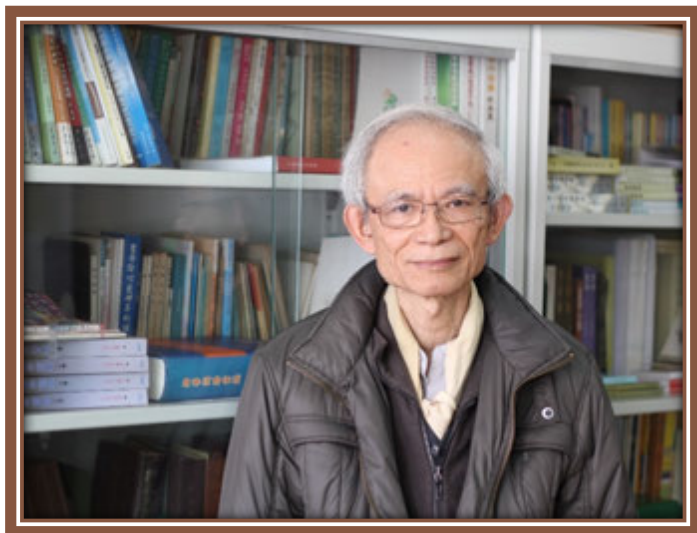
我雖然退休了，但還可以出外做一點牧民和傳教的工作，而且在我的修院裡，也可以為團體做點服務。現在，我有多些時間去祈禱、看書和寫信，跟朋友保持聯繫。即使我的身體有時欠佳，不容許我常這樣做，但我仍然可以為香港和中國的教會，尤其是為那些曾經幫助我的人，或有需要的人祈禱。

當白英奇主教完成他做香港主教的職務之後，他對香港的教友說：「親愛的朋友，我若有甚麼地方使你們失望，請你們原諒；若有甚麼地方做得對，則請你們感謝天主。我時常是你們的僕人和朋友，一位祝福你們，並為你們祈禱的長者。」白英奇主教以上所說的話，也是我要說的話。

在文字中履行牧職

—— 李國雄神父

- | | |
|--------|-----------------------|
| 1937 年 | 出生 |
| 1959 年 | 畢業於羅富國師範學院 |
| 1964 年 | 進入聖神修院 |
| 1969 年 | 晉鐸 |
| 1971 年 | 赴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深造宗教倫理神學碩士 |
| 1973 年 | 任香港仔聖伯多祿堂助理司鐸 |
| 1974 年 | 任公教真理學會主編（至 2015 年） |
| 1976 年 | 任聖母軍區團神師 |



（圖：李國雄神父，攝於 2014 年）

訪問：黃懿縈
撰文：陳樂信

最早在香港出現的天主教出版及印刷機構，是巴黎外方傳教會創辦的「納匝肋印書館」，始於 1885 年，為該會在亞洲地區的傳教工作，編印不同語文的宗教書籍。¹ 隨著教會在香港的發展及因應培育本地教友的需要，「公教真理學會」在 1934 年誕生，成為香港教區轄下的出版社。

李國雄神父在 1969 年晉鐸後，便獲徐誠斌主教派到公教真理學會。他擔當主編四十年間，為教義內容和出版路向把關的同時，見證閱讀風氣的轉變。李神父本身愛好閱讀，他應《公教報》主編之邀，在八十年代每周撰寫專欄，內容融合天主教靈修與中國文化。他也出版了八本小型書籍，有的結集聖母軍的「神師訓話」，有的是為海外華人教友撰文，透過文字為教友的信仰生活提供滋養。

信佛家庭裡的天主教修道人

李神父自小學二年級起在天主教學校接受教育，慈幼會的校園是其信仰成長的重要場所。即使沒有家人的鼓勵，亦明白家人對自己的期望，但他還是在中三領洗入教，而且中五時已有加入修會的念頭。

那時正在打仗，日本佔領香港期間，我住在中環，入讀現在的聖心學校，當時叫「培貞」²，收男生至四年班，我讀二年班。戰後和平，我家搬到西環、西營盤那邊，便入讀聖類斯學校，由三年班讀到中學畢業，與慈幼會的神父一起相處，受他們教導。

¹ 田英傑編著、游麗清譯：〈納匝肋印書館（1885 年）〉，《香港天主教掌故》（香港：聖神研究中心，1983），頁 138-142。

² 培貞學校是由來自意大利的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在 1860 年創辦的中文學校，只招收中國籍兒童入讀，後來由於需要投宿的貧苦女孩人數太多，改建為孤兒院學校。培貞於 1937 年與修會在同年開辦的英、葡文學校合併，定名「嘉諾撒聖心學校」。參夏其龍、譚永亮編：《香港天主教修會及傳教會歷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1），頁 92、95；嘉諾撒聖心學校（私立部）網頁。

在那裡慢慢地，自然地受吸引，中一時已經很接受天主教信仰，但家裡是傳統信佛的，因而覺得未有機會。中三時試探家人，說去學道理，他們是無可、無不可的樣子。我用辯論式的方法跟他們說：「既然讓我入天主教學校讀書，我想學道理，你讓我去嗎？」他們看作我去上課，但我學的道理班是為預備領洗的，兩個星期之後便領洗回來。他們問為甚麼這麼快，我說：「已經學了很久，既然你同意我學道理，自然的結果便是領洗。」於是家人也接受了。

讀到中五，神父來到我家，叫我家人讓我加入慈幼會，但家人不肯，要我出來工作幫補家計，而且覺得我很消極：為何要去做神父呢？

既然不許，那我便想繼續讀書，即使家境不是很好，家人也讓我讀中六。那時因為拿到政府的津貼，所以經濟問題也放緩了，可以讀完中七，當時稱為 upper sixth。³

我由聖類斯轉到英皇書院，完成預科，考到香港大學的理科。我理科並不強，卻讓我考入了，即是勉強考入。正因為只是僅僅入到，所以成績不太好，我嘗試過向政府申請津貼，但申請不到，家裡又沒甚麼能力，結果轉讀羅富國師範學院。兩年後畢業出來教書，薪水大部分都給了家裡。

李神父 1959 年在師範學院畢業，執教至 1964 年。當年他雖然明知家境依然不好，但判斷家人能夠應付，遂下定決心進修院去。

³ 按英國學制，中學教育的最高級是「第六學級 (Sixth Form)」，第六學級為期兩年，分「較低 (lower)」與「較高 (upper)」兩個階段。

我想到，如果我再不入修院，可能慢慢便心淡，因為相隔上次表明去意已差不多八、九年了。我覺得需要自己決定自己的事，當時我也二十多歲，雖然未足三十歲。家裡是會比較艱難的，但我覺得他們應付得來，所以便決定入修院。

修院的生活，當時是比較單純的，你肯讀書，肯祈禱，便符合他們的期望。因為我打過工，教書時也拿了個學位，覺得可以減兩年。那時我算年紀大的了，通常二十多歲升神父，但我讀完都過三十了，所以他（院長）不想拖延得太久。

投入出版的工作

在李神父的記憶中，當時的修院生活跟他想像的一樣，主要是祈禱和讀書，後期做一點牧民工作。他 1969 年晉鐸，主教所作的安排，卻是他意料之外的。

我本來想到，我有教書的背景，又有學位，打算在修院幫忙管理中學，但當時的主教叫我來公教真理學會，是出版書籍的一個部門。我沒有做過出版的工作，技術方面有同事處理，我主要看教義，以及選擇出版路向，符合教區要求。開始的時候，當時教會比較單純，總之你是神父，用心做，人們都不會太批評的，通常都覺得可以接受。

兩年後，我覺得自己有需要的神學的基礎方面多下工夫，因為出版的外文書籍，很多時程度是較高的，所以要理解多點，而且神學真正所涉及的內容是相當深刻的，因此我要求主教讓我去深造，接觸一下歐洲的學術環境。

於是，我去了比利時魯汶讀了兩年神學，拿到了碩士。學的不算很多，但回來看書時比較能理解作者的背景，以及甚麼的路向要看甚麼的書，比以前方便得多。

這工作主要是語文方面有很大的挑戰和考驗。我們翻譯書籍，如果由英譯中，簡單一點；但有些英文是譯自另一種外文，那就複雜一點。有時心大心細，雖然請了人翻譯，但覺得有地方不對勁，便要多問一些人。由於語文的關係，有時很難把握到文字真正的意思，那就難一點。

雖然我也讀過拉丁文，略懂法文與德文，但並不深入，因為不是常用的文字，碰上了這些英譯便較複雜，有時單是想原意是否準確翻譯出，自己都覺得頗具挑戰性、頗辛苦。幸好，在教區中心時常有以英語為母語的神父，他們幫了我們很大忙。

時代變遷下的教會出版

李神父身歷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前後；他提到梵二之前已經有不少中文的靈修書籍出版，在大公會議提倡本地化的氣氛下，便需要更多禮儀方面的中文翻譯。

初期很忙碌，每星期要印禮儀單張。因為是新的工作，所以工作的時間要求比較長，我所有時間都差不多全放在出版的工作上。

初期，禮儀方面我們是配合印刷，翻譯書籍主要都是靈修性和教義性的，後期多些聖經方面的知識。我們不是出版專業性的書籍，會出一些比較普及性的聖經知識，或者基於聖經的靈修書籍。

七零年代時，我們出版的靈修書很暢銷，可以印二、三千本。教理書都有很多人參考，例如《合一教理》，其實是相當深奧的，原文是德文，我們用英文本翻譯，都可以賣得二、三千本。漸漸地，靈修書的印量減少了，慢慢由三千變二千，再減到一千。一千這個數字是最基本的，因為若連一千本都印不到，便拿不到翻譯權，而且印刷也不划算。因此，由這個數字可見閱讀的趨勢，以書本形式的閱讀是減少了很多。

現在要出書不是不能，不過要有些特別吸引人的地方，或是有基本需要的。例如《天主教教理》，是一定要出的，雖然在網上也可以閱讀，但為有些經常要查看的人來說，可能一本實體書是比較方便。《香港天主教手冊》是要做的，是我們教會的教區資料；《教友禮儀記事手冊》雖然可以是不需要的，但有些人仍然傾向有一本，手冊裡有些是教友基本要知道的東西，一本齊全的書便很方便。現在有由幼稚園到中三基本的宗教教材，由教理、教育委員會編寫，我們都一樣是負責印刷。

在剩下來的時間，我們出版過小型書籍：有關祈禱的；有些介紹特別人物的精神，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教宗本篤十六世、德蘭修女等；有些特別的修會人物，如米蘭會、耶穌小姊妹等，這切合修會的需要。因此，我們都仍然可以做這些工作。至於純粹談靈修的書籍，合適而又有銷路的，真是比較難選擇。

其實在教區不單只有我們的（這出版的單位），還有幾個修會，及其他單位，甚至教友組織，他們很多都有做出版工作。香港這樣一個城市，中文書籍已經不是容易推

銷的，教會信仰文字的閱眾更狹窄。所以，有這麼多單位在做，我們實在不能全方位去做，我們只能找合適我們的，而我們人手又應付到的才去做。

李神父認為教友成立自辦的出版社或書店等是相當好的，有多些人便有多些的角度。況且，教友的知識水平已日漸提高，有不少教友讀過神學，可視之為一種實力。

藉文字滋養人靈

李神父在比利時讀書的頭一年，開始撰寫文章，不過第二年感得太辛苦便停了。至八十年代中，他得到夏其龍神父的邀請，為《公教報》寫專欄，開始恆常地寫作。

進修回來後，很多時會去修會主持大、小避靜，看書多了，講話多了。我一直都有閱讀的習慣，早期較多看中國文化的書，後來較少。也有看其他參考書和期刊，關於《聖經》、靈修和教義的，我一直都有參考閱讀，間中有些書需要精讀，由頭看到尾，慢慢思考。

後來夏神父做了《公教報》總編輯，他說：「你有機會接觸這麼多書本，你又喜歡中國文學，為甚麼不寫點東西呢？」他挑戰我，說每星期給我一個專欄。在兩年裡，我寫了差不多一百篇，當時覺得這是我所能貢獻的，那之後就沒有再寫《公教報》專欄了。

在 1985 至 87 年間，李神父先後以「如九曲」和「靈修漫談」的專欄名稱撰文，後來由於與美國的李定豪神父相熟，開始為三藩市以及美國其他地區的華人教友寫文章。《公教報》的專欄文章後來結集成書，接著李神父陸續出版一些口袋大小的書本，方便人們乘車時也可以拿著閱讀。

其中有一本書，成書因緣是因為我每個星期都與聖母軍開會，會預備一篇短短的神師訓話。每隔一段時間便拿回口述筆錄的神師訓話，間中寫得比較好、比較工整的，我會拿來看看是否表達出原來的意思，以及文字上有沒有要補漏的地方，之後便去結集。這樣由那兩年內大概選二十篇認為較有意思的，輯錄成一本靈修性的書，是短短的講話。

以後的，我多數寫長的文章，寫去美國的，刊於三藩市的華人通訊裡，一年大概四至五篇，兩年便可以輯錄十篇，加起來有幾萬字。另外再挑出二十篇左右的每周講話，加起來大概有一百頁的小冊。這樣便出版了幾本這些書，至2013年，大概兩年一本，加起來約有七、八冊。

除了公教真理學會的工作，李神父也常應堂區或修會的邀請，去帶避靜或主持講座，從事一些直接與人接觸的牧民工作。回顧達半個世紀的鐸職生涯，李神父自覺與一般在堂區從事牧民的神父並無兩樣。

回到堂區都是一樣的，只是堂區神父在主位，我們做配合。若我們講的道理適合教友，他們也很喜歡叫我去堂區，協助他們開彌撒。其實大家在意識上並沒大分別，只不過我們把更多時間放在文字之上。

胡樞機年代的堂區領袖

—— 沈禮訓

- 1947 年 出生於香港
1973 年 領洗於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
1991 年 任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首屆堂區牧民議會會長
1995 年 獲委任為教區教友培育委員會委員
2013 年 退休



(圖：沈禮訓先生，攝於 2018 年)

訪問、撰文：黃奕清

沈禮訓成長於沒有宗教信仰的家庭，踏入職場後才認識信仰和皈依。他在領洗後有一段時間，純粹是「主日教友」，直至定居大埔才開始活躍於堂區。他積極投入堂區事務之時，適逢胡振中樞機發表《邁向光輝的十年》牧函，從教友的角度，見證教會發展的一個重要時代。

當年沈先生甚至選擇辭去工作，經營小生意，好讓自己騰出更多的時間為堂區服務，期間亦不斷為著信仰成長及教友職務而持續進修。在沈先生的言談間，感覺堂區就是他的第二個家，他不但關心當中的人和事，更深入思考這個「家」的發展。

拜神家庭中的天主教徒

我自己本身家裡不是公教家庭，傳統拜神的。我是出來工作之後，有同事介紹了一本書給我，就是《中華殉道諸聖》的一本小書。當時看完之後感覺到很觸動，想到為何他們這一群人，會有如此大的勇氣呢？被它吸引了。後來朋友給我看另外一本書，一下子忘記那本是甚麼書了，但同時對天主教加深了認識。然後，他問我有沒有興趣進一步認識天主教會。我說「好」。

那時我在香港那邊住，在主教座堂那邊慕道。那時明愛大廈都未蓋起來，我們坐在主教座堂旁邊的公園，那範圍是主教座堂的，是一個公園，裡面有些鼓凳給人坐的。當時給我慕道的，是曾慶霖神父。¹

當時有幾個人一起，五、六個人左右。慕道完，我1973年在主教座堂領洗，是徐誠斌主教幫我領洗。領洗之

¹ 曾慶霖神父（1934-1991）在廣東出生，1962年在香港晉鐸，1964-81年間先後任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助理司鐸及主任司鐸，自1985年開始擔任新界區主教代表，直至逝世。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曾慶霖神父〉：<https://bit.ly/2VSWA3M>。

後，我沒參加教會的活動，純粹領洗，不過都一直保持跟曾神父聯絡。

沈先生的父母對於他的宗教信仰相當開放，但由於他們與很多教外人一樣，也有跟從一些習俗，當中難免有點顧慮。

例如，我媽媽過身的時候，都是做傳統的儀式，為他們來說，當中有甚麼意義，他們都不大知道，別人說怎樣做就怎樣做。他們說：「你是長子，阿媽過身，擔幡買水²的工作，是你做的。」當時為我來說很掙扎，我怎可以這樣做呢？

然後，我去找曾神父討論這個問題。他說：「當中有些事，如果有其他人幫忙做，就給其他人幫忙做。如果真的沒有，需要你去做，沒關係的，你照做，你是為家庭去做，並不是相信，便沒有問題。你做完之後，回來辦一次妥善的告解，就妥當了。」

為我來說這是一個好大的鼓勵。這個概念，到我後期在慕道班，我去面對慕道者談論這些問題的時候，我都是用同一的態度，是相當好的。

梵二後的新舊交匯

六十年代中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梵二），為普世教會帶來翻天覆地的革新。沈先生領洗於梵二之後，除了禮儀本地化，他印象更深的，是福傳方式及平信徒參與上的轉變。

² 「擔幡買水」是道教葬禮儀式，古時孝子在河流旁放下買路錢，領水回家為亡者淋浴更衣。現今形式上由長子手執代表亡父或亡母靈魂的白幡「買水」，然後用買回來的水沾濕毛巾，在亡者臉上輕掃三遍，喻意洗淨靈魂，早登仙境。

73年那時，剛好是梵二改革之後，在教會內，有些東西有新有舊。新的東西，不是很多人認識，但亦方便了，因為是中文彌撒，本地化。但是相對很多習慣了舊一套的，他又覺得舊的好，即是在那段時間有點矛盾。

在那段時間，我們算是新，反而舊的，我們不熟，但是很多祭台都是舊的，未改的。在禮儀方面，其實轉變相當大，到今時今日，分別是更大。

在梵二改革之前，特別在福傳方面，好集中在牧職，神父或者修女，在那時教友的參與性不是太高，傳道員的數量本身不多。

修會的傳道方式，跟神父又會很不同。我們覺得神父傳道，神父 nice（親切）好多，修女可能有修會背景，會是嚴肅的，「揸得好緊」³的，即使是禮儀改革、梵二之後，她們有一些方式和習慣，都未改過來。因為改革，無論教會與牧職，他們都要學習，所以很多是未曾改過來。

我小時候，家住一層樓，我們有分租給其他人，好像《七十二家房客》⁴，當然沒那麼多。其中有一房是天主教徒，他們全家都是教友。那段時間，是五幾年，很多時有修女去探他們，所以我那時已經有初步的接觸，但不認識。給我的印象是，「不可以拜神的」、「不可以有神主牌的」、「那些要丟掉的」，即是她們會用這樣的表達。

我相信，那時候的天主教徒，都是在接受這些，但是為一些外教徒，他們不知道，不明白，為何連祖先都要丟

³ 廣東話，形容對原則的把持。

⁴ 1973年的一部電影，講述一幢舊式唐樓裡住著的七十二戶人家，反映當時小市民的生活。

棄，當時我小時候是有這樣的想法。到後來，我領洗之後，斷斷續續都聽到一些人會說，修女說不可以的，那些拜神的東西一定要丟掉。其後，慢慢做法一直在改，那可能是修會本身的培育，已經做了很多功夫，所以有所轉變。

植根大埔堂區

領洗後，沈先生甚少參與教會活動，加上搬了好幾次家，對堂區亦不熟悉。直到 1984 年，他搬到大埔，才從此植根：「特別是信仰的植根，在大埔。」

那時大埔區開始發展，所以很多的屋邨成立，多了很多人搬來，聖母軍、修女、神父都會去做家訪。當時我被聖母軍的一位姊妹，大家都是街坊，都住在宏福苑，被她「執返」⁵。她說：「返聖堂參加服務吧。」

那時我一直在基督教青年會 (YMCA) 做義工，工作相當忙，及至我在青年會服務了廿五年，拿了廿五年的「老人牌」⁶ 之後便結束了。我返回大埔，開始參與堂區的服務，最簡單的開始，就是服務組，幫忙做點工作。後來堂區的發展，特別在 1989 年左右。因為胡振中樞機 1989 年五旬節頒布了《邁向光輝的十年》牧函。

邁向光輝的十年·煥然一新的年代

胡振中樞機，我是屬於他的那個年代，因為自己參與了堂區的服務，同時亦留意到教會內的工作。

⁵ 帶回教會的意思。

⁶ 長期服務的紀念品。

給我最深刻印象的，是剛才所說的《邁向光輝的十年》，胡樞機為教會定下七個大方向去發展。當時我覺得，實在是煥然一新。那七個範疇，為我們教會是照顧到好多方面，在那些範疇內各司己職，我覺得是很全面。

《邁向光輝的十年》論及香港教區未來的牧民承擔，定下十年的工作方向和目標。牧函所論及的七個牧民及傳福音範疇是：

1. 教友培育
2. 信仰小團體
3. 司鐸、修士與修女的持續培育
4. 大眾傳播
5. 教育
6. 社會事務
7. 教區與中國及與中國教會的關係

教區於 1994 年進行檢討，翌年發表題為「傳揚福音，拓展天國」的中期報告及計劃書，總結五年實踐經驗之同時，勾勒另一個五年的宏觀路向。

在那段時間，我們在堂區發展基基團⁷，發展關社組，關社組應該是 90、91 年左右，基基團就早一點點。及至堂區議會開始成立，之前是沒有的，只是有一些教友的組織，跟神父大家做交流，未有正式的議會。

在那時，堂區如果沒有牧民議會，就是由牧職團管理。我個人覺得，在那時，胡樞機都看到，聖職人員開始老化，人數也少，所以希望能夠有多一點教友參與多一點

⁷ 基層基督徒團體的簡稱。香港天主教會亦稱它為「信仰小團體」，是教會最基層的組織，可在家庭層次或在相似的局限場所，相聚在一起祈禱、閱讀《聖經》、學習教理、討論人和教會的問題等。他們保持與堂區團體的結合，成為基督徒生活的酵母，照顧貧窮者和被忽視者，並致力於社會的改變。

職務。正如他提及牧職人員在堂區裡，要重點放在牧民工作，意思是，其他的行政工作容許教友去承擔職務。方向是這樣。另一方面，教友本身的條件和他所接受的培育，是否能夠承擔，以及是否正確地走那條路，這是一個問題。

我們要有議會，那就要有會章，我們著手在90年初左右草擬堂區議會的會章，給教區李亮神父審閱。獲批之後，我們也通過正式成立堂區牧民議會，我在那時便順理成章的擔當了會長一職。91年開始，我前後做了兩屆，由91年至95年，然後「落莊」⁸。

由90年開始，原則上，每個堂區都須要成立牧民議會，當時是由教友總會幫忙組織，所以由那時開始，每個堂區都有牧民議會。所有堂區的會長都有定期聚會，做交流。

在那時，教區仍未設立總鐸區⁹，到後來設立了，我忘記了是七個還是九個。每個堂區自己有堂區議會，定期一起到教友總會聚會、組織、做交流。後來再細分一點，每個鐸區自己組織，包括牧民議會，關社組都是。

以沈先生的觀察，大埔堂區自開始以來，長期由宗座外方傳教會會士負責，因此在牧民方向上的變化並不大。他看到當時的改變主要發生在教友層面，特別是教友在職務上的參與增加了。

⁸ 即卸任。

⁹ 堂區之上的單位，由數個在相同地域的堂區組成，以促進彼此間的交流溝通及牧民和傳教工作上的合作。香港教區現行的總鐸區制度由胡振中樞機於1992年引進；在1993年，教區劃分為九個總鐸區。

以前全靠神父說了算，神父說要做甚麼就做甚麼。堂區發展，一直長大的時候，特別是教友本身的質素條件不斷提升，以前的一套漸漸行不通了。其實在《邁向光輝的十年》胡樞機都很強調這一點，所以那時特別提我們要進行改革，這都是一個重點。

教友參與的人數多了，他們本身的質素都愈來愈高。以前讀上大學有多少人？現在一個招牌掉下來，都不知砸死幾多個。這是一件好事，同樣為他們，我們要做好培育領袖的角色。我有幸在初步發展的時候，在各方面都有參與，包括培育。那時我們都不斷去增值，這為我自己來說是很大的得著，為自己的信仰生活是很大的支持。

教友延續培育的需要

「落莊」之後，胡樞機改組了教友培育委員會，我有幸被邀請加入做委員。在培育委員會都做了兩任。返回堂區時，自己思考，由堂區議會到教友培育委員會這段時間，檢視自己做了甚麼，以及思考自己想做甚麼。

自己審視過所有資料之後，還是想回到最基層，做教友培育。因為自己一直覺得，教會內教友的延續培育相對做得比較少，教友在教會內的參與性不是太高，我覺得在持續培育上，可以做多一點點。如果在教區層面，就太闊了，不如在自己堂區。

在過程中，感覺到自己有很多不足之處，能力有限，特別是開始參與慕道班服務，起初是做陪談員，然後自己要去增值，去參與教理中心的教理班，完成了兩年教理班課程。讀完後覺得更加不足，就去報讀聖經學院。因為要

上班，沒有這麼多時間做功課，我說，不要這麼貪心，讀普及課程就好了，不用做功課，輕鬆點，以及放工去讀，可以的。那就讀了四年普及課程。

讀完之後，覺得仍有問題，剛好羅國輝神父說，不如參加我們的禮節師課程。我說好，我這兒剛剛讀完，反正預留了時間讀書，就去參加了教區禮儀委員會舉辦的禮節師課程，又讀了兩年。

我在堂區牧民議會發展過程當中，也看到了一些問題，就是很多有熱誠的教友，很熱心的教友，他們參與堂區的服務。第一點，他們抱有一份心態是，「做義工啫」¹⁰。第二點是，他們很多時會用自己的工作經驗，放進堂區。這兩方面，為我來說都是出現很大問題。

第一點，我跟他們說，返教會服務，不是義工，而是盡教友職務。第二點，如果我們把屬世的方式去處理屬靈的事務，是很容易會出現很大問題，很多時在過程中，將教會訓導推到一邊。這樣的話，我們的教會還是教會嗎？特別在牧民議會內，我們推行堂區工作的時候，方向會有落差的。這又牽涉到教友本身培育的問題，如果有足夠的培育，他們的定位和方向，能夠跟他們的熱忱相配合，那就很好了。但是為堂區來說，這是很奢侈。

走到 2018 年 · 再思堂區的發展

沈先生強調教友的培育，尤其是持續培育的重要性；而已經退休的他，在大埔堂區除了繼續參與堂區慕道團和善別小組等服務，亦不倦地思索堂區的發展。

¹⁰ 即「只是做義工而已」。

在胡振中樞機的年代，我很欣賞胡樞機的是，他「好叻」，我個人認為他有兩個左右手，一個文、一個武，陳日君助理主教（現為榮休樞機主教）我視他為武，湯漢輔理主教（現為榮休樞機主教）是文，教會兩方面的發展會比較均衡的。

那天跟你通完電話，反思這些問題的時候，再將一些舊資料拿出來看。特別我說我是胡樞機的年代，重看胡樞機的文件，所做的工作。當我翻開胡樞機那份《邁向光輝的十年》中期報告，那七大範疇，我就去反思，來到今年2018，在這七大範疇裡面，我們有多少範疇還在做，或者有沒有那些範疇，我們已經不提了，或者做少了。我自己一直在打分數。其實得分相當低，為我自己來說，都算是氣餒。

幸好我本身是傳道員，我在這方面掌握到《聖經》和教會訓導的訊息，這方面為我來說是一個支持，即是沒那麼容易迷失，因為始終我要跟人講，跟人溝通。特別講中期報告裡面，來到今天我還有一個想法，希望遲些能有機會跟堂區神父討論一下。

眼看很多家庭搬進搬出，議會的人事變動，牧職的人事變動，我慶幸能夠在這裡，都做一點點的工作，希望能夠繼續成為這個大家庭中的一個角色。

守護聖堂、以聖言拓天國

—— 溫以政神父

- | | |
|------------|---------------------------------|
| 1930年3月24日 | 出生於廣東省揭西小坡洋村 |
| 1946年 | 進入揭陽聖伯多祿小修院 |
| 1949年9月 | 因戰亂來港加入西貢小修院 |
| 1960年7月2日 | 晉鐸，其後前往馬來西亞服務 |
| 1975年 | 正式回港，在長沙灣基督君王堂任副本堂 |
| 1978年 | 轉任大埔堂副本堂，負責修葺偏遠離島教堂成為朝聖景點 |
| 1989年 | 成立之「聖言生活會」 |
| 2010年 | 聖言生活會更名為「以政聖言生活會」，正式成為教區認可的信友善會 |



(圖：溫以政神父，攝於2018年)

訪問、撰文：張小蘭

溫以政神父於 1930 年 3 月 24 日出生於廣東省汕頭教區揭西小坡洋村。1946 年 9 月，在十六歲半之齡進入揭陽聖伯多祿小修院。與同年代的很多修道人一樣，溫神父認為自己的修道之路，平凡不過。

我當初是去潮州那邊讀書，在那裡兩個月後回家，我父親問我：「本堂陳神父問你入修院讀書好不好？」我問入修院做甚麼？他說：「就是讀書！」我心裡想去遠一點的潮州府讀書和去近一點的揭陽讀都一樣，那當然去近的地方讀書。進了修院才知道修院的規則，慢慢便有了聖召。

拓展天國回報主恩

這個選擇也開啟了他幾十年的鐸職生涯。在訪談過程中，溫神父亦不時提到他的鐸職使命，就是「傳揚福音，拓展天國」。

我從來沒想過（離開修道生活）。我只是知道天主給我這麼大的恩惠讓我做神父，不是我有本事，而是天主白白賜給我的，便盡力去做。

因為那個年代又有共產黨，訓練我們這些神職人員的人材不夠，所以我們一生都是平平凡凡地過去的。既然天主恩賜我做神父，我便要盡力去做這個傳福音擴展天國的目標，我只是想到這一點，沒有想其他，即是與教友一起工作。

這位小修生其後被送到毗鄰梅縣教區的聖若瑟中學繼續學業。1949 年 9 月因為戰亂，到了香港由本地人打理的西貢聖神小修院，後再進入當時由耶穌會外籍會士管理的華南總修院（即現今香港仔的聖神修院）。雖然他只是修生，但耶穌會士很開放，讓他出去接觸難民。

我每個星期六都到修院以外的難民區教他們道理，有十幾二十個人在修院裡領了洗。他們是從大陸來香港，做一些雜役。

可能因著溫神父的探訪，讓這些難民感覺到有人關心，而沒有對西方傳入的宗教存有疑慮。

我也不知道他們為甚麼想進天主教，只是我們一直探望他們，相熟之後，我問他們有沒有意思入教，他們說：「有啊」。我問我來教道理好不好。他們說：「好啊，我們一家向你學習道理吧！」

他們多數沒甚麼知識，沒有讀過甚麼書，所以你講甚麼，他們便信甚麼。他們很純樸。沒有問甚麼問題。現在傳教反而難很多，有很多問題。

這些難民後來成為了香港仔聖伯多祿教堂的教友，但仍與溫神父保持聯繫。即使他調派到其他堂區，也經常去拜訪他。

吉隆坡發展聖母軍

溫神父於 1960 年 7 月 2 日由白英奇主教祝聖晉鐸。雖然在香港完成修院課程，由於他屬於汕頭教區，香港教區不能批准他的祝聖。

白英奇主教是在汕尾的，我不認識他，因為我屬於汕頭教區，他是香港教區的。我升神父時就去了馬來西亞吉隆坡教區，因為汕頭教區沒有主教，不能批准我升神父。

我們修院一般都直接問香港教區，一定要由院長出面，但可能修院沒有問，耶穌會與吉隆坡教區又有感情，所以院長問了吉隆坡的溫德隆主教（Dominic Aloysius

Vendargon)，是印度裔的。他就批准了，但要我去那裡工作。

吉隆坡政府不准我在那裡太久，只准留十年。後來當時主教要求內政部多批准我待幾年，所以我待在那裡十五年。要走的時候便回到香港來。

在吉隆坡十五年間，溫神父大力發展聖母軍，由起初的兩個支團發展到十一個，並且建立了普世之后區團，即一個集合了多個支團的地區性上層組織。

我在吉隆坡耶穌聖心堂三年，之後去了森蘭美州，即芙蓉，在那裡四年，也是副本堂，不過同時負責聖母軍。

我在那裡成立聖母軍的目的是傳福音和擴展天國，現在交給他們自己負責了。我離開那時有十一個，現在十四、十五個支團了，發展得很好。有了這個區團，我現在不在那裡，這個區團便繼續我的工作。

其實，溫神父在吉隆坡不單負責堂區，也服務麻風病院。

在堂區做了八年，之後去了蒙福那裡做了神師。我們附近有個麻風病院，我常常負責他們的主日彌撒，又和他們一起吃飯。他們做飯，我們一起吃，與他們打好關係。現在聽說那個麻風院已經沒了，本來住了三千多人，全都是有麻風的，而我們教友也有一百多人。

溫神父於 1975 年 5 月返港，正式回歸香港教區，起先在長沙灣基督君王堂¹擔任副本堂，於 1977 再調派到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服務，

¹ 1970 年，時任香港教區主教徐誠斌依教會法制成立「長沙灣基督君王堂」，以長沙灣天主教中學為堂區辦事處。至 1999 年為配合牧民需要，教區經諮詢後，將基督君王堂區納入現存的「聖老楞佐堂區」。

直至 1997 年 4 月。

離島偏遠堂區的守護者

溫神父對香港教區有一個重大貢獻，可能不太為人知道，就是受胡振中樞機所托，完整保管幾座離島小聖堂。

我在長沙灣兩年多三年，然後就去大埔。大埔就有複雜的工作，要管理吐露港六、七個教堂的工作。胡樞機希望我們保管堂區的完整，因為那時香港九七要回歸中國，政府說如果沒有教友，教堂空了便會收回。但胡樞機說不好啊，要保留給我們自己用，不要弄丟了。

用了差不多十幾二十年，在那裡修葺堂區作為朝聖景點。九七之後香港成為特區，便說特區成立之前，屬於教區的那些地方，九七之後不會動我們所管轄的地方。

這些偏遠離島教堂分別是深涌三王來朝小堂、赤徑聖家小堂、大浪聖母無原罪小堂，蜆家灣聖伯多祿小堂和東平洲耶穌聖心小堂，其中歷史最悠久的莫過於赤徑聖家小堂，早於 1866 年已有神父傳教，而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是大浪灣的黃金時期。

最多的時候有五百多鄉民教友，有兩位神父負責在那裡做本堂，一位劉神父（劉榮耀）和曾子光神父²，劉神父在赤徑那裡，是本堂神父的住宿。

我不是長期坐在那裡，一星期去兩次，每個地方留宿一個晚上，兩天在那裡。深涌、赤徑、大浪西灣、蜆家

² 曾子光神父（1908-1984）出生於廣東寶安縣，1944 年在香港晉鐸。曾神父在戰後多年間，積極地在新界地區從事牧民工作。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曾子光神父〉：<https://bit.ly/2vbhZti>。

灣、東平洲，這些都是我管的。我到每個地方都去看看能怎樣照顧那些教堂。

由於交通不便，通訊、教育都有困難，這些村落的不少居民都已外遷。在 1996 年的人口普查，大浪灣只剩下不足十四人居住。當時港英政府陸續收回無人居住的荒廢土地。

那些教友知道那裡教育不方便，全都搬走了，有些搬到市區，有些去了新界區，有些去加拿大、美國、荷蘭，搬到外國了，那裡只剩下一些鄉民，大的地區也只十幾個人。我去的時候差不多全走光了，只剩下幾個，有四五個來參加彌撒，沒有太多人了。

東平洲那個保不住了，因為政府聽到那些鄉民完全搬走了，只是星期六、日回去做生意。政府跟我們說：「你們現在沒有教友在這裡住了，那個聖堂沒有用了，應該交回。」便給政府收了。其他地方還好能保存，保住了教會的物業。

據《公教報》引述研究香港教會歷史的田英傑神父 (Sergio Ticozzi, PIME) 稱，東平洲鄰近中國大陸，不少偷渡者從水路到該處著陸，造成治安問題，加上交通不便，村民逐漸遷走，聖堂亦只運作十餘年便告荒廢。

以政聖言生活會

從內地來港的溫神父，一直心懷祖國。2010 年，在教友協助下，他正式成立教區認可的公教信徒善會「以政聖言生活會」。這個善會的宗旨之一，是藉著到國內朝聖建立與中國教會共融的信仰團體。

實際上，溫神父早於 1989 年 12 月成立「聖言生活會」，主動回應胡振中樞機發表的《邁向光輝的十年》牧函中有關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的號召，邀請香港教區擔任橋樑教會角色，推動中國教會內不同團體的共融合一，並協助建立了三十多座聖堂。

為甚麼會建立這個會，是因為胡樞機在78年說香港教區要走的路線是信仰團體，89年他出了牧函，說要落實信仰團體。我聽從胡樞機的推動，便在89年開始了聖言生活會。

我覺得教區推動信仰性團體只是分享福音，對自己靈修的修養會好一點，但不是落實傳福音擴展天國。胡樞機有一句話，說要傳福音擴展天國，我覺得香港教區的信仰小團體不能單單只看福音，分享福音，分享教友生活便算了，要腳踏實地去進行，要腳踏實地進行便需要一些組織。

這個有定期聚會及活動的團體，順著教區會議決定將信仰小團體設定為優先處理項目，也努力朝著小團體的方向邁進，於2009年把五十二個堂區的小組集合，成立聯會，統稱為「以政聖言生活會」。

如今退休寄宿於九龍灣聖若瑟堂的溫神父，除了繼續在主日主禮彌撒和平日與其他神父共祭，仍與以政聖言生活會一群教友維繫團體的力量，每年舉行例會、六次茶聚，以及三至四次的朝聖旅行。

我看到單單一個小團體是不夠的，那我們再組織了一個叫以政聖言生活會，這包括了香港教區五十二個堂區。我們用甚麼方式去聚集他們呢？我們有一個主意，叫福傳旅遊，目標是傳福音、擴展天國，我們把旅遊中捐獻所得的錢用來探訪聖堂，給他們用來作經費。

我們是集體出錢的，我們每樣都有，茶聚也有收奉獻，春夏秋冬，收到的奉獻都寫下。每年會發出一份綜合報告，從90年開始，注明年捐與月捐。捐錢的人每年都會

拿到這報告，即使你只捐了一百元也好，我們也會給你的，讓你知道收入和錢怎樣用。他們給我們的每一分錢都是作福傳用的，沒有自己拿去花了。

我始終都想到，我們本地的教會也是應該受照顧的，馬來西亞政府不讓我在那裡住那麼久，我也很高興能回來，為自己祖國出一分力是很有需要的。從我成立聖言生活會起，從 1991 年到 2010 年，我為大陸贊助了三十多間聖堂，讓他們有地方集中一起祈禱。他們說沒有聖堂傳不了教，我覺得也是對的。我能給多少便給多少吧，不能說我能悉數幫忙，但也只能這樣了。

查字典認識香港的傳教士

—— 馬偉良神父

(Fr. Patrick Masschelein, CICM)

- | | |
|--------|-----------------------|
| 1947 年 | 出生於比利時 |
| 1973 年 | 晉鐸 |
| 1974 年 | 到香港，於新亞書院學習廣東話 |
| 1977 年 | 服務於調景嶺聖母升天堂（至 1996 年） |
| 1993 年 | 任將軍澳聖安德肋堂首主任司鐸 |
| 1998 年 | 任聖母聖心會省會長 |
| 2005 年 | 任紅磡聖母堂主任司鐸 |
| 2005 年 | 獲比利時國王頒授勳章，表揚其傳教工作 |



（圖：馬神父於 2019 年 2 月 24 日新春團拜活動講話。圖片來源：紅磡聖母堂網站）

訪問、撰文：黃奕清

馬偉良神父來香港已四十多年，期間除了有六年擔任聖母聖心會省會長，他都在堂區服務。但他服務過的堂區並不多，因為單在調景嶺就度過了二十年，他陪伴該區教友，直到調景嶺被拆去。而在調景嶺服務的後期，他同時要兼顧籌備將軍澳的新堂區；神父透露了籌建聖安德肋堂時一件鮮為人知的往事。

願往最需要他的地方

馬神父出生於比利時一個虔誠的教友家庭，自小參加童軍、輔祭會等很多堂區活動，讓中學時期的他已有當神父的念頭。馬神父在中學畢業後（十九歲）進修院，而為著要進教區還是修會的修院，他考慮過一段時間。

那時我鄉下的神父給我看，全世界有很多地方不夠神父，所以便慢慢向這個方向，去聖母聖心會的修院申請，那兒立即收了我。

在聖母聖心會的修院七年，一年初學院，兩年哲學，四年神學。最後兩年，聖母聖心會的會長問我：「你想去哪兒？」這個問題很難答，我不懂得答。那時未有電腦，未有上網，所以那時我答他，對亞洲比較有興趣。這是自己的興趣，我看書，時時都看跟亞洲有關的，尤其是中國的，對中國的歷史很有興趣，是個人的興趣，不懂解釋。那我跟他說：「亞洲，哪個國家最需要，我就去。」

過了一段時間，準備最後一年的神學，他（會長）說香港現在很需要，我答：「好！」然後我回自己的房間，我都不知香港在哪裡，無上網，無電腦，甚麼都沒有。我查字典，原來香港是中國的，英國的殖民地，我那時才開始看一看香港在哪裡。

「傳教，不懂得講就甚麼都做不到。」

對傳教士來說，第一步是學習語言；馬神父就在這方面下了不少苦功，也碰過釘子。他的家鄉在比利時南部近法國，以法文為母語。馬神父得知將要到一個英屬殖民地傳教，想到在香港會有很多人講英文，所以晉鐸後首先到愛爾蘭學習英語，在當地生活了八個月。

在愛爾蘭住在一個家庭裡，跟家人一起生活，白天上學，晚上跟家人，即是「immersion（融入生活）」，由朝到晚都被迫要說英文，這是最好的方法。學英文之後，就到香港，1974年9月。

馬神父在香港的首三年，在紅磡聖母堂度過，先在新亞書院全職學習廣東話兩年，然後在聖母堂實習一年。他覺得這是天主很特別的安排，因為他所屬修會在香港的傳教工作，正是在那裡開始。

聖母聖心會在這裡開始，已經是六十年前，當時很多神父從中國大陸被趕出來，回比利時，有些經過香港，覺得這裡都屬於中國，想留在這裡，就向主教申請。那時的紅磡甚麼都沒有，主教就說：「紅磡吧，你們在那裡做傳教工作」。這是六十年前的事了。買了這塊地，起了聖堂，起了學校，就開始建立堂區。

我第一天來到，還可以望到北角，過了幾星期後，就望不到了，因為起黃埔新邨。所以很有興趣，一邊學中文，一邊看他們如何起樓。

那時（新亞書院）在天光道，所以我每日步行到學校。學校後來搬去了中文大學，那時離這裡很近，所以我很方便。

學習廣東話不久的馬神父，當然常常會講錯說話。例如他想說很喜歡堂區，卻說成了「我好鍾意我的同居（堂區）」，令教友大為驚訝：「神父有同居嗎？」

差不多每一日都會講錯說話。我時常都跟他們說，如果我說錯話，你一定要告訴我，我要學識，你不告訴我的話，我會繼續說錯，那我就沒進步，我說我要進步。

我很辛苦學廣東話，跟著到調景嶺，99%的人不講廣東話，用自己的鄉下話，所以是很困難。小朋友因為學校，所以講廣東話，我們在那兒辦三間學校；但是其他教友，全部都是講鄉下話，湖南、上海、四川……甚麼話都有。好困難，真的非常困難。

我講廣東話，他們聽得懂，他們說鄉下話，我不知他們說甚麼。他們辦告解，跟我說，我答「天主保佑」，聽不懂，很困難，那幾年真的很辛苦。

堂區有位義工，譬如我去探訪或者參加活動，會幫我翻譯。後來，忘了過了多少年，我返中文大學，學普通話，真的很需要。我在學校學很標準的普通話，但他們說的鄉下話，沒有人聽得懂的。嘩！真的很困難！

普通話在後來馬神父當聖母聖心會省會長的六年間，才真正大派用場，因為那段時間他常常要到台灣、新加坡和蒙古等地。

「以前去探人，是件很開心、很自然的事。」

語言的不同雖然引起了不少誤會和故事，卻無阻神父傳教的熱忱，也無礙他與教友建立關係，尤其是在調景嶺生活的那二十年。

調景嶺這個社區始於 1950 年，港英政府把六千多名逃離國共內戰的難民集體遷移到調景嶺，他們中大多是國民黨軍人及家眷，故有「小

台灣」之稱。¹ 那時的調景嶺既偏僻又荒蕪，政府的救濟物資亦相當不足，包括天主教在內的基督宗教，遂成為難民物質以至精神上的重要支援。調景嶺好不容易由一個難民營，發展成為獨特的社區。²

同是難民的耀漢小兄弟會曹立珊神父³ 當年獲主教授命，首先隨難民遷到調景嶺生活，開闢荒地。⁴ 隨後聖母聖心傳教修女會於 1953 年在調景嶺開展牧民工作，聖母聖心會傳教士亦自 54 年開始在該區服務，⁵ 而聖母升天堂⁶ 則於 65 年 1 月祝聖啟用。

以前調景嶺是小鄉村，每個人都熟絡，只有幾千居民，所以晚上沒有人鎖門，我們下去，進去這裡、那裡坐，很開心的。他們對我很好，都很欣賞我去探他們。因為是小鄉村，跟市區不同；那兒沒有車，都是石級，在一個山頭，要行很多樓梯。

那份關係，好像小團體。教友不多，星期六晚那台彌撒很少人，星期日七點半和九點正，兩台彌撒也是不多人，所以在開彌撒方面，要做的事不多。

那些以前的軍人，以前國民黨，他們的家庭都在中國，所以都很掛念家人，我們常常去探他們。雖然語言溝

¹ 香港歷史：〈重拾調景嶺精神，不應只是夢想！〉·《輔仁媒體》，2014 年 8 月 21 日。

² 劉義章、計超：《孤島扁舟：見證大時代的調景嶺》（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5），頁 2-19。

³ 曹立珊神父（1913-2011）原籍河北，晉鐸於 1935 年。他在 1949 年來到香港，翌年隨難民到調景嶺，開展救濟、教育及牧民的工作。曹神父自 1954 年在台灣服務，直至逝世。

⁴ 〈聖母升天堂結堂紀念特輯〉·《公教報》，1996 年 07 月 19 日。

⁵ 〈聖母聖心會傳教歷程 服務弱小 體現一心一德〉·《公教報》，2018 年 04 月 01 日。

⁶ 聖母升天堂的前身是一個葵棚，後於 1979 年 7 月成為堂區，1996 年 1 月歸入聖安德肋堂，同年 7 月 7 日奉獻最後一台彌撒。參〈聖母升天堂結堂紀念特輯〉·《公教報》，1996 年 07 月 19 日；「天主教香港教區歷史建築探索」網頁，〈聖母升天堂〉：<https://bit.ly/2Xg4AfE>。

通困難，但他們都很欣賞，於是我們都能夠建立一個像大家庭般的氣氛。

甚至現在，清拆了二十年，我們還有個基基團，有繼續開會的，兩個月一次聚會，在教友的家中，有二十人左右。因為家庭的氣氛。很困難，但小團體，家庭的氣氛是很好的。

現任紅磡聖母堂主任司鐸的馬神父感嘆，現在想做社區探訪實在困難。

在這裡（紅磡），去那些大廈，想去探一個人，不讓我進入，要看身份證，很麻煩的。以前去探人，是件很開心、很自然的事。整個調景嶺的教友都知道，神父來了，我們周圍都去坐，「飲杯茶、傾下計」⁷，是不同的生活。在這裡，我隔離鄰舍都不認識，因為夜晚全部鎖門，不理其他人，晚上想去探訪都不知多困難。



（圖：馬偉良神父〔左一〕在聖母堂新春團拜活動中派紅包）

⁷ 廣東話，喝杯茶、聊聊天的意思。

「一個快要死的堂區，一個剛出世的新堂區」

在那個香港急速城市化的年代，有不少傳教士都成為了堂區的開荒牛，馬偉良神父亦是其中之一位。九十年代，政府逐步把將軍澳發展成為新市鎮，聖母升天堂所處的調景嶺寮屋區因而面臨清拆。

我忘了是否 1992 至 1997 那幾年，我負責兩件事：一個快要死的堂區，一個剛出世的新堂區。當時未有「聖安德肋」這名字，那時是「準堂區」，在景林天主教小學的禮堂舉行主日彌撒。

將軍澳第一台彌撒，是我做的，應該是 1990 年將臨期第一主日，我還記得，在景林天主教小學的禮堂，那時未有聖堂。我們開始辦手續，買地慢慢起聖堂，就是聖安德肋堂。

所以（那幾年）我在調景嶺開彌撒，然後行四百個石級上山，然後再乘車到將軍澳開彌撒。那幾年是很辛苦，因為調景嶺他們說「不要放棄，我們還在」，當然是有感情。將軍澳說「我們是新的，你常常回調景嶺，我們這裡新市鎮，愈來愈多人。」兩方面都爭取，我兩邊都要做。97 年調景嶺被清拆完，就集中精神在將軍澳。

馬神父憶述在籌建新堂期間，因遇上了阻滯，而發生了一件鮮為人知的事情。當年香港教區已物色了一塊地，準備工作做了好幾年，卻忽然收到房屋署來信，說那塊地不行，叫他們另覓新址。馬神父認為，政府大概是發覺到該地段剛好在地鐵站旁邊，很寶貴。

所有文件都準備好了，我們都守規矩，請則師，我們已經開了很多會，常常到教區跟康神父⁸開會，忽然間收

⁸ 康建璋神父，教區前任總務長，負責管理財務。

到信，嘩！有無攞錯呀！

我第一次，我開車上去港督府，找彭定康，他是教友。我進去了，駕著車，說我要找彭定康。彭定康見到我，我向他解釋，我們在這裡工作了起碼四、五年，突然間你們房屋署不給我們，怎可以這樣？「神父，放心，我負責。」一星期之後，房屋署來信說，對不起，有少少的誤會，就沒事，就繼續進行了。

「我的第一個優先，是探病人。」

馬神父在港多年的傳教生活中，一直都視探訪病人為優先的牧民工作。誰進了醫院，他就立刻去探望，像訪問的前一天他就去了一個病人家裡探訪。

探病人對我來說是很重要，耶穌行奇蹟，大部分都是為盲人、麻風病人、行動不便的人。我剛才都看福音，耶穌晚上想吃飯都沒時間吃，因為一群病人來找祂。

如果你看《天主教手冊》，伊利沙伯醫院是玫瑰堂負責的，但是現在他們常常叫我們去，因為他們知道我們一定會去。

近年，馬神父在堂區多了安排到中國內地的朝聖活動，他希望教友認識自己國家的傳教歷史。也許由於天主教是由歐洲傳來香港，香港教友們比較熱衷到羅馬、露德、花地瑪、默主哥耶等地朝聖。

馬神父感歎，教友對自己國家的傳教歷史不大關心。在這次訪談的兩星期前，他就帶了聖母堂的一些教友到內蒙古，了解聖母聖心會以前的神父在當地傳教的情形。

剛剛開聖若瑟會⁹，我問婆婆們：「你認識自己國家、你自己中國傳教的歷史嗎？」她們都不認識，花地瑪、默主哥耶就認識，中國大陸的就不認識，是否有點矛盾？講露德、花地瑪就會很吸引，講到內蒙，覺得「無嘢玩」¹⁰。我說：「對不起，我們不是去玩，我們去朝聖。」（參加了內蒙古朝聖團的）三十幾位教友，他們都開了眼界。

⁹ 聖母堂的聖若瑟會，主要在殯葬禮儀中為離世教友誦念玫瑰經和煉獄禱文，藉以表達對亡者及親友的關懷，亦希望能將基督的訊息傳給未信主的親友；會員亦有定期探訪年長病弱的教友。

¹⁰ 即沒甚麼好玩的。

教會的女性

天神之后堂的「本堂神母」

—— 王美笑修女

(Sr. Michelle Reynolds, MM)

- | | |
|--------|------------------------|
| 1942 年 | 出生於美國麻省 |
| 1960 年 | 加入瑪利諾女修會 |
| 1968 年 | 在紐約唐人街服務 |
| 1970 年 | 宣發終身願 |
| 1972 年 | 獲修會派遣來香港 |
| 1974 年 | 派往復華村聖堂，成為首位平信徒擔任堂區管理人 |
| 1983 年 | 調派往新界區服務 |



(圖：王修女 2010 年慶祝入會金禧。圖片來源：瑪利諾女修會網站)

訪問、撰文：黃奕清

堂區是天主教教務轄區中的最小單位，堂區負責人一般是神父，稱為本堂神父或主任司鐸。王美笑修女卻成為香港首位管理一個堂區的平信徒，被教友笑稱為「本堂神母」。

七十年代來到香港的王修女，前期落戶觀塘，後來移居新界西，生活於社區當中，體驗其中的各種人和事，更曾經面對社區的拆遷，擔起守護堂區過渡至新社區的責任。

王修女生於美國麻省一個公教家庭，是家中的幼女，因為出世時體弱，恐怕不能生存下去，所以她是在醫院領洗的。王修女自小在公立學校接受教育，直到中學最後的三年，她選擇轉讀天主教學校，為甚麼呢？

當時我已在想將來的生活，想著入修會。中學一畢業，我就加入瑪利諾修會，因為我最喜歡的，是想將我們的信仰跟其他的人一起分享。

中國文化初體驗

王修女 1960 年加入修會後繼續升學，及後被安排到紐約唐人街服務。除了堂區的工作，她也在華僑學校教書。

我們的堂區剛好在唐人街，很多教友未必是在唐人街住，在外面住，會特別在主日到唐人街參與彌撒，參與團體活動。

在美國我覺得最大的阻擋是語言方面，例如小朋友的家長，必須要有人做翻譯，在這方面我想做多一點。雖然我在美國上課，但我覺得吸收很少，環境不同，不是常常要用中文。

起初我沒想到來中國的，不過在唐人街接觸中國人，覺得他們的文化、語言好吸引，有很多地方想多了解和認識。

四年之後，修會安排我來香港，所以我1972年來到香港。

投入香港的社區生活

我在唐人街時很活躍的，又教書，又在堂區做牧民工作等等，（來港後）我特地安排了做一些義工。例如在聖德肋撒堂有中文彌撒，我會幫忙歌詠團。有些人找我，是護士團體，在廣華醫院、聖母醫院，有些醫院的服務。

不過最主要的是有一位神父邀請我，那地方現在沒有了，是復華村，現在是天神之后堂。因為他知道我喜歡小朋友和音樂，所以我起初在那裡幫忙歌詠團和小朋友的活動。我自己覺得，我不懂說他們的話，他們不會說英文，不過我們可以慢慢溝通。

在五十年代初期，東九龍地區與牛頭角一帶都是荒涼地方，當時香港政府用市區以外的這些郊區公地，臨時收容從大陸來港的難民。1952年，瑪利諾會有計劃地安排在多個難民區展開傳教及援助工作，包括在復華村山頂處動工興建小學校舍與聖堂共用的建築物。該小學以時任教宗的名號，命名為「庇護十二學校」，聖堂最初名為「牛頭角天主教公所」，四度易名後稱為「天神之后小堂」。

當年的復華村位於今日牛頭角樂華邨一帶，依山而建，是瑪利諾神父在觀塘區傳教工作的起點，首次聚會的地方更是原來用來養豬的農舍。¹王修女憶述七十年代村內的環境，村裡的人雖然窮困，卻凝聚出密切的關係，也成了教會福傳的助力。

所有的屋是石屋，連在一起的，一行一行的，好像柴灣的石屋。有十區，每一區有幾排屋。

家裡沒水，要出去取水，沒廁所，要用公廁。我起初

¹ 見天神之后堂網站的歷史簡介：<https://bit.ly/2IQzjMt>。

到那裡，真的有些人是沒怎樣外出過。我記得小朋友，有些讀完小學，有些讀了一、兩年便停了，很多人沒繼續讀中學。後來在我們青年組，有些小學停了，自己讀晚上的夜校。

他們說以前，即是四、五十年代的時候，他們工作，不是給錢，而是給米他們吃的；他們自己合作起「屋仔」，會安排一間給他們每一家人。所以人們很團結，覺得這是自己建的村。我記得有很多人入教，在村內差不多有一萬人，有四分之一領了洗。有說教友的百分比是1%、2%、5%，不過在村裡面是四分之一，特別多。

星期六、日會打通小學的六個課室，做一間聖堂。有另外一間屋仔，是瑪利諾會的歷史，在四十年代時做麵的麵廠²，是當時的瑪利諾神父負責的地方。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捐牛油、麵粉等，人們不懂如何食用，所以教會做麵。不過到我的年代，它是堂區中心，用來做圖書館、上主日學等等。

王修女在 1973 年開始接觸復華村，初期一邊當義工，幫忙堂區的兒童歌詠團，一邊努力學習廣東話。

我覺得為甚麼我上堂聽的，與在村裡聽到的有不同？慢慢地我懂得看中文，原來這個是講台山話，這個是上海話，甚至有部分是講普通話，在村裡面有很多不同的方言。起初我覺得自己很蠢，聽不明，不過慢慢我知道是環境。

我的中文很「水皮」³，我聽到怎樣說，就會跟著怎

² 復華村的麵廠，樓高兩層。據英文版《1962 年香港天主教指南（重印）》記述，當時全港共有十二家教會開辦的食品製作中心，主要為麵廠，有三間還製作其他食品。

³ 廣東話，差勁的意思。

樣說，未必說得很準。因為這原因，在新亞書院，我的老師每一次上課，他都說：「妳去了哪裡？妳在哪兒聽這些話？」不過有個好處，我之後接觸他們，他們講甚麼話，我多少有點吸收，猜得到他們在說甚麼。

王修女要適應的，除了語境，還有與西方不同的生活與交際文化。

例如我們需要人幫手擺放椅子，我們會依賴輔祭會。他們的思想是，如果神父修女叫，他必須要做。我記得有幾次，他答應了做一些事又沒做，當然我會很生氣，為甚麼呢？後來，我覺得有些地方似乎是種禮貌，神父修女叫他做甚麼，他一定會答應，未必會做到，不過會答應，因為對他們來說，時常要「畀面」⁴。我說：「我要真話！真實的話！如果你不可以，不要跟我說你會來。」這些慢慢地，他們認識我，我認識他們。

另一樣是，有人請我們去「飲」⁵，有時我們會說很多俗話：「多謝了，不過那天我要返工。」別人說：「答應吧，妳可以跟他說妳會去。」「不過我不會去。」「不要緊的，妳答應，他會感到舒服一點，然後我們會通知他，修女剛好有點事，不能出席。」所以這是「畀面」，起初我很不習慣。

擔起堂區管理

完成廣東話課程後，王修女正式服務於復華村天神之后小堂。在那時代，堂區跟社區居民的關係相當密切，發生甚麼事，教友都會跟神父

⁴ 給面子的意思。

⁵ 宴會的意思。

和修女接觸。

尤其是我的時期，政府想收地，全部清拆，將居民搬去順利邨。所以我們跟明愛的社工合作，因為政府不會召集很多人開會，所以我們學校會當作家長會，我們會給他們返聖堂或者用學校，召集在一起。當時因為新屋的編排和申請，有很多人需要領洗紙作為住址證明，證明他們已經在那裡住了一段日子。

本來復華村有自己的聖堂，牛頭角有基督勞工堂在發展，有一位神父兼顧下面和上面，不過很多次時間有衝突，沒法子在兩個地方工作。瑪利諾神父請我搬來村內的聖堂，所以可以說我是香港第一個不是神父、但管理一間聖堂的人。

胡振中做主教，當時堂區交回給教區，我是復華村的管理人。胡振中說「無問題」，他都接受我做這份工作。之後其他團體都有試過，PIME Sisters（宗座外方傳教會的修女）在新界區，有些堂區，有些 layperson（平信徒），那些 Scheut Fathers（聖母聖心會）都安排了。不過他們說我是第一個。

在 1978 至 80 年間，政府分階段清拆復華村，聖堂亦不能幸免，堂區過了一段既沒有牧職神父，又沒有彌撒中心的時期。

因為有一位瑪利諾神父在順利邨，在安置區有露宿者和長者服務，我們修女在那裡住，所以胡主教也邀請我在順利邨服務。有了住的地方，至於召集的地方，有時我們去餐廳開會，或在戶外的地方。

本來順利邨都屬於我們堂區的範圍，大部分復華村教友都搬去順利邨，他們要求我都跟著一起去。起初第一年，我們沒有地方，所以我都要去接觸，去找地方。幸好有一位教友有間幼稚園，願意借出地方，我們便可以在那裡舉行彌撒。

那個團體發展得很快，因為復華村拆了，很多教友搬去那裡，剛好竹園都拆了，有很多教友也搬去順利邨。當時有一位李神父（李若石神父）⁶在觀塘，帶我去介紹我給教友認識。所以我記得第一個聖誕節，有幾百人出現了，所以要在室外開彌撒。

由於王修女認識大部分復華村的教友，而李神父則認識竹園徙置區的大部分教友，所以她坦言，慶幸有李神父跟她合作，在這段過渡期內，堂區教友仍得以凝聚。在安逸幼稚園舉行的第一台子夜彌撒，原本預計有二百人出席，最後有五百人參加，要臨時加設座椅，彌撒並因此延遲了半個小時才開始，同時要把音量調低，免得被投訴。⁷

入鄉隨俗

順利天主教中學於 1983 年落成，從此成為天神之后彌撒中心的堂址，此時也有神父派來發展堂區，王修女遂離開市區，走進新界。王修

⁶ 李若石神父（1909-2005）出生於山西的教友家庭，1938 年晉鐸後服務於山西省。他於 1949 年來港，先後任調景嶺聖母升天小堂和沙田聖心堂助理司鐸。李神父在 1978 年於竹園平房區內的「聖庇護第十堂」任本堂神父，平房區清拆後，他從 1981 年起服務觀塘聖若翰堂。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李若石神父〉：<https://bit.ly/2VYo73O>。

⁷ 李慕娟著：〈與王美笑修女一席話〉。見於「2012 年天神之后堂六十周年尋根之旅」活動。

女先後在屯門和天水圍堂區服務，跟其他瑪利諾修女居於元朗洪水橋丹桂村內的玫瑰小堂。⁸

因為贖世主堂找人，我在修院裡面做 researching and planning（研究與計劃），有時為其他修女找工作、找地方。我到贖世主堂，在新界屯門，我很喜歡那環境，但修女們不想去。當時有一位神父說：「既然你喜歡，你自己去吧！」於是我說：「好吧，我去！」所以我之後一直在新界區。

在新界區，很多居民感覺這個地方是自己的地方，在九龍那邊是政府土地，起房子給人住，是住宅。在新界區有些住了很長的時間，有些村民跟我說：「妳知不知道，妳堂區和學校的地方，是我們的地方，我們要靠政府起學校，所以我們樂意犧牲自己的地方。」我感覺到，他們跟這地區有很密切的關係。

無論是教友非教友，都覺得這是「我們」的村，「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地方。因此我覺得工作時，有時要很小心，要尊重村長，凡事要先通知他。

我們都屬於街坊會，報名參加了丹桂村街坊會。以前我們無論是學校，都公開給他們借用地方，所以他們都知道我們關心這裡的情況，時常都會通知我們村裡在做甚麼。

有一次，這兒的村民，不知是否道教的，要在室外搭帳棚，想借用隔鄰的村公所。不過村公所剛好有事，沒開

⁸ 據聖伯多祿聖保祿堂的「堂區簡史」，五十年代主管元朗區的黃景賢神父在1955年於丹桂村租得兩間軍營式鐵皮半圓拱屋作為聖堂，名為「玫瑰小堂」。小堂於1964年易名為「玫瑰堂」，脫離元朗堂區，自成洪水橋堂區，至1995年納入天水圍聖葉理諾堂，並於2006年結束。

門，所以跟我們接觸，問可否借用地方。我們覺得沒問題，可以借，所以給他們用，因為當中有小朋友，我們讓他們可以進來休息。我們尊重他們的習俗，沒有問題。

以前在屯門，有位青年，因為交通意外去世，是上山土葬的。雖然他是教友，不過村民反對，不想神父一起上山祝聖他的墳墓。幾個月之後，舊的村長年紀大了，他過身了，他的全家是教友。他們都有他們的儀式，在室外搭了個帳篷，我記得他家人叫村民獻香，教友就點蠟燭。他們當時都要求我跟著上山，所以我有機會看到他們的習俗。

那位神父是中國人，不過可能第一次大部分人不是教友，而第二次大部分是教友。所以我知道，不可以只是自己想做甚麼就做，要慢慢看他們是否歡喜，是否接受，不想令人有不舒服。

這份尊重，亦體現於修會的社區服務，王修女舉例說：

在元朗明愛盈水閣（安老院），修女們很關心長者，亦尊重他們的習慣。我們每個星期有一次彌撒，不是主日，是在平日舉行的，為神父的方便。逢初一和十五，為道教或佛教徒會有特別的紀念。我們很多地方的修女，都會看有甚麼可以配合大家一起做。

今天已年過七十的王美笑修女活躍依舊，管理已「變身」為活動中心的洪水橋玫瑰小堂，在聖斯德望堂當牧職修女，也是三間學校的校董，還有修會的會務等等。問到將來想在美國還是香港退休，她答說：

老實說，我在這裡有四十多年，習慣香港的生活，如果可以留下來，多數會繼續。

尊重並敏於學生情感

—— 甘秀玲修女

1934 年	出生於香港
1954 至 55 年	在聖瑪利學校實習
1955 至 56 年	在培立學校實習
1956 年	加入善牧會
1962 年	在菲律賓宣發永願
1955 至 77 年	分別在培立學校、聖類斯夜校、瑪利灣學校服務
1977 至 82 年	擔任培立學校校長
1984 至 88 年	擔任瑪利灣學校校長
1989 至 94 年	於地利亞學校任教至退休



(圖：甘秀玲修女)

訪問：劉卓輝、范焯娟

撰文：劉卓輝、范焯娟、張小蘭

甘秀玲修女在師範學院畢業後就投身於教育工作，主要在培立學校任教。善牧會的神恩是照顧有困難的婦女。她們五十年代初開辦的培立學校，是一所天主教的特殊學校。雖然這家女校的學生有著各種各樣的背景，教育工作殊不容易，但逾半世紀以來，甘修女一直都沒有放棄按天主的心意，盡心教育，並按她們不同的需要及處境進行教化。

接觸修會的緣起

甘修女首次考慮修道生活是在中四那年，但最終選擇的卻不是自己母校的修會。

我開始觀察母校修女的生活，覺得這種生活方式好像頗適合我。但奇怪的是：內裡有一種很強烈的聲音告訴我，母校修會不會適合你的！而國籍修會我不考慮，因為性格的問題；觀察了很多修會，總覺得不適合自己，譬如服裝的問題，我很怕熱，某些修院戴頭紗已嚇怕我。

天主很奇妙，適合你的就叫你去。到師範第二年的時候，我母校的校長叫我回去。她說：「Louise，你就快畢業了，選定一個課室吧。」我說：「Sister，很對不起，我不會回來教。」第一年實習我去了聖瑪利，那一年很開心。

踏上教育之途

聖瑪利書院是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創辦，甘修女實習的那一年有兩位學生也踏上修道之路，而她自己則加入了善牧會。

我做實習時，預備試一下在善牧會培立學校工作，但因為當時培立不是登記的學校，要問准教育署。所以第一年我在聖瑪利實習，還未完成之時，寫信去教育署問准，

而他們真的給我。我覺得可能真的是天主的意思，讓我去試試看培立是否適合我。

第一年教書真的很開心。我剛好是 Form 2A 的班主任。最值得安慰是那一年出了兩個聖召，一個是李永援修女，另一位是詹秀璉修女，兩位都是嘉諾撒會的。最好的回憶就是這事。

第二年我就來了培立，那時培立才剛剛開始，是一間特殊學校，不屬於教育署。我們主要希望幫助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學生，所以我們這個機構是屬於社會福利署的，不是教育署。完成了兩年實習後，我就加入修會，去了羅省那裡試一下修道生活。

踏入教育生涯後，甘修女曾在不同教會學校任教，主要教授英文、打字和宗教等科目。

初到貴境的善牧會

善牧會自 1933 年起在上海法租界服務，直至共產黨於 1949 年在中國取得政權，修會需要做去留的決定。當時 Anna Marie 修女去英國大使館辦事，有位領事說：「香港的社會服務部門在關心你們善牧修女會的事。」¹ 修會亦收到香港主教的邀請，最終於 1951 年轉移到香港服務。

好像是 Bishop Valtorta，恩理覺主教² 吧，邀請她們

¹ 〈善牧在上海的歷史〉，參「天主教善牧修女會」網頁：<https://bit.ly/2F59pC3>。

² 恩理覺主教 (Enrico Valtorta, 1883-1951) 生於意大利米蘭，1907 年來港傳教，1926 年 3 月獲委任為香港代牧區第四任宗座代牧，同年六月祝聖為主教。教會聖統制於 1946 年在中國建立，香港代牧區隨之而晉升為聖統制主教區，恩主教於 1948 年 10 月正式成為香港教區首任主教。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恩理覺主教〉：<https://bit.ly/2ULBDLV>。

來的。來到沒有地方住，住在鐵路旁邊的軍營³。有幾個修會對我們都很好，譬如瑪利諾、嘉諾撒的修會都很幫忙。當時有外國籍的修女，譬如美國、加拿大、法國和愛爾蘭都有。來到這裡，他們也要慢慢地學廣東話。

當時有三個上海的修女，我不肯定，總之是北方的修女，她們一齊來的。慢慢地有廣東的修女參與。

在起初的日子，她們連落腳的地方都沒有，維持生計就更加困難。

是很辛苦的，她們起初來到之時。我記得院長每個星期要去乞食一次。是的，這個院長是德國美國籍的，身體直直的，會帶一個年輕女子跟著她，我也試過一次跟著她去。她目不斜視一直走，走到一個辦公室就給一封信，希望人家捐贈。當時她們很辛苦。

善牧會的施教理念

善牧會修女起初在一廢置鐵皮屋，為有情緒和家庭困難的女孩提供住宿照顧服務，其後於1956年在清水灣道現址創辦「培立中心」，並開設了實用科目。培立學校於1966年正式成立，甘修女任教時的「培立實用學校」乃隸屬社會福利署，於1969年才成為教育署登記的政府資助特殊學校。至2002年，修會把學校和中心營辦權移交香港明愛。⁴

培立起初不是真的以教育為主，教育是次的，我們是希望整個人會因材施教，因需要而施教，所以設施是極其簡陋的。譬如現在五十多年後，明愛培立，我們說是substandard，真的不合規格。但他們很好，他們暫時都是這樣。

³ 據《公教報》報道，當時位置約在現今紅磡火車站附近。見〈明愛培立成立四十周年見證善牧會與明愛服務貧苦精神〉，《公教報》，3449期。

⁴ 同上。

我們的工作是政府資助的。如果不是政府資助，根本是不能做到的，因為培育一個善牧會的學生，是極之昂貴，用納稅人的錢，但你看到成果是值得的。

雖然校方曾考慮把偏遠的學校能搬到外面，但與社署署長商量後，善牧會決定留在原地。

那署長說，這是他自己的理解：「為何你們的工作的成果是那麼好？部分的原因是在這樣的環境，這是一個治療的環境，在外面是很少找到的，這樣的環境學生適應了之後，得到老師悉心照顧。但若搬了出去，在一個「石屎」⁵的學校，若你們做得好，可以繼續；若做得不好，你們連住的地方也就沒有了。所以若你問我，我會勸你們留下來。」所以善牧會決定留下來，沒有搬走。我自己很欣賞這個環境。

現今的教育制度及行政工作經常成為社會焦點，而當年的甘修女已敢於放棄傳統考試，且不怕反對不合理的要求。

這裡做行政的問題，不像現在那麼繁複。需要做的就會做，但主要的時間都是放在學生身上，看看她們的進展，看看她們是否在改變中。我覺得這是更重要。我們會祖⁶很清楚的告訴我們，一個人的價值比全世界更高。所以在每個學生身上，我們看到，雖然學生有時很煩人，但她們都是天主所創造的，她們的價值都是與我和其他人一樣高。這是我們的格言。

⁵ 廣東話，水泥建築的意思。

⁶ 善牧會會祖聖于法西亞 (St. Mary Euphrasia Pelletier) 原屬聖母仁愛女修會，後於 1814 年創辦善牧會，仍以照顧有困難婦女為服務神恩。兩個修會於 2014 年獲教廷批准合併。見〈善牧會與母會合併 活出修和精神 修女感恩〉，《公教報》，2014 年 7 月 6 日。

那時我們還未登記為教署一部分，我們都有測驗。但為我來說，考試應該廢除。我試過有一段時間，忘了是何時，在瑪利灣，試過不需要考試，每個星期會測驗。但這事很難實行，因為同事在香港的教育制度下，他們很難放棄這種事。他們沒法說出：「這是否真的可以呢？」你能放膽試，是ok的；如果不能放膽，便不成了。

又像有一次，教署發一張告示，叫我們每個月寄一份學生負面表現報告給他們。看了這個告示後，我在想這是否真的由教署發出呢？有沒有搞錯？我們教學生是希望她們從正面去改善自己。你要我將時間，用行政時間來數她們這個月偷了多少次東西、這個月關了多少個老師學生？很多項的。於是我寫信去教署，說我不明白這封信，我希望你豁免我做這無謂的事情，這種工作不是我們的主要工作。這工作，我不知是誰發起的，但我覺得我們是要盡量從正面方法來幫助學生，我不希望用那麼寶貴的時間做這種事，所以我們沒有做。奇怪的是，收到信之後又豁免了。

自己眼中的培立學生

培立的學生以十二至十六歲為主，全都是女生，每人背景都很不一樣。但修女們不計較她們的背景，只管幫助她們。

學生大多數都是來自社署，是轉介的。大多數是不聽話，無心向學，「群埋晒」⁷異性朋友。不單是這一類，有些是因為家庭問題。

⁷ 聯群結隊的意思。

通常社署要她們簽一張紙，表示她們願意留在這裡。寫是這樣寫，實際是逼著要來，也沒有辦法，未必想進來，但住了一段時間，與我們打好關係後，慢慢就 ok 了。所以這是一間特殊學校。特殊在哪一方面呢？就是入學沒有定時，離開也沒有定時，不像普通學校一樣。若到差不多時間她們要走，我們就會讓她們走。這會使得教學有困難，斷斷續續，剛開始了一個班，突然又來了新人。這些我們都要慢慢適應。

實務學科快上手

由於培立學校的宗旨是幫助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實用科目讓她們離開後有一技之長，應付日後的生活。

那時，培立叫「培立實用學校」，因為那時還未屬於教署的，所以我們開了育嬰班、烹飪班，洗熨、裁縫等實用班，還有 hair dressing（理髮）。因為是實用中學，所以我們設計這些科目。湯漢主教的媽媽在這裡服務很久，教烹飪家政課，教得很好，學生對她很有印象。

這些實用的科目是很能幫到她們的。例如她們結婚後，育嬰班很能幫她們，因為生孩子以後，怎樣帶孩子呢？她們有些結婚後不用外出工作，只在家裡打理得妥妥當當，烹飪也不用求人，譬如裁縫、織毛衣，對她們都是有用的，因為我們要記得這些學生，通常出去是要工作，若不用工作便一定會在家裡打理家務。所以這通通都是實用的，所以現在想起，很多舊生的家庭，為甚麼那麼好？因為她們勤力和願意學。她們也很懷念以前在培立學的都用得著，不祇是讀書。

大部分學生都不喜歡讀書，對實用科目很快上手，但要學習傳統科目便顯得困難。

因為打字是機器，她們用心便可以了。她們打得很好，可能英文程度不是很棒，但打字打得好。當這些學生離開我們，她們去公進社（公教進行社），那裡有位西婦幫她們進聖心商科。因為她們的背景沒有人知道，等於一個學生入學一樣。三個學生一起進去，有些 Portuguese（葡萄牙籍）學生、其他學生，看到她們打字很棒，問她們哪裡學來的？她們就說：「我們有一位中國修女教我們。」「你們不是外國來的？」「不是。」但她們不信。她們的確打得很棒。她們還學了速記。

我們其中有一個出去到一間大公司工作，因為她懂速記。有修女教她們速記。這個學生極聰明，看過一次怎樣默寫那封信，便研究那封信，然後又第二封，其實所有商科的東西都是差不多一樣的。她做秘書做得極好。祇要懂得思考和研究，就幫助她很多，所以打字是很需要的科目，我猜等於現在不會電腦的話，你懂不懂也需要學。

另外一個例子，有兩個學生拼命求，「甘修女，學英文真的很難，能不能免我們學英文？」因為我們是特殊教育嘛，我說：「不是不可以，你不想讀，你常常在課室搞事也很麻煩。」因為有些學生麻煩，同學也麻煩，老師也會麻煩。我說：「不過，你要想清楚一點，你不要後悔。我可以給你特別的時間表，免你讀英文，但之後你可能會後悔，你會抱怨我。」她們說：「不會的，不會的。」

她們真的在瑪利灣讀書沒有上英文課。離開了學校，結婚生子，回來投訴。「哎呀，甘修女真衰呀，那時我們

真的給你很多麻煩，你就聽了我們，免了我們讀英文。我們現在不會教孩子。孩子問我讀一個字，我也不會。」我說：「當時跟你說過，你會後悔，這是你的選擇。現在沒關係，你有機會還可以讀，讓孩子知道媽媽也可以很勤力的，在這個年紀都會讀書。」我會想到這些例子，很好的回憶。

除了在培立，位於香港仔的瑪利灣學校和毗鄰的瑪利灣中心，均由善牧會創辦，提供學習和寄宿的地方。學校於 1968 年開辦，至今仍由善牧會管理。這些為有行為及家庭困難的兒童而開設的特殊學校，統稱「群育學校」，目前全港有八所，其中三所由天主教營辦。

學生的出路

善牧會營辦的既然是實用導向的學校，當然希望學生離開後能找到工作。不過，甘修女指出，這也要視乎她們的能力，而最重要是勤奮的態度。

她們大多數都在工廠打工。英文程度比較好的，我們很幸運，可以去公教進行社。那裡有位西婦，我忘了她的名字。因為學生不是一整班來的，例如來一個，來第二個，這位西婦很好，幫她們辦理手續去英國繼續讀書，通常是去做護士，起碼有三、四位，好成功，好成功。所以她們的出路要看她們的程度，英文程度好的，就ok。其他大多數都在工廠，要挨活，沒有辦法的，但最重要是她們能勤力做事。

怎麼說呢？天主沒有給每個人讀書的能力。瑪利灣有個學生創意極高，完全不喜歡讀書，離開我們之後，跟人做生意失敗了，便到一家三級酒店做女傭工。一邊做，一邊跟一個師傅學魔術，現在做了專業魔術師，幫到很多

人。她回來瑪利灣開班，她說不一定要讀書，因為你真的沒有這個傾向、那種嗜好去讀書，但最重要是工作。她創意極高，非常好，我們看到都很開心，因為她令到很多人開心。

信仰的培育

跟現在處處以學科為重的教育風氣不同，當年培立的學生都要接受天主教信仰，作為一種體驗。

當時學生喜不喜歡也好，一大早一定要去望彌撒，沒得選擇。那你問我，現在回憶起來，這個宗教活動是怎樣呢？因為那時代和現在是完全不同的。我覺得那是一個 exposure（體驗），讓她們知道天主的存在和我們的宗旨是甚麼。我們的宗旨是，希望她們有一天也得到信德。有很多學生，我們住在這裡之時，也做了教友，通常在鑽石山由雷志遠神父⁸幫她們洗禮。有很多也不信。我覺得，若這是天主教的機構，我們這樣做是沒錯的，是 ok 的，是一種培育，慢慢地她們自己會回想：「我是不是需要這些宗教呢？」是自由選擇。

我猜她們大多是被動式，即學校有這樣的活動，她們便參加，沒有異議。也沒有人很惡意批評，完全沒有。我印象中沒有一個學生問過：「我可不可以不去？」所以不管天氣多冷，她們都去，都要起床。

⁸ 雷志遠神父 (Luciano Aletta · 1910-2000) · 宗座外方傳教會士 · 1934 年來華。鑽石山聖則濟利亞堂 (原聖家小堂) 於 1952 年成立後的首位主任司鐸。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雷志遠神父〉：<https://bit.ly/2UQ9T8W>。

每個人都是天主獨一無二的子女

善牧會會祖聖于法西亞說：「一個人的價值比全世界更高」。這句話對甘修女的教育工作有很深影響。

我覺得這個座右銘對我們的工作很重要。例如我們的會祖聖于法西亞已經很強烈吩咐我們，永遠、永遠不可以打學生。有時她們激怒你，或會打她們一巴掌，從人性這方面很容易做出來，但我們要記得為何會祖有這樣的吩咐，因為我們要尊重對方。你打了她一巴掌，有些人會很記得。

除了與學生建立好的關係，讓她們感到被人尊重、不被看貶，甘修女認為學生對自己過往經歷的敏感度，教育者也必須要掌握。

每個學生的敏感度，你要知道。例如她真的不想人家知道她是從我們這裡出來，我們絕對不會洩露，絕對不會。如果她是無所謂的，那就無所謂。

所有學生不論任何國籍、任何社會，都可以教導到的。祇不過，你真的要接納這個學生，不是因為那時是五十年代，現在是2014年，是沒有分別的。例如現在有學生來這裡，她不被歧視，她被人接納，你很忍耐地對她，都是ok的，沒有問題。我覺得那基本態度是一定要有的。若沒有這基本態度、接納和寬恕，很難做這種工作的。譬如一個職員脾氣很差，很容易發怒。這種職員可能就不適合在這裡服務。能在這裡持續服務的，一定要愛這群學生。疼愛不是姑息，而是真的讓她們感受到這個老師對我是接納和尊重的，所以我覺得是沒有分別的，時代是沒有甚麼分別的。

為聾童教育盡心盡力

——詹秀璉修女

1941 年	出生於香港
1956 年	領洗
1962 年	加入嘉諾撒仁愛女修會
1970 年	宣發終身願
1969 至 1973 年	在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任教
1973 至 2001 年	管理嘉諾撒達言學校
2001 年至今	支援修會內部教育事工及檔案室工作



(圖：詹秀璉修女)

訪問：劉卓輝、曾家洛

撰文：劉卓輝、曾家洛、張小蘭

在十九世紀初 1808 年起源於意大利北部韋羅那的嘉諾撒仁愛女修會，首批六位修女於 1860 年抵港後，便投身於福傳和福利事業，提供醫療、教育等服務給貧苦大眾。非天主教家庭出身的詹秀璉修女自小在嘉諾撒仁愛會的學校讀書，受到修女們的感染及學校教育的影響，自然而然地選擇加入這個國際修會，並像前人一樣，扛起特殊教育這艱巨工作，為有需要的人服務。

渴望認識比父親更好的天父

我出生於一個非公教家庭，中四那年領洗。有幸也感謝我母親帶我去家裡附近的天主教學校讀書，所以我有機會接觸到我的信仰。我記得小學三年級還是五年級的時候，有位修女上《聖經》課。她是位老人家，有一天她講了一句話，我仍然記得。她說：「我們的天父很好的，比我們家裡的爸爸還要好。」

我爸爸是很好的，我很仰慕他，我覺得他是一個很樂意助人的人，很愛惜家人，以及當認識的人有困難，他都會盡量幫助。我覺得我爸爸很好，那麼天父比我爸爸還要好，我覺得「嘩，這個天父那麼好」，心裡很想認識關於這個天父。這個心願一直影響我一生，甚至到現在我做事的目標和我的決定。我希望多些人認識那麼好的天父，因為很多人都會遇到困難和痛苦，面對挫折，但若我們真的認識和明白這麼好的天父之時，我們有很多痛苦都會更容易接受，容易跳出來重新再來。

嘉諾撒修會教育的影響

詹修女入讀的小學，正是嘉諾撒仁愛會開辦的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我一年級就在一間天主教的嘉諾撒學校讀書，自小修女就教我們要關心弱勢社群，不要小看貧窮的同學。我記得有一次去旅行，是去牛池灣安貧小姊妹修女辦的安老院，現在搬到上水的那一間，每個人都要帶兩罐罐頭或是一包米，捐給安老院的院友。我們從小開始學習要關心其他人，不可只顧著自己，要記得身邊有很多人都是有需要的。

到了中學的時候，我們當時讀書是要交學費的，很多人都沒錢讀書，要在家裡幫忙做家務，或做一些輕工業。那些失學的小朋友，我們有幾間嘉諾撒中學都有三點半的義學，是給他們免費來讀書的。當時，我忘了是中三還是中四，老師問我想不想當小老師。我一個星期兩次輪流與同學放學之後去教。這些學生可能都跟我差不多年齡，雖然自己沒有很大的信心，但既然他們有這樣的需要，就算我不是老師我不會教書，我有甚麼也可以分享，我想這也是影響到我。

當了修女後，我在一間正規小學任教時，我記得很清楚，有些家境比較困難的同學，沒得吃，校長修女會在小息時，擺放一些食物、一些三文治，用幾個盒裝著。在開學時便預先告訴家長：告訴你的女兒，每天小息到某個地方有張枱。其實是在食物部旁邊，沒有太多人看到，去叫她自己去拿食物。當時我很欣賞。為甚麼不叫她們到校務處去拿食物呢？原來修女解釋，是要尊重她們，因為她們也有自尊，不要令她們在同學面前難受，這為我也是一個學習。

我也記得有一位意大利修女，因為知道我們哪些學生

比較窮困，哪一位家裡有很多小朋友的媽媽，有時有人捐來一些衣物，甚至一些米、食物、餅，她便會請那位媽媽來，不是在上課時間來學校，而是去修會那邊拿。要是她們願意，便請她們定時來，給她們這些東西。

教學生涯的開始

詹修女開始特殊教育之前，於 1969 至 73 年間在灣仔嘉諾撒聖方濟各小學任教。當時學校已安排學生接觸修會在毗鄰開辦的嘉諾撒啟明學校的視障學生。

當時當然沒有現在那麼多設施，亦未有免費教育。但在那一區，我們因為有百多年歷史，所以在區內有很多學生，甚至有從北角過來的。學生比較純品容易教。我在那裡教了四年，在小學部專責教上午班和下午班的聖經科，同時兼教中學部一班的聖經科，即宗教教育，亦兼中學部的聖母軍一個支團。¹

因為這樣，我可以請到中學的聖母軍學生，她們每個星期除了開會，還要做一個小時的工作。所以我可以很容易邀請到聖母軍團員去小學部，幫那些比較有需要的學生義務補習。所以覺得當時學校氣氛，中學小學好像一家人。

學生很多都是住在灣仔區，有很多草根階層，但亦有一些來自堅尼地道環境比較好的，但我發覺同學間沒有人會問家裡是怎樣的？大家很融洽，沒有階級觀念。另外，可能我們是在聖佛蘭士街山下，學校是被兩條街道包圍，

¹ 聖母軍源於愛爾蘭都柏林，其組織架構仿倣軍隊，最小單位是支團，幾個支團可組成區團，一個教區內的區團可組成督察區團。

住聖佛蘭士街那裡的人是經濟比較困難的，而上面是堅尼地道。聖佛蘭士街那裡有啟明學校，是為視覺障礙的同學而設。我們的中學生，除了聖母軍，還有其它學生都會接觸到失明的小朋友，會來跟他們玩，幫他們讀凸字，因為他們需要靠凸字學習，所以都學習到怎樣關懷弱小的小朋友。

聖佛蘭士街 (St. Francis Street) 可說是十九世紀灣仔區天主教會的中心地帶，附近的進教圍 (St. Francis Yard)，當年是一條教友村，從其中英文名稱都盡顯天主教色彩。嘉諾撒仁愛會的多項服務也是環繞這一區域，其中聖方濟各醫院於 1959 年與重建後的嘉諾撒醫院合併遷離，空置院舍用作盲女院 (1968 年更名為嘉諾撒啟明學校)。

教學路的轉向

至於香港的聾童教育，最早可追溯至 1935 年由英國聖公會成立的真鐸啟暗學校。² 隨著時間推移，政府認為聾童也需要更多的正規教育，因此邀請嘉諾撒仁愛會承辦一間特殊學校，詹修女於 1973 年獲調派去管理修會第一所為聽障兒童開辦的新學校，即位於啟明學校旁的嘉諾撒達言學校，兩校同位於聖方濟各醫院舊址內。

這間聾童學校是當時香港第四間。因為早期沒有普及教育，讀書是要交學費的，政府亦沒有津貼學校，到了六十年代，政府才開始正式有特殊教育的資助。所以很多聽障兒童起初是沒有機會讀書，社會福利署便開設了一些聾童會，朝九晚五，在幾個區，特別是新界，照顧這些聽覺

² 施婉萍、路駿怡等：〈香港早期聾人教育與香港手語源流的關係〉，見《教育學報》，2011 年，第 39 卷第 1-2 期，頁 139-156。

有障礙的小朋友，讓他們在那裡學一些語文、數學，以及參加一些活動。

校舍落成之後，政府就請社會福利署把香港、九龍、新界各區所有聾童會的名單和聯絡地址，有哪些適齡入學的學生，全部給我們。其中有些來自官塘、西環、甚至很多是新界的荃灣、油柑頭、屯門、藍地、元朗、大埔、上水、沙頭角。很多新界的小朋友家裡是務農種菜的，很多是來自那些地方。

當時我們拿著名單，要說服一些家長讓孩子來讀書，所以我們設有宿舍，一方面是路途遙遠；另一方面是很多家庭都習慣了這樣的生活，他們需要這些小朋友幫他們種菜、收割和做家務，所以不想讓小朋友到我們灣仔來讀書，即使我們有宿舍。

還有若干人是漁民，來自長洲、坪洲、香港仔，有些歲數比較大，有些比較小，也就是家庭背景很參差，大部分環境不是很好，經濟不好，有飯吃為他們已是非常之好；甚至有澳門搭船過來的小朋友，住在親戚家裡，周末才回家。祇有兩、三個是比較有錢的。

達言學校的發展

開校初期，因校舍設施還未完善，但學生早已註冊了，唯有借用啟明學校的禮堂做臨時課室。

用兩塊屏風分開好像兩個班一樣。我們學生人數要很少，因為老師最多能照顧十位學生。我們把二十個學生分兩組，在禮堂用屏風隔著。直至第二年四月我們才搬上

去，那時由兩班加到四班，跟著九月便開始正式增加班級數目。

學校由一年級逐年開辦新班，在學生小學畢業前，校方爭取開辦中學部。中學部學生除了小學部畢業生，也有來自銅鑼灣中華基督教會啟聲學校的小六畢業生。

到了中三，我們又想開辦中四。若中三畢業出來，他們的前景不是很樂觀，所以我們想他們繼續升上去，於是又跟政府再爭取，但很難。

政府不支持開設中三以上的課程，幸而得到真鐸學校、路德會啟聾學校和啟聲學校三間特殊學校，以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的支持，才成功開辦中四和中五。這幾間學校亦參與社聯組織的聾人協調委員會，大家一起商討不同年齡層的聽障人士的設施和需要，或是他們的前景，以推動政府的政策。

可幸，自七十年代初學校開始的那幾年，直到八、九十年代，特殊教育的發展很快，有更多學校和康復機構的出現。

我最想補充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大家都有聽說過方心讓醫生和她的妹妹方心淑校長，他們在香港，甚至我們國內地的康復與教育方面，付出了很多。所以在那段時間，藉著方校長成立了特殊教育議會。每一種類的特殊學校都派兩個代表，經常開會去討論香港特殊教育政策，推薦給政府考慮，大家都很齊心去爭取政策改變，所以在那段時間，特殊教育發展得很好。

達言的師生們

達言的學生男女比例差別不大，男生稍微多一些。至於教學方面，學校盡量跟隨政府訂定的課程；而師生比例跟正規學校相比，是一點

三，最初的兩班有三位老師。

我們相信他們有能力，不過程度淺一些，外面有甚麼科目，我們也照樣跟著。當然我們不會有音樂，到後來才有。還有體育、美勞、中英數。英文初期是沒有的，過了幾年，我們開始試教英文。大致上是跟政府的課程，因為他們將來可以上（主流學校），能夠的，雖然慢一些；這也讓他們容易一點融入社會。

我們是在《公教報》招聘老師，因為我們想，教這些小朋友比較艱難，為我們也是一個新嘗試，我們認為找教友，或者大家可以有同一目標，比較容易去解釋給老師聽。這是困難的啊！不過我們為了支持天主教教育，所以我們在《公教報》刊登廣告，有幾位寫信來，不是很多。因為我們的校名沒有標明是特殊學校，有些不知道的也前來應徵，知道後就害怕說：「我不能夠勝任，對不起。」但我們都能聘請到老師，很幸運，真的找到幾位是教友，還有一、兩位是我們嘉諾撒會的舊生。

達言的宿舍和教學

達言學校一開始便提供宿舍，讓住在偏遠地方的學生可以入住，而居於附近才走讀。不過，校方會堅持每周送學生回家，免得親子關係疏離。

我們每星期五下午放學後有校車和工作人員送他們回家，我起初一、兩年也跟車，走一轉是三個小時，校車才能回到校舍。我們由灣仔出發，經荃灣，有些學生是住在荃灣的，一直到屯門、藍地、元朗，跟著到大埔、粉嶺，甚至上水。

寄宿的時間是星期一至五。我們鼓勵家人周末一定接回家。有些會說：「我們沒有空到村口去接，讓他們住在學校吧。」但我們堅持學生需要家庭生活，否則慢慢地他們不會喜歡回家，與家人的關係會疏離。我們堅持這樣，我們盡量避免他們拋棄小朋友。

在七十年代的八所聾童教育機構中，達言是少數沒有採用手語的學校，並且堅持以高質素助聽器輔助學生。

我們學校不是教手語的，用外國引入的一些教學方式，好的助聽機效果非常好，是貴了一點，但我們用這些教他們聽，他們聽到便會講。

只戴好的助聽器是不夠的，最重要是教學方法。我們很幸運，在八十年代開始引入聽講教學法。聽講教學法不是你讀完便可以，要配一些高質素助聽機。要懂得如何配合助聽機，小朋友佩戴後不會覺得很煩，因為配得不好，或助聽機質素不好，便會有沙沙的聲音。

我們首先是在每個教室買一套，他們放學後沒得聽，沒有延續，在學校學到的那一點點說話，若回去沒有練習便等於零。所以我們會鼓勵政府配一些好的助聽機。政府投標通常是採用最平宜的，但就是最平宜的質量令他們不喜歡戴。後來幾個團體、幾間學校一起要求政府重視這個問題，不斷跟政府爭取資源，就好很多了。現在基本上每人配兩部機，大部分都需要兩部。後來我們幾個團體也爭取政府在香港大學開設語言及聽覺科學部，現在那裡產生了很多聽覺治療師。

我們的信念是這樣的。國際的統計出來，差不多沒有人是完全聾的，每個人都有一些剩餘的聽覺能力，祇不過

受了損害，用高質素的助聽機是可以幫助他們。現在科技日新月異，電子化的越來越好，也當然愈來愈貴。

隨着器材改良和普及，政府於 1977 年發表白皮書推動融合教育政策方針，再加上 1994 年開始有聾童接受人工耳蝸手術，使得不少聾童在手術後可入讀主流學校。聾童學校便陸續關閉。達言學校於 1991 年交由香港明愛管理，後期遷往柴灣，至 2007 年結束。

學校的宗教生活

不管是在哪一所屬校，詹修女和同工都努力把美好的天主教信仰帶給學生。

我們都是用教區的課本，即教理中心出版的那一本。我們當時是用中文教的，在聖方濟各學校也是。教區未出版那本書之前，我們是用英文課本，但以中文授課。在聖方濟各或是達言和啟明這三間學校，我們都抱著同一個宗旨：不是想他們認識教條那麼簡單，而是想他們認識我們信的是甚麼，意思是希望藉著我們的宗教教育堂，帶他們認識耶穌，認識耶穌的作為、他講的說話。

我們得了這個信仰，認識了這麼好的天主，我們是有責任去告訴他人，特別是讓我們的學生知道。除了一些教友家庭，其實在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很少學生會去領洗，因為她們還不懂這些，到了中學之後會有一些，但並不多。啟明和達言學校幾乎沒有學生會領洗，大部分都不是教友，甚至在中學，我們不會很刻意要他們學道理領洗，除非他們自願。

回看這幾十年，很多（聖方濟各的）學生都是三十多歲自己去找堂區去學道理。當堂區神父問她們：「為甚麼

你現在會來學道理？」她們會說：「現在家庭穩定，工作又穩定，都想到人生缺乏一些東西，所以我想尋求人生的意義在哪裡。」再問她們：「為甚麼那麼多教會，你會選擇這裡？」她們會說：「因為我小時候在天主教學校讀書。」很多個都是這樣說。

達言的學生到普通堂區學道理會比較困難，因此詹修女與天主教老師商量，仿效澳洲等地成立天主教聾人牧民小組，至今快要三十年。

最初是每個月一次，後來是一星期一次。我們告訴同學，如果你們有興趣，想見見同學和接觸天主教信仰就來，因為我們有些學生是天主教的，也希望他們有天主教信仰支持，外面沒有人懂手語，為他們解釋一些東西。

而在達言學校教聖經科殊不容易，需要大量圖片、遊戲和生活例子等去帶出信息。

我們也有機會請到角色模仿者，role model。有一年我們知道有一位聽障神父自出生便嚴重失聰，他在美國出生，自小就戴好的助聽機學講話，後來做了神父。我們知道他在亞洲便邀請他來香港。我們請他來學校與學生聊天。那是第一次。我們的學生自信心提高了很多，覺得他聽覺也跟我們一樣有困難，還讀了大學，還做了神父。

後期還有一位不祇是聽覺有問題，連視覺也有問題，或者你們可能聽過，在《公教報》上亦記載過，陳民安神父³。他曾在香港服務一段時間，之後去了澳門服務。另

³ 陳民安神父 (Cyril Axelrod) 自幼失聰，於1999年失明。他於1988至1999年間，穿梭港澳兩地服務聾人，並自2008年起為香港盲人輔導會擔任視聽障人士復康計劃榮譽顧問。其簡歷見：〈失聰失明神父陳民安訪港 發布新書勉積極面對人生〉，《公教報》，2008年11月16日。

外一位神父 Fr. Charles Dittmeier，狄孟義，曾在香港服務的瑪利諾神父，現在去了柬埔寨。他以前每個禮拜都來，午膳休息的時間與學生聊天，所以都幫助到傳福音的正面形象。現在他隔幾年就來香港開會，他們便會通傳，很多人會去跟他聊天。

從他人身上學習

總體上聽障兒童的入學率和他們的家庭環境有很大關係。家境較差的一般不希望子女讀書，尤其是女孩。然而，有一個家庭令詹修女很難忘。他們是塔門灣的漁民。當時學校已開辦了幾年，該名學生來就讀時已經七、八歲，是他母親透過社會福利署找來的。

我說：「很難得你會送兒子過來。」她說：「我聽到有間學校可以寄宿，我們要出海，一去就是一整個月。我想他讀書。我家人很反對，我丈夫、我的上一輩那些。我跟他們說，我管不了那麼多。他們說，他是聾啞的，全家人沒有讀書，每個人都要出海捕魚。」全家人反對，不想給他讀書，但這個媽媽很好。「我堅持我兒子一定要讀書，就是因為他是聽覺有問題，他將來要獨立生活，要自立，我們沒有書讀也一定要給他讀書。」

我在學生身上也學到很多事情，因為由他們入學開始，真的好像甚麼都不成，但你看到他們很努力，你教他們之後，他們真的很努力學習，他們是比普通人慢全因聽力問題，初期基礎不好，但你看到他們努力付出的毅力時，很好地鼓勵到我們，以更多愛心更多耐力去教育他們。

力爭聽障人士的福祉

在教學生涯中，詹修女認為最大的困難是如何讓社會認識到學生的能力，以及為他們謀福祉。

很多錯覺都認為他們沒有用，不願聘請他們。怎樣去跟外人解釋這個學生有甚麼能力是很困難的，他雖然聽得不清楚但你可以給他文書工作，他不是完全不成的，但很多僱主就是要他電話也要接，所以會碰釘子。這是比較困難的，所以我們會做很多公眾教育。

現在多了人願意請他們工作。香港郵政局、滙豐銀行很好，差不多是其中一兩家最早的機構會請他們做揀信員、文員，不用到櫃面工作，不用接電話，由他們查核支票的簽名。現在還有幾位仍在那裡工作。銀行前幾年裁員，都沒有裁撤那些聽障人士。很多機構就不是了，會看方便，看公司的需要為主。

在鄉村教堂、學校及監獄播種

—— 梅樂真修女

(Sr. Luigia Mindassi, PIME Sisters)

- | | |
|-----------------|----------------------------|
| 1941 年 8 月 11 日 | 出生於意大利北部米蘭附近 |
| 1962 年 | 加入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 (宗座外方傳教女修會) |
| 1972 年 | 宣發永願，之後來香港服務 |
| 1990 年 | 回意大利總會服務 |
| 1997 年 | 再度來港 |
| 2014 年 | 擔任香港區會會長至今 |



(本文所有圖片由梅修女提供。圖：梅修女領受會衣當天與家人合照。)

訪問、撰文：張小蘭

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宗座外方傳教女修會）在香港的歷史，或許比不上一些已在這裡服務逾一個世紀的國際女修會，但這些來自意大利的修女卻也見證了教會在新界區的發展。三十一歲來港的梅樂真修女，學了一點點中文，沒多久就聽從長上的派遣，先在元朗教書，然後到錦田服務，與教友們一起成長，也看著一座座傳統民居式的鄉村教堂在都市化過程中式微。

對修會「一見鍾情」

我少年的時候很熱心參加主日學，也在教堂裡面幫手，因為在意大利我們有個 Catholic Action（公教進行會）¹，我也是一份子。我在教會裡面，最初是自己學習，也教小朋友，也要負責青年活動，到了中間那段時間開始工作。現在回想，有一件很影響我的事，是有個阿姨病了要住院，我與另外一個親戚輪流去照顧她。與病人的接觸很影響我，使我想做護士。不過那時只是很普通的學習，白天打工，晚上讀書。

其實我以為我要結婚的。你知道，那時女孩子開始長大，父母為了女兒的將來開始買些嫁妝。我也與男孩外出，但很快便覺得不太適合，後來才發現自己想加入修會。

在天主教氛圍濃厚的意大利，走修道之路雖則很自然而然，但找「對」修會卻也要經過一番尋覓。對於天主召叫成為聖母無原罪傳教會的修女，梅樂真修女直言是個奇蹟，並指其他 PIME 修女分享時，也有類似經驗。

¹ 公教進行會源於意大利，教宗聖碧岳十世（1903-1914）似乎是第一個應用此名稱的。碧岳十一世（1922-1939）將公教進行會定義為「平信徒參與教會聖統的使徒工作」，藉此幫助聖統的使徒使命而拓展天主的國。他以許多著作和演講為公教進行會訂出大憲章、精神和迫切性。見《神學辭典》，條目 77。

我們堂區有修女，醫院也有，我開始找，見修會會長，但都不覺得是我心目中想要的。有一日，我很記得的，在主日學時，看到一本以前的雜誌，很小的一本，剛好是講我們修會二十五周年。我一看就知道這是我心目中想要的。其他修女分享時都有這種經驗。

我住的地方有 PIME Fathers（宗座外方傳教會的神父），他們比較遠，但我們知道他們是 missionary fathers，傳教的，但完全不知道有 PIME Sisters，所以見到有地址電話，便寫信去給她們，去米蘭見她們。決定修道的梅修女，更找來當神父的表哥向父母說項。

其實我不敢對父母說。我有表哥是神父，是堂區神父，於是我叫表哥講。我父母捨不得，但他們見到我怎樣過生活，可能猜到一些。ok 啦，是捨不得，但不會阻止。



（圖：小時候的梅樂真修女與姊姊）

來港承傳修會的中國心

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於 1968 年來港，隨即投入教育工作。原本想當護士的梅修女，但在發初願後，修會便安排她讀教育課程，而在加入修會約十年後，獲派遣來港。

為甚麼會選香港？我也不知道。會長說其他地方也需要人，像巴西及印度。我便想隨便吧，無所謂。其實我還未想到哪些地方，靠天主幫我選，之後便來了香港。

我們修女之間會講這裡的情況，像這裡有學校，但不是知道很多，慢慢了解。以前服務過的神父、修女也會告訴我們。

或者有中國的原因，因為我們對中國有一種想像的。根本我們第一批修女是要來中國的，第一批修女在 1946 年已經準備好，但來不了，最後去了印度。但其實我們對中國是有心的。

長達八年在錦田服務

如其他外籍傳教士一樣，梅修女來港第一件事就是學中文，並很快地開始在堂區服務。

那時梨木樹要開一個彌撒中心，神父找人幫忙，我便開始在那裡幫一些忙。那裡有一個很好的、年紀大的教友，是一個傳道員，他有經驗，我又不懂得講中文，我們一起做。我不明白的，或者要知道的，我跟他說，他要告訴我，就是這樣。

修會有學校的²，但我表達希望不在這裡教書。那時元朗的本堂神父問會長，希望有一個修女到那時的崇德中學，是連著一個聖堂，希望修女來幫忙宗教課。會長跟我說讓我去，便開始了。

那是 1976 年左右的事，到元朗只有從大角咀碼頭開出、行駛大帽山的 51 號巴士，車程需時兩個小時。修會著重團體生活，但梅修女每天回到會院，已經精疲力竭。

幾個月後我跟會長說，不行的，因為一大清早出去，晚上回來，團體都休息了。而且神父很想請修女去堂區做牧民工作，那我和我們的楊美玲修女，便開始在元朗住。我們租一個單位，星期六、日回來這裡。



(圖：梅修女 [左二] 與其他外籍人士訪問錦田的鄉村聖堂)

² 宗座外方傳教女修會於 1969 年在梨木樹開辦保祿六世書院，梅修女現為該校校監。

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教會在錦田已有幾所規模很小的鄉村教堂，包括上輦村的聖家公所、北圍的聖心小堂，以及在長莆以青磚興建的聖若望小堂。1965年，錦上路上的聖猶達堂建成，1979年升格為堂區。但教區沒有神父可調派到錦田，逐成了梅修女肩負起牧養聖猶達堂區的契機，並住進了現今已成為的彌撒中心的這座教堂，直至大埔堂區有更迫切的牧靈需求，而被派調離開為止。

（胡振中）主教說，錦田天主堂沒有神父，問我們會不會負責這個堂區，元朗那些神父會過來幫忙。我說我可以跟會長講，其實是要些時間想想怎樣做，因為要做的話，就會是我來做，其他修女還未準備好，有一個修女才剛學中文。我們也問其他神父，也要問羅馬（修會的總部），ok了，我們便接手做，開始住在聖堂。

PIME 神父星期六會過來這些村鎮，而慈幼會的神父就會星期日到聖堂開彌撒。我們一個月去一個鄉村，會預先通知教友有彌撒，我們是一個 team（團隊），經常我們兩個一起去。

金錢圍那時有一間天主教小學，校長請我們兩個修女去教小朋友《聖經》，是一個很好的經驗。那裡一班有二十多人，慢慢減小，應該是我們走了之後才關門的。

雖然離開了原來服務的地方，因為以往有時需要在教友家裡開彌撒，從而建立起密切接觸，教友們至今仍會主動聯絡梅修女。

有一個女孩子在那裡讀書的，現在每隔不多久也有聯絡。教友有時有需要或有特別的事，像喪禮，都會通知我，或請我找神父去幫忙。那是一個很好的經驗。他們金錢圍三年前慶祝奉教八十周年，也有請我去。

這樣就住了八年。在大帽山雷公田有幾個教友家庭，但沒有聖堂，我們在一個家庭裡面開彌撒。



(圖：在雷公田教友家中舉行彌撒)

以尊重態度融入文化

在教會的服務過程中，梅修女認為，尊重是融入另一種文化的好方法。新界的鄉村族群很講究傳統，尤其婚喪習俗，需要懂得如何應對。

我們在錦田那時，跟教友上山埋葬，有些事我們不是很明白的，我們就沒有作聲。因為有時你問他們，他們也不曉得怎樣解釋，可能以前就一直是這樣做。可能有很多這樣的事，我們會盡量的去了解，不是每次都能做到，只能問一下。

我一直很感受到教友的愛，這是很真實的。即是有時未必是教友，如果我出街，不會路去問人，大家都很有熱心，很願意幫我。未試過有需要時沒有人幫我，未試過。

如果不是教友，你跟一個人談論宗教時都會很尊重，讓他明白，但也不需要做哲學的解釋，不需要。其實我想

人們見到教友的生活，才會明白。還有就是我們都要很尊重這裡的其他宗教。

我們自己也要教人們尊重其他宗教，等對方自己想，去明白天主並不是外來的。

在鄉村堂區撒下種子

教會喜歡用撒種子作為傳教的比喻，不追求立時的成效，而是讓天主在適當的時候結出果子。梅修女就遇過這樣的一粒種子。

十年前小巴未有冷氣，要開窗的。我記不得是不是荃灣乘小巴回來，很大風，感到很冷，我請後面的先生把窗關小一點。那時我們還是用頭紗的，那男士見到我著修女衫，問：「你認不認識梅修女？」我感到很奇怪，我想他一定是錦田的人。我問他：「你認識她？你是不是錦田的？」他說：「是啊！」

他說：「我以前上過她的課，很開心。但走錯了路（踏上歧途），沒有再回去。」原來他是那些小朋友中的一個，但他不是教友。那時差不多到站了，我當然說了我是梅修女。我說：「你去聖堂這麼開心，你現在也可以進聖堂。沒有問題的。你去坐坐吧，跟天主談天。」

探訪在囚媽媽

梅修女曾經於1990至97年間被調派回修會在意大利的總會協助。由於香港準備回歸祖國，修會當時擔心不讓傳教士再入境，要她趕忙回來。近年她又當上香港區的會長，沒有時間全身在堂區服務，但又很想做牧靈工作，在機緣巧合之下，開始了監獄探訪。

我認識到一個這裡教過書的老師，她告訴我有這麼一個計劃，是幫一些快做媽媽或剛做媽媽的（囚友），不是

宗教的，只是幫她們怎樣照顧自己，怎樣準備做媽媽。我請她準備好就通知我，怎知真的成功了，現在這個團體是正式的了。

這個只有四、五個人的小團體每月一次，輪流到大欖和羅湖女子懲教所探望女性囚友，而一些外籍囚友尤其需要梅修女協助。

但你要很 flexible（彈性），有時說好那天有三個媽媽，但去到發現有四個、五個，因為裡面有很多變化的。有時那個負責的說：「Sister，你們來吧，因為有些不是香港人，要翻譯。」

她們（囚友）看不出我是 Sister，我不用說甚麼，只是與她們一起，只是做翻譯。有些是來自菲律賓的，所以要說英文。有時認識了她們，給一些鼓勵。

探訪到的人多數不是很多，三、四個，有一次有九個。有些是教友，有些不是。有時也有很年輕的要生孩子，但沒有媽媽在身邊，這是很困難的，雖然那裡的員工都是受過訓練，可能有些是救護人員，懂得怎樣照顧嬰兒。

種子在學校成長

雖然梅修女曾跟長上表示希望在學校以外的地方服務，但她在會院所在的保祿六世書院也有跟學生接觸，並且見到她們的成長。

起初是有修女做校長，宗教氣氛很健康很強的。我自己想到要做甚麼呢？我開始去見 Form 1（中一）的學生，就算只是一年一次，我會介紹我是誰，我做甚麼的。接著 Form 2 也會去，用 video（視頻）那些東西介紹修會在不同地方的服務，特別是當地小朋友讀書的問題。

現在開始 Form 3 也去跟她們講一些修會的東西。這樣，除了 assembly（早會）要講的，我在這裡就已接觸過這些小朋友三次，每年每一班一次。我希望借助那些介紹讓她們反省，學會關心其他沒那麼幸福的小朋友，這會對她們有益處。

學校每年有便服日活動，即當天不用穿校服回校。三年前的便服日，負責的學生來找她，表示收到的幾千元捐款，想用在香港以外其他更需要的地方。

上課時我也會讓她們思考一些國家的學生的生活，跟她們說：「你上課不想對著書枱時，想想其他國家的學生能有一張書枱是很開心的事。」現在我們沒有修女教書了，但都會盡量提一提，很有價值的。

近年，葵青區多了很多低下階層的南亞人居住，而這所女校也多了些信奉伊斯蘭教的學生。

可能因為是女校，這是一個原因，但家長他們應該也知道這是天主教學校。聖經課、assembly 祈禱，她們也在，沒有甚麼不尊重的。我們也尊重她們，她們也有帶頭紗。

她們都是在香港出生，學習有困難，但問題不是很大。最重要是，學校是她們父母選的，他們不是天主教的，最重要是他們有自由去選學校，也知道要上聖經課。

既照顧病人也獲照顧

—— 高慧儀修女

1930 年	在香港出生
1951 年	加入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
1959 年	宣發終身願
1959 至 1960 年	在聖保祿孤兒院服務
1960 至 1966 年	在聖保祿醫院工作
1967 至 1978 年	在聖保祿初學院服務
1978 至 1989 年	擔任香港會省省會長
1989 年	前往澳洲服務至今



(圖：高慧儀修女提供)

訪問：夏其龍神父及天主教研究中心職員

撰文：張小蘭

高慧儀修女屬於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這個源自法國的修會團體於 1848 年來港後便開始孤兒院的工作，其後主要在醫療和教育範疇服務。她們在港島及九龍營辦的兩所私立醫院，均被區內人稱為「法國醫院」。高修女曾在港島區的聖保祿醫院及修會的孤兒院工作過，從中看到香港在五、六十年代的經濟困難和社會變遷。

繁忙的醫院

聖保祿醫院的前身是一所華人婦幼醫院，於 1898 年在灣仔創辦，後來地方不敷應用，於 1908 年在跑馬地開設分院。隨著城鎮發展，灣仔的環境不再適合作為醫院之用，修會購得銅鑼灣一間紡織漂染廠舊址，把聖保祿機構搬遷至此，原來的兩所醫院於 1918 年合併成為現今的聖保祿醫院。

我是 1960 年來到在醫院，到 66 年，雖仍在這裡但停止了工作，66 年離開。我來工作時，醫院可說是剛開始有些改革，第一項是有個會計部。以前也有會計部，但是由一個修女去做所有工作，即是所謂「一腳踢」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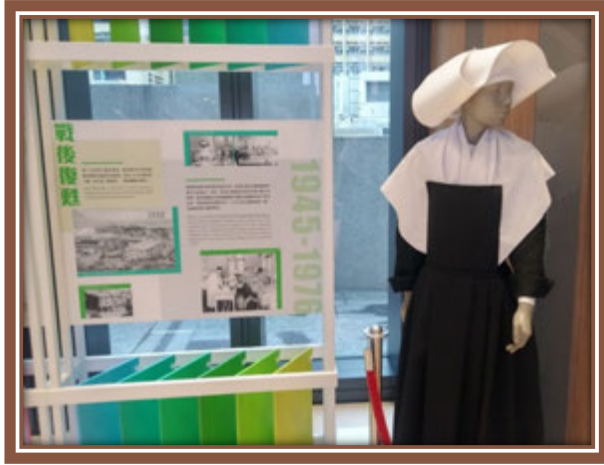
我們在醫院內工作，實在太忙，故對外面的其他醫院之情形所知不多。我們由早上念日課經，參與感恩祭，直到晚上都沒有一分鐘是留給自己。

護士為數不少，且頗容易聘請到護士，她們大多在澳門畢業後過來。初期多的是澳門來的。在手術室工作的護士，也有是從澳洲學成回來的，其餘多是從澳門過來。

醫院的病人

雖然聖保祿醫院是私立醫院，但修女們本著慈善為懷的精神，收費很便宜，甚至有時會免去經濟有困難的病人的費用。

¹ 廣東俗語，甚麼工作都要做，沒有分工的意思。



(圖：聖保祿醫院 2018 年慶祝 120 周年，展出舊式修女會衣及介紹戰後工作)

當時醫院是相當貧困的，雖然收費非常低，但也不是很多人能夠入住私家醫院。當時的人很多去公立醫院。我們的所有病人都是公司的職員，且佔大多數是來自電話公司。

當我來工作時，已有一間細小的產房，但病人卻比較多，尤其是水上人。當時維多利亞公園一帶還未填海，銅鑼灣有很多艇，故有很多艇家的人來。兒童病房亦很多嬰孩，這是由於艇家嬰兒患病是一個大問題，因為艇家出海回來，嬰兒可能發熱已久。此外，可能當時的醫療不普遍，以致我們的育嬰堂有很多棄嬰。

結核病曾是香港二十世紀初一個主要公共衛生問題，在 1939 年更是全年的頭號疾病殺手。二戰後，政府於 1947 年成立第一間結核病診所，之後推展全民健康計劃才慢慢減少，但在六十年代仍有百分之六左右的染病率，直至 1976 年才銷聲匿跡。²

² 程愷禮：〈醫史·Easy：香港結核病歷史〉，《蘋果日報》，2011 年 8 月 15 日。

我覺得當時病人中較多是有肺病，且男病人也是特別多。他們是一家生活支柱，若去政府醫院，只會有藥吃而沒有機會去休養，加上當時藥物不及現在的先進，故可能會給他三個月的藥，然後叫他們自己去休息。但對他們來說，其實很難可以去休息。

有的人負擔得到，便會住進我們這裡，但可能要住上六個月、九個月甚至一年。故當很多病人來時，我們會照顧不來。最初三、四個月的照顧還可以，但其後也會令我們很為難，因為見到他的肺病情況有改善，不能叫他即時出院，否則治癒的過程便會前功盡廢。這也令到我們醫院的經濟陷入困難，亦未能添置儀器。新儀器亦未普遍，我們修女認為可以維持到醫院便算。

獲善心相助的發展

除了服務民眾，醫院也不斷自我改善，力求發展，爭上科技發展的步伐，並且得恩人支持。

隨後在醫院的發展方面，人事有變動，Mother Bernard³ 盡力去發展醫院，設法增設儀器。她是一個護士，當時的省會長。但我們根本沒有能力單靠醫院的收益，尤其因為那些肺病人成了醫院的最大包袱。

我們的員工很好。他們的薪金是很低。雖然我不清楚政府醫院方面的薪酬是多少，但我估計我們的薪金會比政府醫院的還要低。當時，一個男職員的月薪是一百八十

³ Mother Bernard de Marie de Broqueville，納德·貝克維修女，於1960-68年擔任聖保祿修會香港省會長。參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編著，《聖保祿醫院歷史足跡——關愛服務百二載》，（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8），頁208。

元，加上有一日三餐的膳食提供，要這樣去維持一個家庭，其實頗困難。

當時，醫院內沒有很多中產階級的人士。就連住在頭等房的也不是本地人，而是澳門來的。或許他們是澳門的名人，故較能負擔。因為當中有一個病人是插喉的，每個月也有幾天過來換喉，且住頭等房，每天要花上十五元。

我記得澳門名人何賢的耳鼻喉有問題，他也來看我們的 George 蔡（蔡永善醫生）。那是一個葡國的醫生。他很出名，也是一個很好的天主教徒，每一次到醫院，會先進聖堂。他要來我們天主教的醫院工作。他要送病人過來，但我們沒有所需的儀器，何賢就送一部機器來。當時，那部機器價值五千多元。那是送給這個醫生去專做耳鼻喉科的。結果吸引了多些病人來，我們便可以有些收入，去彌補其他方面的不足。

Mother Bernard 省會長本身是護士，當她來的時候，香港的醫療較為蓬勃了，有新的儀器出現，例如是 X-ray 機，醫院便去裝置。我們當時成立小型公司，給醫生去參與投放資本，這樣我們才能夠買得起那些機器，因為那些機器對我們實在是很大的負擔。雖說私家醫院有收入，但當時我們的收入仍很低。因為按當時的環境，我們這樣做才能夠維持一部新的儀器。同時，當時醫院很小，病床也很少。頭等房最多約是二十間。

照顧病患心靈及家人所需

六十年代銅鑼灣及大坑一帶，搭建有不少木屋，形成銅鑼灣四大木屋區——舊大坑村、芽菜坑村、馬山村及蓮花宮村，故求醫者大多來自

窮困階層。病人困在醫院無所事事，高修女便向他們教授教會的要理，讓他們認識天主，使心靈有所寄托，而修會也會不時協助有需要的家庭。

每天下午，我去那裡教授要理，他們由於沒有工作，故全都在那裡休息。病房那地方很不錯，又有大露台，我便把他們都聚在一起，他們就會乖乖地聽道理。多謝天主，很多病人後來康復起來，尤其是他們的家人，都表示感激。

當時的院長真的很有善心，除了照顧病人，也盡量照顧他們的家庭。因為他們未能工作，孩子還年幼。那時的女性亦難找到工廠工作，尤其這區都是木屋，當時在銅鑼灣及大坑上面有很多木屋。此外，有很多家庭來學道理，很多小孩子來聖瑪加利大夜校就讀，我們的學校便開設一班夜校。我不清楚那是甚麼時間上課，只知他們來學道理之後，孩子便過去讀書，之後便自行回家。

成為其他修女的病人

不時與病人接觸，高修女自己也感染了肺病。治療她的是聖高隆龐傳教會的修女。因為當時主治結核病的律敦治療養院就是由這些來自愛爾蘭的修女主理。

當時律敦治醫院的愛爾蘭修女，是跟政府合作做研究的醫生，受到政府的規範。她要照顧政府醫院的病人，不能像私人醫生般外出去看其他病人。我相信，亦可能是時間上的問題。

那時，我成了肺病人。當時的藥物，也不外是那一類像 aspirin（亞士匹靈），因為沒有很多新藥。其實，那些

藥的效果很低，因我曾經是病人，所以我知道。吃藥後三個月也是那樣，直到有一種新藥出現，Aquinas⁴ 問我會否敢去試，而她亦要得到自己的病人同意後才可以去做，因為那藥有很大的副作用。我的病全靠它而好。

很奇怪的，沒有（副作用）。其他病人有很大的副作用，像今天的化療，脫髮、作嘔、不能進食，有的腫。我很幸運，沒有甚麼副作用。但只有一點，她叫我不要碰傷自己，因為我的血不易凝結，且會變黑色，除此之外，我沒有其他問題。真多謝天主。

受歡迎的產科

西式的助產法在戰前已逐漸普及，產婦開始到醫院或留產所分娩。聖保祿醫院為回應需求，另建了一幢獨立樓房作產科之用，時人稱為「聖母亭」。

為何產婦會來我們這裡而不去政府醫院？那時政府醫院有很多產科，因為剛是戰後和平，很多人都想有小孩子。我有一個 case（個案），她住了三等產房，正要出院，但無錢支付，她說遲些才交，那我們等了又等。那張賬單不算很昂貴，連同產房和 BB 房費用，當時約二百元。因為她說會遲些支付，那我們便保留該賬單去等她。等了很久，Sister 說不知她會否付，因我們要處理這張賬單，便叫我去看看。那人的地址是在北角的一間鞋店，原來那 BB 的爸爸在那處做職員。他對我說，其實他們已儲

⁴ Sr. Mary Aquinas Monaghan，亞規納修女，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1919 年出生，畢業於都柏林大學醫學院，1948 年來華後一直擔任律敦治療養院院長，直至 1985 年 11 月 28 日因癌症逝世。在任期間對癆病有深入研究，著書立說，並前往世界各地講學。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亞規納修女〉：<https://bit.ly/2KWOiqw>。

蓄了幾個月，但有了 BB 後開支更大，生活困難，沒能力支付。那時我問為甚麼不去政府醫院，以他的經濟情況，這樣又負上一筆債，但如果去政府醫院，則可以儲蓄多些，當 BB 出生後的經濟便沒這麼緊絀。他說他們本來打算去政府醫院，但他的太太很怕，不放心。

那我們就沒法子。雖然他沒錢付，但他的信任給我們很大的安慰。可能他們聽到那些（政府醫院）產房有甚麼不好的聲譽。因為當時的政府醫院不及現在，今天的政府醫院辦得十分好，人人都很滿意。當時，人人都很怕（政府醫院）內的職員，又怕給（實習）學生去試，所以他們很怕，盡量儲錢去找私家醫院，才較安心。

孤兒院的結束

在醫院服務之前，高修女宣發終身願後便在聖保祿孤兒院工作。當時人們普遍生活困難，迫使一些父母棄養孩子。即使環境好轉，父母有能力領回孩子，但有些父母的想法，以及部分孩子尤其已達反叛期的青少年的態度，使得修女們照顧的工作不容易。而真正無父無母的孤兒，修女們會鼓勵他們團結，維繫友情。

直到香港有社會福利署⁵，便結束了（修院的）孤兒院。那時，社會福利署在電台廣播，叫人領回孩子。最初，我們給他們領回，因為很多家庭突然有改變，例如父親失業，便送了孩子過來，但當他的環境轉好，他會把孩子帶回去。有了社會福利署之後，便解散孤兒院。那時，收音機廣播說如果你不領回，你便要來簽紙給人領養，但

⁵ 社會福利署於 1958 年成立，前身是華民政務司署轄下次於部級的社會局，於 1947 年成立。

如果過了某個時間而你又未前來簽紙，便算你放棄，那孤兒院便結束了。

放棄，即你再不要那個孩子，於是他成為了真正的孤兒。我們在這裡繼續去養育他們，直至他們長大到成年，自己外出找工作。我們就繼續給他們讀書。

當時有些孩子沒有人領養，也許是由於年紀太大，像十四、五歲青少年，我們給他們去讀書，別人不知他們是孤兒。他們上學後回來我們的地方住，直至他們可以自己外面找工作。我們現在也有去團結他們，因為他們沒有甚麼親人。他們會維繫自己的一群朋友。每年的年初三，他們也回來跟我們聚舊。

好像是在我去醫院前，可能是1951年，在孤兒院做了一年。那時我們已經開始勸他們帶（孩子）回家，那才有點親情關係，總好過跟陌生人扛一起，因為他們還年幼，只有四、五歲。所以，有些人帶孩子回去，但孩子會驚，不肯回去。像在星期日，我們帶有些孩子回家，但他們卻不太想去。有些孩子年紀大一點，像有兩個大約十二歲，他們很生氣，因為原來他們有弟妹，父母的想法是他們已在你們那裡安定住下，便可以不理，之後再有孩子，可以不放棄的，便自己繼續養。所以，這對那些孩子的影響很大。

很難去平服他們。若沒有見他們的家庭還好，見了之後回來便很反叛，我們很辛苦去照顧他們，他們的脾氣很差。後來，社會福利署照顧所有孤兒，我們仍盡量去繼續照顧有些孩子，因為有幾個是傷殘的。後來，當要分開時，他們也捨不得我們。應是多謝天主，我們應付過去，經過那個窮困的時間。知道他們有問題，沒法不去幫忙。

當時不像現在有社會福利、有保險，一個家庭有時真是求救無門。他們可以到哪處去求救？要向親朋借也不行，因每個人都生活困難。

以前的職員知道他們所照顧的人很有需要，幫助那些人是對他們的一種鼓勵，故不會去斤斤計較，真想去完成一份工作。我很欣賞以前老一輩的員工，他們會用心做，彼此合作，和我們一起工作而不計較。我很欣賞那段時間，多謝天主給我過了那段時間。

修道院山下的亞妹

——黃亞妹

- 1935 年 出生於香港仔
1951 年 於聖伯多祿堂領洗
1951 年 與天主教徒何偉明結婚



(本文所有圖片由黃亞妹女士提供)

黃亞妹婆婆個子不高，染了一頭烏黑的短鬚髮，笑起上來一雙藍灰色的眼睛也會眯眯笑。過時過節，她的七個女兒一個兒子、女婿、媳婦、七個孫和三個曾孫都會濟濟一堂。大家最期待也最回味的，是亞妹的手打「婆婆牌魚肉」。大家也知道，她愛喝茶也愛吃西餐，尤其愛喝咖啡。雖然她沒讀過書，但遊客用英語問路去 Stanley，她懂得帶他們去搭往赤柱的巴士。在第二次訪談後，她帶我們到南港島線橋下新開放的香葉徑，指著山邊的樹叢說：

這裡有條樓梯可以走上修道院的，那邊前面就是我們舊屋。

七十年前，就在這裡，天主教和修院成了黃亞妹生活的一部分。

香港仔修院山下

黃亞妹原名黃愛珍，如以身份證作準的話，她生於 1935 年，現年八十四歲。她在香港仔土生土長，父親黃亞土和母親馬水根都是水上人，育有十名子女，亞妹排第三。堂兄弟叫亞妹做「大兵頭」，因為她總行頭當先，大家都會先問她意見，像當兵帶頭。母親兒時在香港仔浸信會讀書，因此她們全家都算是基督教徒。但由於小時候正值日佔時期，亞妹並沒有機會讀書。亞妹為了家人溫飽，曾「做過三次女」¹；在差不多和平時，以兩斗米賣給馬留港造船廠（音譯）當義女，先後隨義母及其孫女兩家在香港仔、水街一帶打工，而第三次就是在何十四家打工。

住在修院山下的何十四，又名何福，跟亞妹的母親是浸信會的同學，而何十四的妻子張九妹，承包了華南總修院（聖神修院的前身）往來香港仔的水上交通。因此，亞妹在何家的主要工作就是權艇（搖船）——接送神父和修士往來香港仔和修院。自那時起，黃婆婆由「愛珍」變成「亞妹」：

亞妹這名字都是神父改的，後來人人也這樣叫，就照用這名字了。

¹ 「做女」意指賣給另一家人當義女打住家工。

「亞妹——過海——」

七十年代前，從香港仔到黃竹坑山上華南總修院必須經水路，搭小艇在香港仔舊官立學校（約現在香港仔網球場靠山方向），到修院山下的埠頭（約現在涌尾寵物公園），再走樓梯上山。亞妹未幫張九妹打工前，主要是由張九妹的養子何偉明負責櫂艇的。亞妹覆述何偉明當年的情形：

打仗那時，神父都要過海到聖堂開彌撒的。那時（何偉明）就送馬良神父²過海啦，日本仔那些炸彈轟轟聲整排落下來。剛好海中間有隻鶴佬船，相熟的。「哎呀，細佬，你快些上來上來。」拿張棉胎蓋著他，炸彈降下來嘛，就救了他一命，要不然那個炸彈下來，就沒命的了，炸死的了。那時他送過海的那隻船炸穿了。那時真的很危



（圖：負責搖船的黃亞妹與神父於艇上合照）

險的，整排飛機來，整排飛機一起落炸彈，隆隆聲，好像一窩雀鳥在飛，一排地飛，一排地落下。

當年亞妹還未叫亞妹，她還在她父親那邊開新（出海捕魚）。這驚險的一幕，是亞妹的丈夫——也就是何十四和張九妹的養子何偉明——後來告訴她的。何和張有一個親生女兒和三個養子女，何偉明就是他們從凌月仙嬰堂領養出來的。何偉明在嘉諾撒培德學校讀到四年

² 馬良神父（John O' Meara，1898-1991），愛爾蘭籍耶穌會會士，1933年抵港。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馬良神父〉：<https://bit.ly/2XHSHjP>。

級後，便要輟學到修院廚房打工。大概自四十年代中期起，櫂艇的工作由亞妹接手。

亞妹每天櫂的那隻艇是修院的。水路是往修院的唯一路線，由於神父和修士不可外宿，當他們外出時，亞妹必須先問他們回程時間。

神父有時講中文，有時講英文。有些神父講中文講得好好的，有的斷斷續續，但我又很明白他們說甚麼。比如他們外出，我問他們幾點鐘回來，要泊船到碼頭。例如大陸或外國來的，[模仿說普通話]幾點返來？一點鐘、十二點鐘、十一點鐘。那音調很有趣的，但我又明白，有時會比手勢。

亞妹說，比較難聽得懂的是來自上海和北平的修士。於是修院負責買辦的王先生就會教導亞妹：「[模仿說普通話]『幾點返來』，不是說『返來』，是[模仿說普通話]『回來』，他說『一點回來』、『十二點回來』。」他一教亞妹就明白了。有時候，神父會到半夜才回來，亞妹也必須候命。

「包神父，幾點回來呀？」「我今晚呀，我猜妳會很暈的了，我要一點鐘才開完彌撒回來。」我那時泊在那個碼頭，坐在船內，很冷很冷。「亞妹，冷死妳囉，怎辦呀？」有時有些神父呢，穿著件西裝。「我給妳這外套等我們回來啦。妳披在肩膀啦，要不然冷死妳喇，我們這麼晚才回來。我們又不能不外出，我們出去開彌撒，有時出去開會。」

縱然得到神父的好意，亞妹卻仍然要捱凍，因為她的家姑不一會便拿走西裝外套，給她在漁市場的女婿穿著。有些神父比較友善，有些性格則不同。

要過海的神父都會大叫「過海——長行艇過海——」或是「亞妹——過海——」要是反應慢一點，比較惡和急性子一點的就會責備船家。

遲一點點過去接他過海，他便會罵，很惡的。「亞妹，做甚麼？妳睡著了聽不到我叫過海嗎？」

亞妹基本上是隨傳隨到的，看見神父剛下石梯級，便要匆匆過去接他過海，畢竟神父多趕著外出開彌撒。亞妹就是這樣，不分四季、不分陰晴地接送神父過海。

既然靠櫂艇為生，又是水上人，亞妹必定是游泳高手吧？但原來亞妹是不諳水性的。有一次，當亞妹如常地接送神父過海時，不慎掉到海裡，全靠神父拉她上岸，救了她一命：

我有一次搖著搖著搖斷了繫在那櫂檣和艇身的繩子，我給彈了下水。就是搖到一半，跌了落水。糟糕了，怎辦？「亞妹，亞妹，妳在哪？妳在哪？」他坐在船艙中不斷摸船邊周圍，我就抓著船邊。「哎呀，亞妹呀亞妹，我摸到妳隻手喇。妳快些用力。用力！用力！快些上來，上返來，要不然妳沒命的了。要是鬆了手就沒命的了，妳不懂游泳會浸死的。」我不懂游水的嘛，他便死命地拉我上去，拉到條船都快要反轉了。我說：「不是呀神父，你要走到後面一點，你要站在正中間才拉我上來。要不然船翻了，連你也會跌落水的。」「對啊，對啊，我挪過一點，妳千萬別放開手呀！妳抓緊我的手呀！」就是這樣他拉我上來。「好了，妳會活到一百歲的，亞妹。妳活下來了，天主保佑妳，讓妳長命一點呀！」

就這樣，亞妹活下來又繼續櫂艇。除神父外，眾多的修士也是亞妹的乘客。當中，有一個讓亞妹特別印象深刻：

那時有個修士經常發羊吊（癲癇症發作），搭我們船過海呢，一發羊吊就在船上嘔白泡啦、撐手撐腳啦。那時便找一塊布……那時哪會那麼乾淨，怕有菌有甚麼的……

就找一塊布給他咬著，以防他咬斷舌頭。後來那修士跟我說：「亞妹多謝妳救我，我這樣慘嚇到妳這麼淒涼，妳又不害怕。如果沒有妳救我，我的舌頭已咬斷幾次了。」我總會放條毛巾在船，弄髒了我就洗乾淨，放好。捏成一大球，塞在他口，讓他咬著，不用咬斷舌頭。他不知道的嘛，他經常嘔白泡呀。我們那隻船有個大船艙的嘛，按他下去躺在那邊，讓他咬著布，然後幫他拉手腳，不要抽搐在一起。

亞妹還繪形繪聲地描述了自己如何用固定船艇的竹來將乘客彈上陸地、如何頂著大肚幫母親接生等情景。雖然沒受過正式教育，但亞妹聰慧和刻苦的性格，讓她與修院的關係並不囿於接載神父的艇上。

從修院山下到山上再到山外

原來除了接送神父和修士，當有外國神父到訪或有人到修院避靜時，也會搭亞妹的艇，所以阿妹一天就可能去修院好幾次。如果有行李的話，她還要幫忙抬上去。

真的很多很多很多神父，來來去去的真的很多很多，最慘是我要幫他們搬行李上修道院。來修院避靜也好，來修院住宿也好，幫他揹行李上去，一大筐：書啦、聖經書啦、衣服啦那些。嘩，一大筐呀！像這個那麼大的〔指著家中一個三十吋的行李箱〕。那時不知為何這麼大力的。這樣走百多級石梯，托著行李上去不敢放在地上休息，怕沒有人幫我推回肩上托呀。

除了搬運行李，偶爾還要幫忙送雞蛋、水果上修院，還要送信。

送信呢，就大多都在碼頭的了。在碼頭放下讓我拿上去，逐間房間派……ABCD。（您不會寫字又怎樣分

送？) 我會認字的嘛，王先生帶過我一次的。「欸，亞妹，預先教妳這個 ABCDEFG。」我便死記爛記囉，那時候記性好一點的。

亞妹在修院還會幫忙割草、修草皮、移送遺體和在大瞻禮前熨燙祭衣。每星期，她或何偉明都要到堅道的主教座堂拿「送聖體」的麵餅。但亞妹最期待又最津津樂道的，是幫王先生外出購物。王先生是越南人，原在修院當修士，後轉做買辦。所謂買辦，就是負責到中、上環的辦館採購修院所需的食物和物資。要是打算買入較多物資的那天，王先生就會請何偉明或亞妹一起搭巴士出去幫忙運送。提起辦館，亞妹雙眼發光：

如果和我出去呢，我就很開心。發達喇！請我食個餐！[笑]

王先生眼見平日亞妹工作辛勞又聽話，帶亞妹外出買辦時多會用自己的薪金請她吃西餐，有時是公司三文治，有時是一杯奶茶或咖啡。她回憶道：

那時的咖啡是特別好喝的，不知是不是那時候少喝。我們中國人哪會有咖啡有這些喝的？那時候多少人沒喝過咖啡？覺得自己很幸運呀，有杯咖啡，又懂得吃西餐，很厲害！

不過亞妹最難忘的，還是吃牛排：

以前那些餐廳呀很羅曼（浪漫）的，小小一間，很漂亮的。真的只有鬼佬光顧，沒有中國人的，很少中國人。嘩！我呀，很害怕呀！穿著雙屐啦，很害怕，即是啥中國人都沒有，我自己又不懂用叉嘛。王先生教我用叉、教我怎樣吃啦、又「鋸扒」（吃牛排）啦。「鋸扒」呀！[笑逐顏開] 嘩——開心到我，真是差點要暈倒呀！我已經很

害怕的了，去那些地方又沒有中國人，還要我「鋸扒」！教我怎樣切、怎樣吃，要斯文一點地吃。嘩！我的心跳到卜卜聲。[笑]

那時候剛剛到何十四家打工的亞妹才十多歲。雖然每次外出採購，物資都非常沉重，但無論多重亞妹也會幫忙。七十年後的今天，亞妹依然銘記王先生的恩情。就是這樣，自和平後，亞妹與修院結下不解緣，她也一直權艇到六十年代末政府收地填海和建鴨洲大橋，才轉到石排灣的聖伯多祿小學當校工「妹姐」。

「你們求，必要給你們」（瑪 7：7）

原本是基督教徒的亞妹自十歲後，她的生活便跟天主教密不可分，而她跟丈夫何偉明的婚事，更是由神父一手撮合的。那時的神父都很疼亞妹，但又覺得她總是苦著臉。

神父說：「以妳年紀應該很開心才對。」我說：「不開心，事頭婆（老闆娘）總是罵我，我把錢都給了她她也罵我，她欺侮那個 boy 很慘。他們說，男生叫做 boy 嘛，我便跟著說。」

原來那時亞妹常看見老闆打何偉明，用鐵鎚仔打到他滿身滿臉都是血。神父便說：「他又這麼可憐，妳又這樣可憐，如果你們年齡夠就結婚啦，可憐他吧，婚後有個照應。」就是這樣，神父著亞妹到培德小學跟彭愛金修女³學道理。亞妹便每星期到培德的休息室（位於前嘉諾撒幼稚園，即現兆群大廈）上課。

彭姑娘教我們道理的，教我們念經分開幾次教的，很好的。「萬福瑪利亞」教完了，又要再重覆，又要再來，

³ 彭愛金修女（1914-2008），原籍廣東順德，1931年加入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彭愛金修女〉：<https://bit.ly/2W1Od6c>。

看看你是否全都記得一條經怎樣。「吾主耶穌基利斯督」就分開來教，再續回去。彭姑娘教我們教得很用心的。

領受聖洗和堅振聖事後，亞妹和天主教徒何偉明結婚。雖然他倆的結婚證書上的結婚地點是「香港仔華南修院山腳木屋」，但亞妹澄清說那只是他們的住處，他們是在聖伯多祿聖堂結婚的。



(圖：何偉明和亞妹的結婚證書)

你知道伯多祿聖堂不像現在這麼漂亮的嗎？伯多祿聖堂像一間小屋很長的，很小很矮而已，沒這麼大的。我們是住在木屋，結婚在那邊登記，但在聖堂結婚。那時有紅地毯給我們走的，很厲害的，神父帶來的嘛。修道院神父陪我們一起去聖堂結婚的。（哪位神父主禮？）好像是陳丹書神父⁴。

⁴ 陳丹書神父 (1890-1975)，原籍新界西貢鹽田梓，1917年晉鐸。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陳丹書神父)：<https://bit.ly/2PqeDMc>。

民國四十年（1951年），十七歲的黃亞妹（註：結婚證書上亞妹的出生年份是1934年）和十六歲的何偉明在神父的見證下結婚，隨後出生的八名子女也順理成章地領洗。

除大女兒外，何偉明和亞妹的子女全都在天主教學校讀書。因此，一家亦受益於五、六十年代教會派發的救濟品。但原來早在救濟品尚未普及的年代，亞妹便已請求修院神父接濟附近的貧困兒童。

後來才有救濟品，起初也沒有。加德佛（音譯，當時送麵包給修院的公司）送來的麵包很大條的。即是（神父只吃麵包中心部分的）肉而已，那些麵包皮都會切出來丟掉。初時我就跟當家神父說，我說：「Father，有許多人都是很淒涼沒得吃，那些小孩真的沒得吃會餓死的。你可不可以將那些皮拿出來救濟他們、幫助他們呢？每天給他們一片皮吃，不要拿去丟掉？」他說：「這樣嘛，好呀好呀。妳找何偉明負責將麵包皮切出來，再叫他拿去石梯級那邊派給他們吧。」

因此，亞妹也會接載小孩到修院。小孩上到修院，跟修士讀書寫字學習一小時，便可以拿麵包皮吃。到後來，教會在修院、學校和社區中心派麵包、麵粉、麵條、油等糧食，培德的校長曾修女和老阿嬤肥孀都對何家十分關顧。而亞妹一家亦會善用這些糧食，例如亞妹除了授母乳外，亦會煮粥水加點鷹嘜煉奶餵給初生子女吃。由於亞妹自小在修院出入、偶爾會跟何十四與大使館的老外上司坐漂流艇尋寶、又會跟黃亞土到深水灣高爾夫球場撿球，她對西方飲食文化的認識相對較多。有時候，附近的漁民拿了救濟品也會請教亞妹：

剛剛和平時都有派發些救濟品，那時候會派些芝士，那些漁民當作肥皂洗衣服。那些住船的人不懂嘛，不知道

那些是芝士可以食用，但洗來洗去也不能去污。那時住船的我很多也認識的。「亞妹，這些是甚麼？」「這是芝士，是鬼佬芝士，用來夾麵包吃的。」「甚麼？我們當肥皂洗呢！」「怎麼這般浪費呢？」「我們不知道是吃的，便當肥皂用。」

當普遍華人領取了麵粉和奶粉回家會用來煎糕、煎鉢罉（薄罉）時，何偉明就會根據修院廚房的步驟，在家用麵粉蒸蛋糕。亞妹也不禁稱讚丈夫蒸蛋糕的技巧了得！

除了請求神父派麵包皮外，亞妹說：

我老是有事求神父幫忙，神父說：「亞妹呀，妳怎麼有這麼多事求我們的？」

究竟亞妹還求過神父甚麼呢？張九妹在五十年代初又在嬰堂領養了小女孩何桂珍，主要由亞妹照顧，有次桂珍病重，於是亞妹跪著求神父送她去醫院，往後一個多月，亞妹每天徒步從香港仔走到半山的嘉諾撒醫院去探望桂珍。何十四生前曾吩咐亞妹，求神父讓他葬於跑馬地墳場，於是何十四離世後，亞妹跪求院長夏神父⁵幫忙圓願。

那時我真的在修道院大門那邊跪，跪神父呀，跪這個夏神父。「神父呀，你讓阿何十四在跑馬地，給他個地方啦。他很喜歡那裡，你可不可以幫忙我呢？」「唉，亞妹，妳這樣求我，我怎能不幫忙妳呢？妳又幫助了我們修道院這麼多神父，許多許多困難妳都捱過了，這個忙我能不能幫妳嗎？不能。我跟伯多祿堂本堂神父說說吧。」

⁵ 夏禮士神父 (Richard Harris, 1903-1998)，愛爾蘭耶穌會會士，1929年抵港。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夏禮士神父〉：<https://bit.ly/2IF0dYe>。

亞妹除了請求神父幫助家人，其同理心亦驅使她求神父救助附近的一些老弱婦孺。儘管何家後來搬上大廈，住過石排灣邨、華富邨再搬回香港仔，亞妹做過校工、漁市場分魚、家庭作業式串膠花、啤錶帶等工作，但亞妹念茲在茲的還是修院和聖伯多祿堂。

重回香港仔

這數十年來，亞妹依然堅持每星期回到香港仔聖伯多祿堂望彌撒。亞妹沒受過正式教育，訪談時，她說著水上人口音的廣東話，偶爾錯用成語，又偶爾夾雜英語單詞。她說得最多的英語單詞是「father」，給她看天主教教區檔案中的神父照片，她才剛說「很多很多都很眼熟，但都忘了名字」，邊看卻邊說：

郭神父⁶有兩兄弟，還有個姐姐也來過，長得一模一樣的。郭神父跟我們最熟稔，後來不知怎的他搭巴士從上層下來傷了腰骨，後來就進了老人院。我們搬到石排灣，他也經常上來探望我們，很樂於助人的，常常幫助教友的，很好的。

蔡神父呢，很健談的，過海時甚麼也聊一頓，他講我們的語言講很好很清楚。

[指著徐誠斌主教照片] 這個升了做主教嘛！

史神父後來才去伯多祿堂。

馬神父是日本仔那時候的，馬神父在修道院最久，那時是院長來的。

⁶ 郭樂施神父（又名郭年士·Edward Collins·1915-2003），愛爾蘭籍耶穌會士，1949年抵港。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郭樂施神父〉：<https://bit.ly/2GDk7AO>。

紀神父，是愛爾蘭來的，對呀，他告訴過我。⁷

看著照片，亞妹問了好幾次，為甚麼還未見到她最熟稔的科神父。終於找到了科利神父⁸的照片，亞妹忍不住嘴角上揚：

科神父，這是 Father 科喇，他的樣子很慈祥的。

三十年後，亞妹又搬回香港仔離從前修院山下木屋不遠的地方。那天，她帶我們「重遊」故居，娓娓道來她在訪談中曾提及的人、事、物的確實位置。曾幾何時，亞妹因自己從前一些善意的謊言和過犯而耿耿於懷，她便問神父她有沒有罪。當時神父跟她這樣說：

妳沒有罪，受難就是妳。妳是犯了罪，但妳是為了幫助別人，天主要寬恕妳，賜福給妳，讓妳長命百歲。妳幫助別人，妳要做好心，這是好的。妳積福吧，將來妳慢慢就會好，一代一代都好，會很平靜、很好、很乖的。天主會給妳福氣。

亞妹婆婆撥了撥她那頭烏黑的短鬍髮，眯起一雙藍灰色的眼睛微笑著說。就是憑著這句話，亞妹跨過了大小難關。嚐盡生活中的甜酸苦辣，她又回到了香港仔修院山下。

⁷ 蔡伯德神父 (Patrick Joy · 1892-1970) · 愛爾蘭籍耶穌會士 · 1927 年抵港。
史達生神父 (Ernest Stassen · 1922-1981) · 比利時籍聖母聖心會士 · 1954 年抵港。
馬良神父 (John O' Meara · 1898-1991) · 愛爾蘭籍耶穌會士 · 1933 年抵港。
紀烈義神父 (James Kelly · 1921-2000) · 愛爾蘭籍耶穌會士 · 1948 年抵港。
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蔡伯德神父〉：<https://bit.ly/2PxI0g1>；
〈史達生神父〉：<https://bit.ly/2DuazpH>；〈馬良神父〉：<https://bit.ly/2XHShJp>；
〈紀烈義神父〉：<https://bit.ly/2ZtoZ2A>。

⁸ 科利神父 (John Foley · 1907-1991) · 愛爾蘭籍耶穌會會士 · 1933 年抵港。參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科利神父〉：<https://bit.ly/2IKISwi>。



(圖：全家福·攝於 1970 年·右為何偉明·上排左起：二女凱欣、五子志霖、六女金萍、大女文鳳、黃亞妹·下排左起：四女金燕、三女金鈴、何桂珍、七女金玉·么女金佩尚未出生)



(圖：全家福·攝於 2019)

感謝教會接濟的家庭

—— 梁氏三姊妹 (Annie、Connie、Judy)

- 1950 年 Annie 出生
1954 年 Connie 出生
1957 年 Judy 出生，梁母與四名兒女在玫瑰堂領洗
1962 年 梁氏一家搬到觀塘



(圖：左起：Annie、Judy、Connie)

訪問、撰文：黃奕清

「奶粉教友」、「麵粉教友」、「義學」和「天台學校」等字眼，很多人大概都有所聽聞。它們代表著天主教會於二十世紀中期在香港社會裡的一種角色與工作，而對於很多成長於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教友來說，它們更是一份共同記憶。梁氏三姊妹所分享的教會經驗，或許也是不少教友家庭的故事。

在六兄弟姊妹中，Annie、Connie 和 Judy 三姊妹於五十年代先後在內地和香港出世。她們本來居於九龍上海街，1962 年搬到觀塘鯉魚門道邨（觀塘警署一帶），直至各自結婚組織家庭。排行第二的 Connie 說：

我媽媽「落嚟」¹ 香港找我爸爸，我是在香港出生的。54 年我出生之後，到 56 年我弟弟，即她（Judy）對上那個哥哥，也出生了。

後來我爸爸說要回國內帶我姐姐（Annie）來，我姐姐來了後她（Judy）便出生。她出生的時候，我們就一起領洗。

那時我們很窮，現在的叫「劏房」，我們那時候沒有劏房，一層樓有很多伙人，每伙有一間房。但我們沒錢租房，我們租一個床位，每個人走過都見到我們的，只能夠拉一層布簾來睡覺，一家多口睡在同一張床。

我們住床位的時候，對面房的一位太太，就是我們後來的代母²。因為她見到我們的媽媽，一個鄉下的女人，甚麼都不懂，又不識字，看到我們這樣的環境，就跟我們說：「不如帶你們返去聖堂，教會那裡。」

¹ 從中國大陸到來的意思。

² 天主教的傳統裡，不論是成人或兒童入教，每一位候洗者都必須有一位代父或代母。因為候洗者本身分享了教會團體的信仰，而代父母就是教會團體的代表；他們以祈禱和德表，在信仰路上陪伴和指導候洗者。

領洗於尖沙咀玫瑰堂

為著這次訪談，Connie 特意翻看她保存了逾六十年的兒時記錄。

她 (Judy) 八月出世，我們十二月領洗，我們的領洗紙上寫著的。當時除了爸爸，我們全家都領洗了。

領洗之後，他們 (聖堂) 找人「湊住」³ 我們，好好的。逢星期六返主日學，星期日要去望彌撒，到達某年齡，就叫你初領聖體，跟著領堅振。他們有一組人「湊住」我們。

那時的天主教，是有錢人信奉的，窮人是給她打救。

這是 Connie 當時對教會的理解。她們一家在生活上，確實經驗了教會多方面的照料，由日用物品，包括吃的，如麵食，不能吃的，如衣服，以至教育。

玫瑰堂旁邊就是聖瑪利書院，是女子學校，是很有錢的人讀的。那兒的修女和老師怎樣的好呢？辦一些叫「義學」，是不收費的，由幼稚園開始，一年級、二年級等。因為我是女孩子，我都可以讀。忘了是四點多還是五點才上學的，即等人家放了學，我們就到聖瑪利，由義工教導我們。⁴

我最記得我第一次，大姐也有去，去聖瑪利書院的聖誕節大餐，我只去過一次，大姐去過兩次。吃西餐的，第一次看見如此的場面。現在已記不起吃甚麼，只記得場面極之「墟冚」⁵。首先是讀正規學校的女孩子食，她們吃完，收拾好，才輪到我們。

³ 廣東話，照顧、帶領的意思。

⁴ 聖瑪利書院由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在 1900 年創辦，修女早在戰後初期已開始借用書院的課室，為貧窮兒童開設夜校，上課時間為下午四時半至六時半。參夏其龍、譚永亮編：《香港天主教修會及傳教會歷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1)，頁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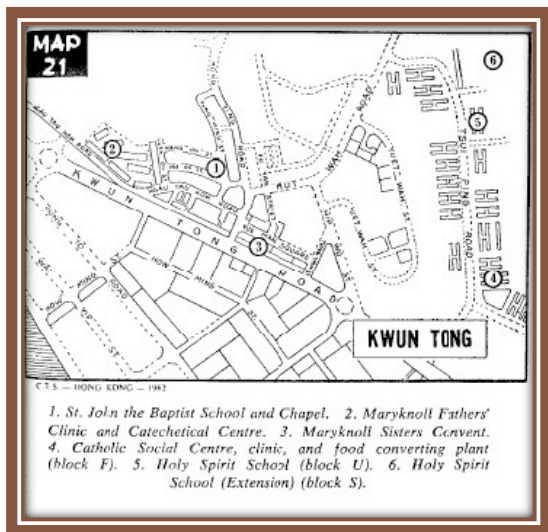
⁵ 場面熱鬧盛大。

觀塘雞寮 F 座

Connie 在聖瑪利書院上義學至小學二年班的某一個學期為止，因為一家人要搬到觀塘鯉魚門道邨。那是 1962 年，她們來到新的社區，投入的是一個跟玫瑰堂很不一樣的聖堂，在觀塘徙置區（俗稱「雞寮」）之內。Connie 說：

那時還未叫「耶穌復活堂」的，我們叫「F 座」，那時是徙置區，號碼由 A 至 Z 來分座數。

一進去，有兩邊，中間是廁所和浴室。我們教堂在地面，就不用有浴室，只有廁所。兩邊就像課室般，那時都有學校，都是這樣的，我們的「聖神學校」就是這樣。這些房間，就是工作人員辦事或辦活動的地方。我們再走進去，才是祭台。



（圖：英文版《1962 年香港天主教指南（重印）》內的地圖，4 號為 F 座的位置）

Annie 記得那裡有義診服務，她說：

一進門口，右手邊是診所，義診的，有位肥姑娘；有甚麼事，就跟姑娘說。左手邊最後面那裡，就做聖堂。分

開兩邊，一邊是祭台，我們在另一邊坐。

Connie 繼續介紹：

診所的對面，有個房間，買了一套機器，請一位師傅回來打麵，做上海麵。你知道甚麼是上海麵嗎？濕的、白色的。做好之後掛在那裡，再捆成一團一團。我們教友有一張卡，例如我們家有八人，登記一家八口，他便看你人口多少而給你的份量。

那時每個星期六都是我去領的，我是做跑腿去拿這些的。有時候派米，有時候是麵條，有時候有奶粉。我最記得給我弟弟的奶粉。我最小的弟弟 63 年出生，那時他便有奶粉喝了，我另一個妹妹是喝「壽星公煉奶」的。這個弟弟呢，很多時是由我開奶的，那我就「靜雞雞」⁶先放一羹到自己的口，奶粉在口裡面溶掉；嘩！未吃過這麼好味的東西！因為那時物資很窮困。

我們那時沒有政府照顧，若不是幸得張夢霞女士，即是我代母，叫我們去信教，我們那來吃的？

不過，她們也聽聞過有些人會對教友出言不遜，例如：「你信天主教，你一定是貪那些午餐肉、煉奶、奶粉。」

對於教會在那個年代的香港，尤其是生活上的救濟，以及教育和醫療等服務，Judy 認為是救了很多。Annie 亦和應道，很多人都是因為去了教會而得到讀書的機會。

三姊妹憶述，當時 F 座的天台，是教會義辦的幼稚園，Judy 跟她的弟妹也是在那裡讀完幼稚園，再去「聖神學校」。按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校友會有限公司於 2014 年為向賴存忠神父致敬而印製的專輯所

⁶ 悄悄地、偷偷地的意思。

述，聖神學校是開設於雞寮第十四座的「徙置大廈學校」，由瑪利諾修女管理。

禮儀本地化前的主日彌撒

當年梁媽媽除了主日彌撒，就沒有讓孩子們參加善會和其他堂區活動，幾姊妹只得瞞著媽媽偷偷地加入聖母軍，因此在她們的堂區生活片段裡，主要都是禮儀的參與。那時還是禮儀改革之前，Connie說：

每個星期日，我最記得我們領洗後，長大一點，初領聖體，有了那條紗巾之後，一忘記帶那紗巾去望彌撒，就很緊張。要常常戴著白色的紗巾，很漂亮的。要用髮夾夾住，忘記帶髮夾又會很慌張。但現在回想，覺得很漂亮。

我們小時候，全部都是那些我們不知道的文，不懂的。即使初初來到耶穌復活堂，那時的F座，神父都是念拉丁文的。

神父講道是用「唔咸唔淡」⁷的廣東話，通常人人都「樁眼瞓」，細有細「樁」，大有大「樁」。

神父背著我們做彌撒的。其實我都不知道他在說甚麼，總之，起身便起身，坐下便坐下，跪下便跪下，領聖體，最神聖的一刻，一定要跪下。出去領聖體時，排住隊全部跪著。輔祭的袍很漂亮的，又紅又白，好傳統的，他拿著金色的盤，放在下巴底，怕屑碎會掉下。這樣跪著，神父把餅放在舌尖上。口領聖體很久了，到十幾歲仍是口領。

到後期，即是一九七幾年的時候，已經改善了很多。例如我們懂得如何念經。其實我覺得，教導是很重要的。

⁷ 「唔咸唔淡」指發音不標準，而「樁眼瞓」是指打瞌睡。

像佩琪（Annie 女兒）那一輩長大了，他們懂得教現在年幼的。所以現在的小朋友，四、五歲，如果他們是到天主教學校讀書，全部都懂得念經。那時雖然我們是天主教，但念得不好。

記憶裡的神父與修女

無論在玫瑰堂，還是 F 座，三姊妹對神父都不大認識。Annie 提到，她們辦告解都要由修女安排的。Connie 憶述：

那時辦告解是很傳統的，有東西遮蓋著，大家在外邊排隊，進去要跪下，神父看不到你的樣子，用耳朵聽，你的嘴向著分隔的網說話。現在有些舊教堂也有，新的就沒有了。

Judy 有感以前的神父比較高高在上，現在的神父較親民。Connie 亦提到，以前神父主持完彌撒便「匿埋」⁸，現在彌撒一結束，神父便站在聖堂門口，跟教友們打招呼。

相對地，她們記得以前有很多女性在堂區服務，會常常主動關心教友，了解教友的需要。其中，三姊妹跟修女們的關係比較密切，在那些艱難的日子裡，修女替她們處理了不少生活上的難題。Connie 說：

修女都好好的。我們認識的修女有外國人，有中國人。我最深印象的是其中有幾位中國人，是好好的。一位是余修女，一位貝修女，還有一位雙眼很大的，外國人來的，她「眼碌碌」⁹令我很害怕，不過也是很好人的，她的廣東話很好。

⁸ 躲起來的意思。

⁹ 眼睛睜得很大。

最慶幸的是，我們搬來觀塘，爸爸媽媽請余修女和神父，寫了封信，我們便到聖神小學讀書。我們是插班的，弟弟讀一年班，我讀二年班，她（Judy）在十八座（即F座）天台讀幼稚園，有個弟弟還未出世。而且修女每個月幫Judy交學費，她讀中一的時候，每個月給五十元左右。

Judy回應說：

我讀中學時，媽媽說沒錢讓我讀，是教會資助我的。但我又不是讀書的材料，真的不好意思呢。

問到三姊妹有沒有想過做修女，她們異口同聲答「沒有」。Judy說：

我們覺得，修女和神父要讀很多書，我們覺得他們「好叻」。

跋

這次《東西薈萃：香港天主教會口述歷史》的出版計劃能夠順利完成，有賴以下受訪者、訪問員及機構的協助。

受訪者：

王美笑修女、甘秀玲修女、李海龍神父、李國雄神父、李崇德先生、杜逸文神父、沈禮訓先生、狄和詩神父、林銘神父、范錦棠神父、徐錦堯神父、恩保德神父、馬偉良神父、高慧儀修女、梅樂真修女、華天祿神父、黃亞妹女士、黃學明先生、溫以政神父、萬籟寂神父、詹秀璉修女、鄭生來神父、駱鏗祥神父、儲富有先生、鍾炳霖先生、Annie Leung, Connie Leung 和 Judy Leung，以及已故的江天文神父和陶成章神父。

我們很感謝以下諸位人士。他們既擔當訪問員和攝影師，又提筆撰文，協助完成此口述歷史項目：

加俾爾、范煒娟、區麗芳、陳樂信、彭家維

曾家洛、黃天賜、黃懿縈、劉卓輝、譚惠鵬

我們也在此鳴謝以下機構、堂區及教友借出照片：

公教報、天亞社中文網、紅磡聖母堂、聖方濟堂、聖佬楞佐堂教友、聖若翰堂、瑪利諾女修會

香港中文大學 天主教研究中心主任

夏其龍神父

2019年4月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叢書主編

夏其龍博士 (召集人) (香港中文大學)

譚永亮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

譚偉倫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學術顧問團 (按姓氏筆劃排序)

古偉瀛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張學明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勞伯壘教授 (聖神修院神哲學院)

楊秀珠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Prof. Leo D. LEFEBURE (Georgetown University, USA)

Prof. Peter C. PHAN (Georgetown University, USA)

Prof. Nicolas STANDAERT, SJ (KUL, Belgium)

General Editors of the Series

Dr. HA, Louis E. Keloon (Coordinator)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r. TAVEIRNE, Patrick, CIC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of. TAM, Wai Lu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dvisory Committee (according to alphabetic order)

Prof. CHEUNG, Hok Ming Frederick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of. KU, Weiyo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of. LEFEBURE, Leo D. (Georgetown University, USA)

Prof. LO, William, S.J. (Holy Spirit Seminary College of Theology & Philosophy)

Prof. PHAN, Peter C. (Georgetown University, USA)

Prof. STANDAERT, Nicolas, SJ (KUL, Belgium)

Prof. YEUNG, Sau Chu Alis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 天主教研究叢書 史料及工具系列【11】

《東西薈萃：香港天主教會口述歷史》

編輯：張小蘭、黃奕清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
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電話：(852) 3943 4277
傳真：(852) 3942 0995
網址：www.cuhk.edu.hk/crs/catholic
電郵：catholic@cuhk.edu.hk
承印：4a Colour Design
Flat C, 6/F Blk 4, Golden Dragon Industrial Centre,
182-190 Tai Lin Pai Road, Kwai Chung, N.T.
二零一九年五月初版
ISBN：978-988-14038-6-5

Catholic Studies Publication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ast Meets West: Oral Histor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Hong Kong”

Editors: CHEUNG Siu Lan, Lucia and WONG Yick-ching
Centre for Cathol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Publisher: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Tel.: (852) 3943 4277
Fax.: (852) 3942 0995
Website: www.cuhk.edu.hk/crs/catholic/
Email: catholic@cuhk.edu.hk
Printer: 4a Colour Design
Flat C, 6/F Blk 4, Golden Dragon Industrial Centre,
182-190 Tai Lin Pai Road, Kwai Chung, N.T.
First Edition: May 2019
ISBN: 978-988-14038-6-5